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数智时代的知识变革与知识创新

郑永年

DeepSeek “出圈” 下一步——
我国如何构建AI新变革与创新环境

贾开 蒋余浩 戴明洁 张弦

专访王江雨：如何理解美国的“对等关税”？

刘佳

公共政策研究季刊

IPP Quarterly

郑永年 主编

2025/02



公共政策研究季刊

IPP Quarterly

2025 年第 2 期

《公共政策研究季刊》编委会名单

主 编: 郑永年

编 委: 陈佳慧 戴明洁 郭 海 蒋余浩 李明令 李 婷
李海滨 林辉煌 刘 佳 卢克玲 徐伟钧 杨庭轩
杨丽君 余 荔 赵 巍 张心旖 庄文越 朱雁翎
(按姓氏音序排列)

编 辑: 刘 深 李彩霞 周浩锴 刘昕冉

主管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

主办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目 录

【技术与产业】后 DeepSeek 时代的中国人工智能

数智时代的知识变革与知识创新	郑永年- 1 -
DeepSeek “出圈” 下一步：我国如何构建 AI 新变革与创新环境	贾开、蒋余浩、戴明洁、张弦- 5 -
从 DeepSeek 突围，看 AI 领域赶超策略	蒋余浩- 17 -
IPP 专访 刘少山：Manus 和 DeepSeek 只是开端	- 22 -
从一家游戏公司，看 AI 如何替代人	李婷- 27 -
“AI 民主化” 之后，不能放弃对人文性的 “深度求索”	李明令- 31 -
在 AI 时代，反思技术与人才的关系	杨庭轩- 36 -
低成本 AI 与生产率变革：数字化转型的机遇	张心漪- 41 -

【战略与外交】关税战 2.0 来袭，中国如何应对？

媒体专访 《南华早报》专访郑永年：如何抵御 “特朗普冲击波”	- 45 -
IPP 专访 王江雨：如何理解美国的 “对等关税”？	刘佳- 52 -
“交易的艺术”：特朗普对华关税战的限度	郭海- 63 -
媒体专访 徐伟钧：我们有能力来对抗美国的单边霸凌	- 67 -
应对关税战，中国有两大底气来源	林辉煌- 77 -
如何理解 “贝森特经济学”	刘深- 84 -
时间线 从 340 亿到 125%：全面复盘中美关税战大博弈	刘昕冉- 89 -
IPP 动态 (2025 年 3—5 月)	- 94 -
研究院简介	- 98 -

【后 DeepSeek 时代的中国人工智能】

数智时代的知识变革与知识创新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导读：

5月27日，2025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分论坛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受邀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以“数智时代的知识变革与知识创新”为题作主旨演讲。

郑永年教授通过回溯社会科学知识产生的三类知识及其方法论后指出，人工智能能够创造出“形而下”的知识，但没有能力创造“形而上”的知识，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知识。从这个视角来看，在知识创造领域，人工智能是不能替代人类的，两者必然会形成一种劳动分工。他认为，我们需要接受人工智能的赋能，但更重要的是要超越它，创造其所不能创造的知识。

*文章整理自郑永年教授在2025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分论坛上的演讲。

自 ChatGPT、DeepSeek 等人工智能工具产生以来，它们以极高的活跃度和用户人数迅速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也自然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影响人类未来的热烈猜测。人工智能发展异常迅速，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人工智能对人类知识创造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产出的文本和图像几乎与人类自己的作品一模一样，难以区分，这给人类知识创造带来了新的挑战。

要理解人工智能对人类知识创造的影响，必须回到人工智能最初的原点，也就是回到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哲学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相关理论提供了依据。这些理论认为，人工智能的潜力在一定程度上可归于它能够扫描大量数据集来学习类型和模式。虽然人工智能永远不会像人类心智那样认识一些事物，但通过与现实模式的匹配积累，它有可能接近人类在感知和理性上的表现，有时甚至能超过人类。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就是模仿或者模拟人类，是先“人工”，后“智能”。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机器本身并没有能够像人类那样思考，而是通过人类获得知识，并在人类知识的基础之上产生知识。也就是说，至少到今天为止，人工智能仍是建立在现存知识之上，而非基于人类所具有的智力和智慧之上。

就知识创造来说，人类现在应当考虑的问题是：人工智能能够创造什么样的知识，不能创造什么样的知识？我们需要接受人工智能的赋能功能，帮助我们创造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超越人工智能，创造其能所不能创造的知识。

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人工智能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人类迄今为止的社会科学知识分成三类：一是来自“形而上”研究的知识；二是来自“形而下”研究的知识；三是介于“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并且作为两者桥梁的知识。从这个分类学看，人工智能是基于“形而下”研究知识的，也就是第二类知识。

近代以来，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形而下”的实证和经验研究，是可以验证的。而在近代之前，人类知识大都是“形而上”的，表现为神学、哲学和伦理学等形式。“形而上”研究在当代被看作是不可验证的，因此不能被视为科学，因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越来越边缘化，尤其是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英美国家。但是，“形而上”研究对“形而下”研究的深刻影响，却被大大低估和忽视了。实际上，很多类型的知识，尤其是哲学、思想、观念、价值、情感等，都来自“形而上”的研究；而来自任何形式的“形而下”研究的知识则很难导向来自“形而上”研究的知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近代之前“形而上”的研究，就不会有近代以来的“形而下”的社会科学。大量的从宏观到中观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假设和命题，也都来自“形而上”的知识。

无论是“形而上”、“形而下”，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知识，它们都指向了方法论的重要性。所有的知识都是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方法论的产物。因此，如果要问人工智能能够创造什么样的知识、不能创造什么样的知识，我们需要回到社会科学知识的方法论问题。根据前面所说的三类知识，我们至少可从三个层面的方法论来讨论。

第一，作为计算工具的方法论。尽管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在从事经验性的实证研究，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使用的方法论的本质。今天，经过漫长的学术训练，学者的

工具箱里拥有了无穷的工具，从大数据分析到微观的案例研究。这些作为工具的方法论强调的是逻辑推理和数学算法，具有普遍性，学者也希望通过使用这样的工具来通向普遍性知识，掌握普遍真理。但是，从实践来看，在人们使用这些工具从事研究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在用异常复杂的“科学方法”来论证一些显而易见的常识。尽管有堆积如山的数据和案例，但我们却无法理解作者到底想说明什么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大量的时间和生命都浪费在数据和案例堆中。更有甚者，很多学者并不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而去找工具，而是倒过来，为了使用某种或者某些工具而去找问题。

第二，作为思维的方法论。如果从材料和工具这个层面寻找问题，肯定会失败。要找到问题的关键，就需要研究者拥有高层次思想层面的方法论，或者说是思维方式或思想方式。现代大学充斥着大量被称之为方法论的教科书。但是，很大程度上来说，从这些教科书里面学习到的方法论很难产生思想，尤其是原创性思想。使用这些方法做出来的研究和写出来的文字没有思想和灵魂，自然没有吸引力，更难转化成人们所说的软力量。例如，在社会科学中，大家都会读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大家学到了马克思的“阶级论”、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和韦伯的“科层论”。对大多数学者来说，他们善于使用“阶级论”“社会分工论”“科层论”来提出和分析他们的问题。但是，人们忘记了，如果仅仅使用这些工具化的方法论，是不能导向原创性概念和理论的，更不用说思想了。学者们最应当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马克思发现了“阶级”？为什么涂尔干能发现“社会劳动分工”？韦伯又为什么能发现“科层”？他们到底是如何发现的？因为“阶级”“社会劳动分工”“科层”都是原创性概念和理论，如果能够回答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就能学会如何从思想层面思考问题，而不仅仅是作为工具应用者。再者，如果回答了这些问题，人们就可从更深层次理解这些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

第三，作为思维的文化动力的方法论。对中国学者而言，即使到了思维这一层面，在思想层面上也还是不够的。说到文化，自然指向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东西方的差异并不在上述这些具体的工具，甚至也不仅仅在思想方法层面，而是源于更深层次的文明和文化因素。这里，宗教和哲学因素极其重要。尽管近代以来宗教几乎和社会科学分离开来，成为被解释的对象，而非解释其他事物的“自变量”，但是宗教思维深深潜入到人们的思维中，很多时候，宗教是以人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哲学形式表现出来的。在这个层面，东西方表现出本质性的不同。在方法论上，西方传统思维具有宗教性特征，表现为“魔鬼”与“天使”的二元划分。反映在社会科学思维上便是“两分法”，例如韦伯的“理想类型”和库恩的“研究范式”等，这种两分法表现在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例如经济学中的“政府”与“市场”、“共有产权”与“私有产权”，政治领域的“民主”与“专制”，社会学领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传统”与“现代”等等。在西方的思维光谱中，这些都构成对立面。这种思维不仅影响到西方学者对自身社会的看法，更影响到他们对非西方社会的看法。例如，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东方”概念，到近代的“东方专制主义”，再到今天各种版本的权威主义概念，其思维是一脉相承的，从来没有变化过。但中国文明则没有这样极端的两分法。尽管中国文明有“阴”“阳”之分，

但两者不是绝对分离的，而是相互嵌入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再如，中国文明也有“文明”与“野蛮”之分，但两者是可变的，孔子因此提倡“有教无类”，所谓的“文明”与“野蛮”只是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之分，任何人通过教育都可以从“野蛮”转向“文明”。

以上三种方法基本上对应了前面所讨论的三类社会科学知识。第一，作为计算工具的方法论是今天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基本上都是“形而下”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研究。第二，作为思维的文化动力的方法论是今天的小众和非主流，基本上反映在“形而上”的哲学、伦理学和宗教研究上，并且往往表现成为一种倡导。第三，作为思维的方法论可以说是介于前面两者之间的桥梁，表现在社会科学的中观理论和概念上。

如果这样，就社会科学知识创造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就容易回答了。简单地说，人工智能能够创造第一类知识，即“形而下”的知识，但很难甚至没有能力来创造第二类知识（“形而上”的知识）和第三类知识（介于“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知识）。对第一类知识的创造，人工智能远较人类高效和精确，而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则依然属于人类的智能和智慧范畴。至少就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技术来说，其没有能力来做这样的知识创造。从这个视角来看，在知识创造领域，人类和人工智能必然会形成一种劳动分工。前面讨论过的维特根斯坦有关对人类思想“划定一个界限”的论断也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即人工智能对它能表达的思想会表达得很清楚，但对它不能表达的思想则会保持沉默。在知识创造领域，人工智能不能取代人类。但是，从近期看，人工智能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冲击是巨大的。正如前面所说的，实证尤其是微观的研究是当代社会科学的主流，但这种研究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可以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文稿整理：刘金程

【后 DeepSeek 时代的中国人工智能】

DeepSeek “出圈” 下一步： 我国如何构建 AI 新变革与创新环境

贾开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长聘副教授、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
研究中心研究员

戴明洁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
究员、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
中心研究员

蒋余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
究员、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

张弦

中国移动研究院中移智库管理与运
营中心研究员、广东新质生产力
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导语：

与大城市越来越寡淡的年味形成鲜明对照，DeepSeek 在近期火爆出圈，引发了各界人士的热情关注。

不去探究复杂的技术问题，DeepSeek 至少有两点是外行普通人特别感兴趣的：一是坚持自主研发，通过与国际科技产业前沿的对话，形成自主的技术路线和科研组织模式；二是坚持开源技术路线，通过多原理和技术集成，实现了相比于许多闭源大模型的成本优势，这就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庞大的用户群。这两点之所以特别吸引人，是因为在长期的大国科技竞争中，人们习惯了从科技的先进性以及先进部门的规模和实力等角度来看待“科技进步”，而 DeepSeek 同时推进自主和开源，使大家意识到，比起仅关注“先进性”而言，“自主做出能广泛使用的先进产品”毫无疑问是更重要的。

国际关系学者 Jeffrey Ding 在 2024 年出版了新著《科技与大国崛起》(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用“通用性技术扩散理论”挑战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占主流地位的“先进部门理论视角”，指出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现在，能够促进先进技术更广泛扩散和应用的制

度才是帮助一国崛起并成功超越原有大国的基础条件。Ding 在他的书里专门辟出一章论述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但是由于 AI 是一个仍处于不断探索过程中的先进技术，作者并没有梳理出针对当前状况有启发的创新形态或者制度机制。DeepSeek 至少在这一方面展现出来令人振奋的亮点：借助开放的创新环境做出更有利于大众使用的先进技术产品。这个实践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值得我们持续加以挖掘。

本期推送的文章，主要部分是我们去年 12 月中旬完成的，在当时，人工智能前沿领域兴起的挑战 Scaling Law 的种种探索，还没有吸引国内观察者的广泛注意。郑永年教授在近期提出一个“中国能否成为开源国家”的问题，系统论述了加大开放力度对于中国的价值。我们将继续沿着这个提示推进思考——对我们来说，密切关注国际科技和产业前沿，是为了更好构建对于中国与世界发展有益的创新环境。中国迈向“开源国家”（开放创新的国家），需要更多地与世界融为一体，也需要更多地激励创新资源在国内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中的扩散。人工智能能否真正成为新一代通用性技术（GPT），还未有确定答案，但类似 DeepSeek 这样在这个方向上的探索努力，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蒋余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多个迹象表明，人工智能前沿领域正步入新一轮技术变革期：作为当前人工智能主流技术路线的大语言模型（LLM），在最近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在近期，国际科技产业界提出一系列技术变革的新探索和新理念。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开放性、创造性和活跃度，已经激发了全球资本、科研和产业各界的新一轮热情。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目前针对大模型而涌现的各种挑战，非不会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造成威胁；相反，正是美国支持多样探索的制度环境，使得科技产业界的持续创新只会不断巩固和加强美国的领先地位。这种倾向在特朗普实施“新政”之后，会变得更加显著。可以预见，特朗普的科技政策将是对内加强创新激励，对外实施更严厉的封锁和遏制，中国面对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总之，相比于关注具体的科技发展细节，中国更需要认真研究激励前沿科技持续革新的制度条件。

一、人工智能主流技术路线面临的困境

大语言模型是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主流技术路线，这一技术路线于 2022 年底因 ChatGPT 的推出而到达高峰。但是，在近期，这个技术路线陷入明显的发展困境。

（一）海量投入的边际收益显著下降，“Scaling Law”效力遭到一定质疑

“Scaling Law”是对过去数年以来大模型发展状况的一种经验性总结，指的是模型性能将伴随网络规模、训练时间、语料数据、算力投入的增加而指数级增长。

在“Scaling Law”引导下，开发大模型的费用越来越高昂。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4 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2017 年最初的 Transformer 模型训练成本约为 900 美元；2019 年发布的 RoBERTa Large 训练成本约 16 万美元；2023 年 OpenAI 的 GPT-4 和谷歌的 Gemini Ultra 的训练成本则分别达到了约 7800 万美元和 1.91 亿美元。据估算，在过去 8 年，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成本每年增长 2 至 3 倍，这表明到 2027 年最大规模的模型训练成本将超过 10 亿美元。

但是，高投入已经越来越不能保证必然带来高性能，“Scaling Law”的效力在近期遭遇质疑。2024 年 11 月，一家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机构发布详细报道指出，OpenAI、Google、Anthropic 这三家科技巨头的大模型新产品并没有达到研发预期：与此前几代产品突飞猛进式的性能迭代相比，OpenAI 新一代旗舰模型（内部定名为 Orion）不能被认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Gemini 和 Opus3.5 同样遇到类似情况，突破性并不显著。在近期，越来越多的技术先锋、企业领袖和知名投资人，都开始公开质疑“Scaling Law”的有效性。

（二）大模型产业集中化程度严重，“公-私”结构失衡影响未来的创新

在“Scaling Law”的牵引作用下，巨量资源和资本流向少数科技巨头，这造成了以这些科技巨头为核心的产业界掌握过强的主导权。科技界权威杂志 Science 在 2023 年 3 月刊登过一篇文章，对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源占用状况（以人工智能人才、算力的流动分布为指标）和产品输出状况（以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基准为指标）进行了数据化测度，指出：少数科技巨头已经获得了相比于高校、科研机构的绝对优势地位，这在科技发展史上还是首次。比如，2004

年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博士生只有 21% 进入产业界，而这一数据到 2020 年已增长到 70%。

大模型产业领域的“公-私”结构失衡，至少带来了两个方面的严重问题：（1）当前 OpenAI 和 Google 开发的大模型，虽然非常依赖海量的公共语料库（包括但不限于维基百科、开源软件、免费获取书籍等），但是却越来越封闭，很少生成新的公共产品；（2）科技巨头控制技术研究与扩散，将影响社会对前沿技术的获取，进而不利于人工智能持续创新。

（三）大模型的多重社会影响逐步显露，利益冲突加剧，面临不确定性

近期，大模型技术在带来一定收益的同时，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治理共识的缺失使得各类冲突频频涌现，使得相关的技术发展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状态。

例如，2023 年 5 月至 10 月，美国好莱坞爆发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编剧协会反对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来降低编剧的单位工资。尽管此次罢工以公司妥协（同意编剧协会要求，在三年内不降低编剧单位工资）为结束，但争议的关键问题之一却并未得到妥善解决：OpenAI 等科技公司使用编剧剧本来训练大模型，是否损害了编剧的版权并因此需要做出适当的赔偿？有评论指出，好莱坞编剧大罢工并非个例，实际上，不仅编剧协会，还有《纽约时报》、美国作家工会等也在 2023 年底陆续开始起诉 OpenAI 等科技巨头。目前，法院对这类案子的态度尚不明确，但可以明显看到，各个利益相关方与科技巨头的分歧已经相当剧烈。

二、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新探索

近期，国际科技产业界兴起对于大模型技术路线的反思，并因此涌现出一系列的探索实践和新理念，力图摆脱“Scaling Law”面临的发展困境。

第一类新探索：仍然坚持“Scaling Law”的有效性，但对这项定律做出重要调整。典型代表是 OpenAI 于 2024 年 9 月发布的 o1 model 雏形。正如 OpenAI 指出的，o1 model 是其探索不同于 GPT 技术路线的新尝试，最重要的差别便是实现“推理时计算”而非“预训练时计算”。具体来说，o1 model 将一个大问题拆分为一系列小问题（即形成推理链条，chain-of-thought），并允许模型在不重新训练的情况下，通过推理时的额外计算来提高性能。这种新的路线更强调对人类推理性认知方式的模拟，能够解决现在的人工智能不能维持答案的一致性以及不能实现长期目标规划等问题。o1 model 并没有完全放弃“Scaling Law”。也就是说，同样还是依赖海量数据、网络、时间和算力进行预训练，但是在此基础上，o1 model 还增加了“推理”的数据、时间和算力，因此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大型模型的升级版。也正是因为有了 o1 model 这样的新探索，微软 CEO 认为，“Scaling Law”并没有达到瓶颈，而是可能以不同的面貌和形式出现。

第二类新探索：部分接受“Scaling Law”可能失效的判断，转而综合多条技术路线的优势，对冲 Scaling Law 边际效用减弱的不足。典型案例是谷歌 Deep mind 的 AlphaGeometry。众所周知，人工智能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着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这两条对立的技术路线，但符号学派早在 1980 年代末期就已经没有了影响力，而 AlphaGeometry 是将符号模型与大语言模型进行了结合，在科技原理上找到了两条对立的技术路线的结合点。AlphaGeometry 的创新性在于，它

基于推理数据库创造出大量合成数据，并基于合成数据的预训练来找到辅助线构建的模式与规律，以此构成针对 Scaling Law 的修正。从实际效果上看，AlphaGeometry 提升了欧式几何题目（平面几何）机器证明的效果（如 IMO30 道题目中做对 25 道），且通过计算实现了添加辅助线的推理能力，从而使证明过程可解释。

第三类新探索：完全放弃“Scaling Law”，对深度学习等当前 AI 主流技术路线进行根本改变，以探索新的技术可能性。这方面的代表性案例是杰弗里·辛顿提出的“非永生计算机”理念（改变当前软硬件分离的“永生计算机”设计）。辛顿指出，传统的“永生计算机”是以计算机硬件与程序软件相分离为前提，程序（包括权重和网络）包含了所有的训练知识，而这些知识与硬件无关，因此硬件可以支撑不同的程序软件进行运行（也就是实现了计算机的“永生”）。但是，辛顿分析认为，这种“永生计算机”的设计，无法解决目前需要消耗巨量能源来进行深度学习的问题，由此需要探索一种新的可能性，改变传统计算机结构。权重或网络的调整不仅在程序层面，而且可以通过采用一种“前向-前向算法”（Forward-Forward Algorithm, FF 算法）的新神经网络学习方法，更好地解释大脑的皮层学习，并且可以在极低的功耗下模拟硬件，从而使这种调整延伸至硬件层面，颠覆传统的软硬件分离的计算机形态。也就是说，计算机结构会随着学习过程而改变，并随着学习的变化或演进或结束（因此，计算机不再是“永生”的）。辛顿提出，非永生计算机可能是解决大模型在当前需要消耗巨量能源问题的“唯一可能性”。

三、激励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制度条件

上述新的技术变革还处在探索阶段；但是，全球资本、科研和产业等各界已经被激发起新一轮热情，由此展现出支持多样探索的制度条件的独特重要性。目前针对大模型发展困境而涌现的各种新探索和新理念，非不会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造成威胁；相反，正是美国支持多样探索的制度环境，使得科技产业界的持续创新只会不断巩固和加强美国的领先地位。

（一）开放的制度环境，是美国始终保持科技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

在开放的制度环境下，“Scaling Law”展现出来的种种问题都会引起科技产业界的重视，并且针对这些问题形成有针对性的探索。比如，是否可能以合成数据来解决训练语料被耗尽的问题，是否可能通过改变计算机软硬件分离的结构来解决大规模运算耗能过大的问题，是否可能在先进芯片领域创造出新的替代性产品，等等。目前，这些探索都还没有形成结论，既不能确定大模型技术路线是否已经发展到了极限，“Scaling Law”的效力是否真的已经耗尽，也无法判断哪一条技术路线可能成为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主流。但不管怎样，在开放的制度环境下，来自世界各国科技产业界的各种新理念和新尝试，在美国都有得到检验的机会，由此形成的多技术路线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维持了美国在科技前沿领域的活跃度和创造力。

（二）产业与科研的高度协同，是保障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前沿技术发展的基础

在人工智能领域，所谓基础科研与产业应用的界限十分模糊。科技巨头目前拥有的基础研究能力及产业转化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学术界和政府机构，由此生产出的科技产品也更具有通用性和应用性，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所以，美国少数科技巨头形成的高度集中化的产业状况，虽然衍生出相当大的社会问题，但这些巨头进行的自我技术迭代以及相互之间的竞争，却是保障美国推进前沿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础。重大的科技产业创新需要巨量资源的投入，而且，在科技探索阶段，也无法仅仅依靠财政资金的投入。因此，如同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说过的那样，没有“寡头之间的竞争”，就很难有在重大科技产业项目上的持续创新，即通过“创造性毁灭”保持领先地位。

（三）激励广泛的创新和竞争，是美国维持社会活力的重要保证

各类挑战大模型技术路线的新探索和新理念，在美国的制度条件下都能得到一定的资助，这是美国开放性创新环境带来的好处。联邦和州政府的财政资助、各类风险投资基金、公益基金、社会基金、企业资金等，构成了极为丰富而灵活的科技产业发展支撑。就目前而言，是否有可能从少数科技巨头之外创造出新的技术路线，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无论怎么说，资本对于各类新探索的关注，给了各种有创造力的尝试接受市场检验的机会。如李飞飞教授在2024年4月宣布首次创业成立World Labs公司（主攻不同于大语言模型的“大世界模型”），在7月的市场估值就突破了10亿美元，9月即完成了2.3亿美元的巨额融资，投资方既包括硅谷知名投资机构a16z、NEA，加拿大风投公司Radical Ventures，以及英伟达公司的风险投资部门等专业科技投资机构，也有许多AI领域知名专家创设的科技企业。在这些投资方中，甚至还有World Labs力图挑战的科技巨头的踪影。

概括地说，美国开放的创新制度环境，为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的不断革新创造了条件。美国的人工智能科研和产业没有停下脚步，反而是以更具创造力、更具探索性、更加能吸引巨量资源投入的姿态在突飞猛进。这种新的技术变革探索，不会撼动美国的领先地位，相反会不断巩固和加强其在世界前沿科技领域中的统治力。在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宣布将大幅“松绑监管”、激励硅谷AI研发、增加对外国的科技封锁和遏制力度。这种趋势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当前，国际科技产业界对于科技和产业问题的敏感度、对于新技术路线的创新性思考，以及国际资本对各种新探索的趋之若鹜，都表明一种新的科技发展范式正在崛起。我们需要推动体制机制变革，适应、建立并且用好这一新范式。如果不跟上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浪潮，就会很大程度上有被排挤在未来科技发展主流趋势之外的危险。

四、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政策的问题分析

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近年爆发式增长，核心产业规模、市场增长潜力以及科研领域的各项指标都已处于世界前列。近期更有爆火出圈的DeepSeek，在大幅度降低成本之后，依然能够实现性能上接近OpenAI等科技巨头推出的闭源大模型。但是，毋庸讳言，与美国整体居于领先水平的人工智能产业相比，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创新性依然不强，在制度和政策层面方面，

还存在许多可持续改善之处。最新的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全球活力工具》报告显示，中国与美国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差距正在拉大。

（一）“重监管”的惯性思维，不利于创建高度创新的环境

中国长期存在一种“重监管”的惯性思维，即：在相关领域的科技和产业没有发展起来时，就急于出台监管措施；之后又由于监管措施本身制定得过于粗疏，而经常不得不在事实上进行“变通适用”或者“有法不依”。据不完全统计，在大语言模型兴起之后，仅在 2023 年 9 月至年底的四个月时间里，部委层面和各地政府就出台了近 30 种监管举措，涵盖面涉及国家安全、科技伦理、个人隐私、数据保护、版权纠纷等。然而，当时的中国大模型研发还处于“跟风”状态，应用方面也刚刚开始有所探索，这些监管举措担心的问题还没有真正出现，只是一种猜测或想象中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监管政策的表述通常是比较原则性的，没有操作细节，即使当真出现了相应的侵权行为，也无法依靠这些匆忙出台的举措来进行处理。但是，这些表述严厉的政策文件，对于产业界产生的影响却是真实的。近年，许多大企业以及一批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都热衷于启动大模型“出海”，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海外的制度环境相对稳定，不会像中国政府这样可以轻易对创新环境进行大动作的干预。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人工智能发展中潜藏的各种风险不要实施监管；而是需要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适合创新的监管”。2022 年，有一位欧洲学者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著作，很有影响力。作者梳理了美国、中国、欧洲的数字技术监管规则，指出美国是“市场驱动型监管体制”，中国是“国家驱动型监管体制”，欧盟是“权利驱动型监管体制”。作者认为，根据各地不同的制度和条件，这三种监管都有其优点和缺点。这部著作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是，我们认为作者没有提供真正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实际上，“适合创新的监管”一定是尊重市场机制的，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发展先行的监管”。欧盟国家在新一代高端科技领域没有培育出有规模的企业，因此在规则制定过程中没有产业界发出的声音，相关的监管规定通常围绕抽象的“权利”而展开，结果是更加严重地限制了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在大语言模型兴起之后，欧盟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应用的企业，以相对小的参数量追求普及效果，如欧洲最大的私人人工智能实验室 Silo AI、法国的 Mistral AI、德国的大模型企业代表 Aleph Alpha 等，在应用方面表现出发展潜力。但是，由于受到欧盟监管规则的制约，这些企业难以获得较大发展，近期都面临被美国大公司收购的情景。欧盟委员会 2024 年发布了研究报告《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提出在人工智能等多个新兴技术领域追赶美国和中国。然而，现实中欧盟面临诸多挑战，如产业基础薄弱，人才大量流向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国家，因此，欧盟能否在这些领域取得显著进步，目前还难以确定。

美国的监管体系是围绕着创新和竞争展开的。在很多案例中，发展与监管之间也经常出现表面看来难以缓和的矛盾，但是，监管机构通常偏重于激励创新和竞争。比如训练大模型的数据语料极为庞大，容易出现版权争议问题，美国目前没有确立统一的监管思路，大量关于“数据权属”的讨论也仅停留在学术研究中，没有对监管政策和司法实践形成影响。这种模糊的态

度的确解决不了已经发生的社会利益冲突，但却为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空间，而随着利益争执的日益显著，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弹性特征也会相应发生作用。如2024年11月7日，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以“原告欠缺美国宪法第3条规定的诉讼资格”为理由，驳回了两家公司针对OpenAI的版权侵权起诉。这是一个以“程序问题”为由的处理方式，既为法律界进一步探讨如何应对相关问题留出了余地，又不至于阻断其他企业或个人实施侵权诉讼的努力。

中国需要避免陷入欧盟的当前发展状况，应当针对创新领域大力实施“去监管”的改革。就新兴产业发展来说，中国和美国领先欧洲太多了，如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4全球独角兽榜》（Global Unicorn Index 2024），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其中，美国有703家，中国有340家，欧盟国家仅有109家，连英国都有53家，印度有67家。但是，中美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另一家专业调查机构的报告指出，美国在通用人工智能（AGI）领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诞生了如xAI、OpenAI等14家大模型相关的独角兽企业，推出了包括AlphaGo、ChatGPT系列等重大技术成果。其中，估值最高的OpenAI，其估值达到了惊人的29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独角兽企业。而中国的生成式AI和大模型相关的独角兽企业共有8家，其中估值最高的企业目前估值约30亿美元，且成立时间仅一年左右。特朗普“新政”的理念是对内增强创新激励，对外增大封锁和遏制，如果我们不创建更为开放的创新环境，有可能“逼迫”我们培育的独角兽及其他优质企业纷纷赴美发展，导致我们与美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二）政策协同性不强，改变不了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的状况

我国的科技发展理念上长期存在一个误区：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转化”的线性思维来看待科技创新活动，人为地割裂了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与产业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在人工智能领域，线性创新思维的危害更为严重，因为人工智能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

其实，我国早在2017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就已经提出“坚持人工智能研发攻关、产品应用和产业培育‘三位一体’推进”的部署。2017年11月，科技部、发改委等15个部委组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办公室，并推出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计划。2022年7月29日，科技部等六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中，由于各个配套性政策相互之间缺乏足够的协同性，既不能克服各部门各自为政的顽疾，又难以深度融入多样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产学研之间的阻碍依然难以打通，科研与产业仍是“两张皮”。

例如，截至2024年，已批准建立了23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但这些平台多依托百度、阿里云、腾讯、科大讯飞等头部领军企业建设，仍然是按照线性思维加以推进，研究成果的转化成本极高，对广大区域和广大行业的具体发展难以形成显著帮助。而且，在该计划的推进中，由于缺乏有效的抓手和引导，虽然平台定位为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创新，然而却不能推动上下游产业的联合，尤其无法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建立联动。

而在基础研究方面，2018年4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清华、北大等几十所重点院校相继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同时，国家在一些条件优异的城市部署了专门负责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国家实验室。但是，经过数年的运作，除了少数几家机构能够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与当地领军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之外，大部分研究机构与产业发展是脱节的，科研成果得不到接受市场检验的机会，从而无法对行业产生影响力。

(三) 对多元探索激励不足，难以形成不断推陈出新的生态

目前，就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研发资源分布而言，在区域层面，我国呈现出明显的东强西弱态势。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2023年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图研究报告》显示，西部地区除成渝经济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并列为人工智能算力四大领先发展核心区域外，其他城市区域全面落后于东部领先地位。

经济发达区域更容易吸引科技资源的涌入和培育新的科技资源，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公共政策需要打破线性创新思维，采取一些激励措施来引导科技资源基于各地的发展需求探索新的科研方向。实际上，美国联邦层面已经在实施这样的激励措施。2019年10月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统筹，联合多个部门发起了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院（NAIRI）项目，在美国五大区域各布局科研资源，研究方法专门强调“基础研究与应用启发性研究一体推进”，研究领域涵盖了多样应用需求：不仅有发达地区领先的大数据、机器学习、算法优化等应用方向，还包括了农业、教育、网络基础设施等在欠发达地区有广泛应用的领域。到2024年，NAIRI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起一个由100余家资助组织、500多个受资助机构和合作机构、约700余名专家参与其中的合作网络，形成了美国最大的人工智能合作生态系统。

我国还没有形成健全的激励多元创新探索的制度机制。第一，创新的资助渠道仍然相对单一。国家的大量科研经费投入高校和科研院所系统，多数成果对经济社会实际发展没有产生直接作用。在人工智能发展领域，除上海、杭州、武汉、广州、深圳等少数城市有政府参与发起和支持运营的人工智能研究院之外，绝大多数地方并没有针对人工智能研发机构的组建制定明确的规划和提供经费支持；第二，研发主体同样相对单一，产业界缺乏创新性的基础支撑。中国的人工智能相关专业人才过于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而这些系统目前的考评措施和激励机制，较难引导大量人才投身于支撑产业发展的科研工作。近年，在大语言模型崛起之后，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涌入这个单一的赛道，形成“百模大战”的浮躁场面，正说明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多数缺少创新性科研。据统计，在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的一年时间内，中国就发布了238个大语言模型，相当多产品性能雷同。DeepSeek-V3的横空出世，一度让媒体惊叹，但是DeepSeek-V3更大的成就是实现了多原理和多技术集成，可以算作工程学意义上的创新，还没有形成引领原创性探索的效果。

五、开放的创新环境的特殊重要性

美国近年吸引了大量中国AI科技人才赴美工作，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才的流失。有统计

显示，在过去 10 年里参加 NeurIPS 大会（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是机器学习和计算神经科学领域的国际顶级学术会议）的 2800 名中国 AI 人才当中，约有 75% 目前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工作，也就是说，有 2000 名左右的 AI 人才已经离开中国，其中大约有 1700 人（在流失人员中占比 85%）人去了美国。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会在其国内实施“松绑监管”，加速硅谷的 AI 研发，同时任命对华持强硬立场的人士出任科技、产业和能源等决策部门的主管。当前，中国最需要防范的就是美国通过内部改革，更大力度地吸引全球资本和科技产业资源涌入，造成中国科技人才和企业的大量流失。此外，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遏制政策也在不断增强力度，特别是对半导体、芯片、AI 算法等核心技术的封锁，使得中国在机器人核心技术的突破面临巨大挑战。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德国、日本、韩国等制造业强国，也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技术的研发，直接影响着全球市场的分配。

面对这种紧迫的压力，中国如果不大力构建开放的创新环境，推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开放创新、自主研发和产业化，未来可能会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不利地位。这里尤其需要强调“开放”对于构建良好的创新环境的重要性。

（一）只有“开放”才能科技“自立自强”

人工智能领域日益增强的技术变革趋势，要求我们构建更加开放的制度政策环境加以应对。而特朗普上台所倡议的对内加强创新激励、对外加强科技遏制，同样要求我们在开放的创新环境中积极进取。事实上，“开放”是真正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基本制度条件，“开放”也是冲破科技封锁和遏制的唯一手段。

需要指出，正是由于美国的遏制政策，导致我们国内出现了一股逆反情绪，把“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曲解为“关起门来做科研”。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关起门来做科研”是做不出对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有用的自主性科研的。我们不从理论上论述“思想市场对于科技进步的重要意义”等等基本原理，仅列举一个事实。2023 年初，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俄罗斯高级记者季莫费·尤里耶维奇·斯科连科的著作《苏联发明史：从 1917 年到 1991 年》中译本，梳理了许多苏联取得的基础研究领域以及高新科技方面的重大成就，但是这些在封闭状态下实现的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与外部世界完全脱钩，与国内的生产实践也完全脱节，最终只能被束之高阁，形成不了“自立自强”的态势。眼下，由人工智能激发起的新型科技发展范式，已经不允许在封闭环境下从事科研和产业发展了，全球的资本、数据、人才、科研和工程力量都被吸引到这些新产品、新理念、新技术变革探索周围，不去适应、建立并且利用好这个新的科技发展范式，就有被排挤出世界主流科技发展潮流之外的危险。

第二，只要我们不自己主动地关起门来，他人的遏制政策也起不到把我们封锁住的效果。有很多细节证明了目前全球资本、科技、产业存在着复杂的关联性。比如，有消息人士指出，在美国联邦政府最近公布的新一轮芯片出口管制名单中，中国的长鑫存储等企业没有被列入，部分原因就是这些企业的主要供应商是亚洲最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之一东京电子，这家跨国企业通过它在华盛顿的商业伙伴影响了白宫的决策。美国对华持强硬立场的政客们自然也能认识

到全球利益关系网的复杂性，所以在近年不断推动政策，要把台积电等先进制造类企业引入美国本土，以便为实施更严厉的科技遏制举措做准备。然而，要引入这些企业需要投入巨量的资金，而且这些先进制造、科技类企业对于从业人员的技能要求相对较高，不会直接给一般选民创造就业机会，因此，诸如此类“为进一步遏制”而不计成本实施的举措，都有可能在美国国内引发冲突、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通常不易落地。

第三，所以，这一点必须得到反复强调：加大开放力度，才是应对当前内外发展环境剧变的唯一正确选择。我们的主张并不是反对“科技自立自强”，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只有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对内对外的开放程度，才能真正在各方面实现“自立自强”。

（二）必须加大对内对外的开放力度

当前，中国最需要防范的，是美国通过内部“松绑监管”来更大力度地吸引全球资本和科技产业资源流入。中国需要大幅实施制度创新，充分激发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等区域在科技资源、产业基础、经济实力方面的优势潜力，以创建新时期的“经济特区”的举措来保障开放性，动员海内外资源，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

第一，支持各地既用好已有的优惠政策，又积极对接各类国际新兴规则。一方面明确形成“国家政策已经规定的内容，地方可以直接适用”的支持性举措，另一方面推动各个区域借助中央的政策赋能，积极对接国际新兴自由贸易规则和金融规则，以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最新国际协议的开放性规定，吸引海内外创新型企业、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落地，创建人工智能全球优质资源聚集区。同时，大力探索新型监管规则，如放松互联网“防火墙”等监管措施，激励开源社区等第三方基于全球的可用数据，独立建立公共数据语料库，支持各类人工智能企业借助公共数据语料库进行模型训练，并且探索应用方案。

第二，创新财政资金的使用方法，形成以财政资金的投入为引擎、链接社会资金共同投入的多元资助格局。通过税收优惠、奖补等多项举措支持各类资本投入人工智能科研、产业化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同时，鼓励各类资金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建设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数据共享、模型训练、测试验证等服务，降低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此外，设立专项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合作建设面向全社会开放的 AI 计算平台，为各行业提供计算资源支持。

第三，大力发展中介机制，加强科研机构对接市场的能力。一是发展“商业中介”助力市场对接。支持商业咨询、市场调研、品牌策划类商业中介机构与人工智能企业合作，对于促成企业重大合作、市场拓展项目的商业中介给予奖励，促使中介机构积极为企业挖掘市场机会，让科研团队专注于技术研发。二是鼓励青年学生从事“科技中介”业务。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激励政策，支持懂技术的青年学生创办专业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链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研究院所等，推动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的落地。

第四，建立“全链条培育人才”的创新性人才政策。打破按照学历、学位、履职经历等标准实施人才招聘、发放人才奖补的方式，突出跨专业性、协同性和实用效应。一方面，通过事

前支持创业创新、事后进行绩效奖励的方法，鼓励各类优秀人才干实事、出佳绩。另一方面，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广泛建立先进技术培训平台，并且出台奖补政策，鼓励各行各业的青年人积极学习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知识，将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与各行各业既有知识相结合，推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产品在千行百业中应用。

第五，建立健全科技帮扶机制，带动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一是建立科技帮扶结对。推行“强企+弱企”结对帮扶模式，组织人工智能龙头企业与欠发达地区相关中小企业一对一帮扶。政府对帮扶成效显著的龙头企业，在税收减免、项目申报优先度上予以倾斜。对被帮扶企业，给予免费技术培训、设备补贴等支持。二是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科技人才培养。支持发达地区的科研团队深入欠发达地区开展技术培训与合作，培育人工智能专业与具体行业领域交叉的复合型人才。三是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共同建设研发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欠发达各行业的普及与应用，尤其是在制造业和农业等行业中，帮助当地提升整体技术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本文得到郑永年教授的悉心指导，同时得到华南理工大学多位专家学者的指导和帮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刘金程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感谢!**

【后 DeepSeek 时代的中国人工智能】

从 DeepSeek 突围，看 AI 领域赶超策略

蒋余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导读：

长期以来，美国凭借技术先发优势以及庞大的算力、数据资源，在 AI 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绕开美国主导的 AI“算力竞赛”，通过开源协作与架构创新，以极低的训练成本，打造了比肩美国顶尖产品性能的大模型。DeepSeek 的成功突围，也唤起了针对后发国家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复制-追赶-复制”发展路径的再思考。

蒋余浩研究员指出，DeepSeek 的突围，增强了以非线性创新观为指导、激励多技术路线探索的政策现实可行性，这种政策可以成为发展嵌入不同行业的人工智能的保障。同时，DeepSeek 的发展路径预示了不同于当前美国少数科技巨头主导科技和产业的图景，将为诸多后发国家和企业展现更丰富的发展经验。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深度求索（DeepSeek）在 2025 年新春前后相继发布开源权重模型 DeepSeek-V3 和 DeepSeek-R1，以相对较小的训练成本、参数规模，实现了堪比 GPT-4o、Claude 3.5 Sonnet、OpenAI o1 等大模型的性能，在短时间内震惊全球。据统计，到 2025 年 2 月中旬，DeepSeek-R1 的活跃用户已达 2000 万。关于 DeepSeek-R1 的技术层面问题，海内外专业人士已有许多评论。然而，DeepSeek 发展经验所展现的对于科技和产业政策领域的启发，却有待深入探讨。本文拟以 DeepSeek 面对的争议为切入，揭示 DeepSeek-R1 等新产品显露的人工智能多技术路线探索的特征，进而分析科技和产业创新政策的着力方向。

一、后发优势的 DeepSeek 抑或更复杂的发展图景？

有一种强烈的讨论声音：DeepSeek-R1 是否仅仅具备后发优势？后发优势通常是指：后发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对于先进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各种有利条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经典著述阐明，后发国家可以通过选择在一定领域内集中资源，引进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节省科研探索的费用和时间，并快速培养本国人才，在较高起点上推动工业化进程。¹仅从后发优势的理论视角来看，DeepSeek 对美国科技巨头大模型技术的借助，使其产品并没有超越此前在许多科技和产业领域进行“赶超”的经验。然而，DeepSeek 的实践还揭示了更复杂的图景，是后发优势理论难以涵盖的。

（一）赶超战略下容纳多种具体策略，形成复杂的科技和产业发展景象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成长为科技能力最强的国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美国科技精英和商业精英将其科技创新网络和工业生产体系向全球延展，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优质且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当地的环境资源、原材料等。这一系列深远的变化铸就了美国科技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统治力。同时，得益于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和工业生产体系的构建，许多原本产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不高的国家和地区，也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如以色列、爱尔兰、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等，借助模仿创新（from imitative to innovation）、弯道超车（from short-cycle to long-cycle technologies）或者换道超车（leapfrogging）等多项具体策略，不但建立了科技和工业发展体系，甚至还发展出了本土的大型高新科技企业，成为该产业全球价值链上不容忽视的竞争力量，并因此冲击了旧有的国际科技创新网络和工业生产体系。²

DeepSeek-R1 的出现，打破英伟达等科技巨头“堆积算力”的路径，在短期内造成美国科技巨头股价暴跌，这个市场反应说明了 DeepSeek 不只是处于后发跟随者的角色，更具有探索新策略的意义。其发展路径至少可以预示不同于当前美国少数科技巨头主导的科技和产业的图景，为后发国家和企业展现了更丰富的发展经验。

（二）后发优势理论无法为如何避免“追赶者陷阱”提供有效指引

由基于后发优势理论而形成的工业化发展策略，经常导致后发国家即使取得了一定程度上

¹ 格申克龙 A. 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M]. 张凤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53-59.

² Keun L. Innovation—Development Detours for Latecomer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的“追赶”效果，也难以摆脱被锁定在先进国家的既定技术路线内的命运。我国在很多重要企业中曾经出现的“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追赶者陷阱”，³是几乎所有后发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都会遇到的困境。就人工智能而言，自 2022 年 11 月 OpenAI 发布 ChatGPT 以来，大语言模型(LLM)成为主流技术路线，获得了世界各国从业者的追捧。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在 2023 年下半年进入“百模大战”状态，到 2024 年 9 月，中国企业共发布了 238 个大语言模型，多数是延续美国科技巨头的路线，但性能上无法与各类有影响的大模型相比，被业内专家批评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DeepSeek 没有沿着这条拼算力的路径前进，其实践探索无论后续将面对多大的争议和困难，都可以说是启发了关于在人工智能领域如何实施追赶策略的反思，表明人工智能还远未到定型阶段，可以进行多技术路线平行探索。实际上，在 DeepSeek-R1 推出后不久，斯坦福大学李飞飞团队和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成功打造 s1-32B 的人工智能推理模型，以不到 50 美元的费用，使用了 16 块英伟达 H100 GPU，耗时 26 分钟就完成了训练。这些人工智能新产品的出现，充分证明在“堆算力”的路径之外，还可以尝试其他的探索方向，避免“追赶者陷阱”。

二、认识 DeepSeek 探索路径的理论视角：非线性创新观

如何从理论上认识以 DeepSeek 为典型代表的创新探索路径及其展露的更为丰富、复杂的发展图景？

在科技研究中，后发国家容易陷入以“线性创新观”来指导制定公共政策的陷阱，也即将创新视为沿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转化”线性路径发展。在后发优势理论和追赶策略的支撑下，这样的政策有相当的益处：一是便于国家集中一定的资源从事重大科技攻关，引导产业发展；二是便于国家对整体的产业结构进行不断调整，适应国际竞争的要求；三是便于国家围绕相应的科技和产业内容制定如外资、外贸、技术引进等配套性政策。然而，一旦认识到科技和产业的发展将会有更丰富、复杂的前景，则这种线性创新观就不足以成为公共政策的指导理念。

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兴起之后，相关领域的科技和产业的创新发展已经清晰展现出非线性发展的路径。哈佛大学科技政策专家指出，近几十年里奠定了信息通信时代基础的诸项科技成果，都具有不易被简单归类为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的特性，而是在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之间存在“互动循环”的复杂关系。例如，双极型晶体管的发明带来了晶体管效应的发现，这些发明和发现集合在一起又创造了应用在电脑、汽车等产品上的各类处理器和芯片；集成电路的发明带来通用计算机的发明，又促进了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结合材料工程的光纤以及异质结构的发明，使全球通信网络在物理基础设施和传输速度上成为可能；旨在提高异质结导电性的材料研发工程，还意外带来了二维系统中分数量子化现象(fractional quantization)以及一种新形态的量子流

³ 陈玲，孙君，付宇航. 政策协调、不确定性与大型技术系统创新——中国核电技术赶超的案例研究[J]. 公共政策评论, 2024(03): 3.

体的科学发现。⁴

与之前的信息通信技术一样，当前的人工智能也是多学科知识、多技术发明集合的产物，既有各个学科基础原理方面的突破，也有在处理技术问题过程中解决一系列挑战的成果。例如，大模型利用了多种技术对模型进行优化和调整，如自监督学习和增量训练等。这种为处理技术挑战而形成的专业知识及技术工具的集成和突破，表明大模型既是一项可供应用的科技产品，又是在多学科融合基础上的一次突变，因此尤其需要确立“非线性创新观”加以理解。人工智能的非线性科技创新特征决定了：其一，可以基于研究端对国际前沿的追踪或者研究领域本身的创新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其二，也可以基于应用端对研究端提出要求，形成新的研究方向，生产更丰富的人工智能产品。DeepSeek 的探索成就，尤其在后一个方面开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实现了对于产品的广泛应用，为再进一步基于多样应用需求而开发更多的科研和技术产品创造条件。

DeepSeek 的这个潜能，蕴藏值得讨论的理论意义。杰弗里·丁(Jeffrey Ding)的新近研究指出，与国际关系经典文献中总结的“先进部门引发全球权力结构变化”的观点不同，实证证据表明，“推动先进技术扩散的制度”对于大国崛起更加重要。他由此勾勒出中国在人工智能竞争中的优势条件：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促进研发和应用扩散的国家战略等等。⁵这项研究将舆论特别关注的创新的“先进性”与“后发性”的对立，引向了更重要的“创新能否获得广泛应用”这个层面上。事实上，DeepSeek-R1 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全球关注，除了基于所谓“后发国家企业挑战美国科技巨头”这一话语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大幅度降低应用成本并采取开源的技术路径，这两点使得各行各业都有了基于自身发展需求来尝试使用这个新兴科技产品的机会。李飞飞曾批评，当前人工智能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公共资源的历史投入与积累，例如目前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多使用 PyTorch 的开源软件平台，没有这个公共资源，就不会有 ChatGPT 和 Claude 这样的科技产品。然而，OpenAI 和 Google 开发的大模型，虽然不同程度借助了开源资源，而且非常依赖海量的公共语料库，但是却越来越封闭，很少生成新的公共产品。⁶这个批评意见其实是业内共识，在经受 DeepSeek-R1 冲击之后，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Sam Altman)也承认选择闭源路线是错误的。DeepSeek 正是充分展现了人工智能的非线性创新特性，由此是更值得提倡的技术路径。

三、激励人工智能多技术路线探索的公共政策

从 DeepSeek 的实践经验能够获得如下启发：切实激励人工智能多技术路线探索，是我们公共政策当前最需要着力的方向，以此才能真正满足多元丰富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从中央到地方近年的一些政策，显示了激励多技术路线探索的意图，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⁴ Narayanamurti V, Odumosu T. Cycles of invention and discover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54-55.

⁵ Ding J. 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4: 195-203.

⁶ GTC 李飞飞专访：再谈 AI 变革，呼吁 AI 资源公共化[EB/OL]. [2025-02-2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3904926054214005&wfr=spider&for=pc>.

义值得持续挖掘。例如，一方面，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显示了非线性创新观的理念，如国务院 2017 年 7 月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了围绕不同的应用需求而一体化配置研发、应用和产业培育力量；另一方面，工业制造、建筑建材、农林牧渔等领域提出的政策主张，深刻表明了探索多技术路线发展的需求，如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4 年 1 月印发的《2023 年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及 2024 年主要工作计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4 年 2 月通过的《“数字住建”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农业农村部 2024 年 10 月出台的《农业农村部关于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的指导意见》，等等。

DeepSeek 在探索更低成本、更便于适用、更为开源的科技产品路径方面的经验，增强了以非线性创新观为指导、激励多技术路线探索的政策现实可行性，这种政策可以成为发展嵌入不同行业的人工智能的保障。进一步的配套性政策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持：一方面拓展应用场景，让不同的科技理念和产品得到应用端检验的机会；另一方面激励学术界同产业界深度合作，既共同解决应用问题，又从应用过程中提炼科学问题，推动实现科学原理的新发现。

***本文发表于《电子政务》2025 年第 3 期，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时代推进包容性增长的国家赋能理论及治理创新研究”成果之一。**

IPP 访谈

Manus 和 DeepSeek 只是开端

受访人：刘少山

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AIRS）具身智能中心主任
PerceptIn 普思英察科技创始人及 CEO
世界青年科学院院士（Elected Member, Global Young Academy）

采访人：刘深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新媒体主管 政策分析师

导读：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围绕人工智能的讨论持续升温，DeepSeek、智能驾驶、AI 问诊等成为两会热词。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深度融合，支持大模型的广泛应用，大力发展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以及智能制造装备。此外，报告首次提出培育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并将其与生物制造、量子科技、6G 并列，标志着具身智能正式成为国家战略性技术方向。

2025 年是否会成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以 DeepSeek、宇树科技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的崛起为各地带来哪些启示？如何看待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3 月 11 日，我们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AIRS）具身智能中心主任、PerceptIn 普思英察科技创始人兼 CEO 刘少山博士，邀请他解析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趋势、人形机器人市场前景以及全球 AI 竞争格局下的挑战与机遇。

问：去年全国两会，“人工智能+”一词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全国两会上，许多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词又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出国家对人工智能愈发重视，认识也在愈发深入。您如何看待和评估人工智能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

刘少山：随着我们的社会从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逐渐迈向自主经济（Autonomy Economy），以具身智能（Embodied AI）为代表的技术将成为核心驱动力，而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也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具身智能是一种新兴的人工智能范式，强调智能体（通常指机器人）主动与物理环境交互，实现智能行为和自主决策。与传统的人工智能仅关注抽象的认知推理不同，具身智能特别强调智能体通过实时的环境感知、动作执行和反馈调整形成完整的闭环，主动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目前，具身智能产业链可划分为上、中、下游三个层次。

上游是核心零部件。过去十年，得益于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零部件领域已取得较好的基础；中游则是基础模型开发和系统集成技术。以 DeepSeek 等基础模型为代表的技术涌现后，我国在该领域已跻身国际第一梯队；下游是应用场景。我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尤为显著，应用场景丰富且广泛，达到国际领先的水平。尤其是在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应用端需求更加活跃。然而，当前产业链的核心问题在于中游的基础模型与系统集成技术尚未完全打通上下游连接，限制了整体产业链的高效协同与规模化发展。

为应对这一挑战，我们研发了以具身智能基础模型 OmniRL 以及具身智能开源系统 AIRSHIP 等为代表的开源具身智能基础模型和平台架构，致力于解决中游系统集成与协同计算的难题，以开源方式打通产业链的上下游技术接口，提升计算效率与系统协同性，从而激活产业链条，推动整个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这种通过建立统一、高效的计算协同架构与标准体系，从中游系统层面连接上下游各环节，将成为未来具身智能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问：有媒体预计，2025 年将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您认为，距离人形机器人或具身智能产品大规模“进入平常百姓家”还有多久？

刘少山：当前具身智能产业正处于从技术演示向实际应用的关键转折点。虽然许多企业都在追求通用型人形机器人，但市场的真实需求往往集中在特定的垂直领域与行业应用上。

我认为，2025 年确实可能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即“应用规模化元年”。届时中国将涌现大量以应用场景为导向的创业公司，它们会在通用机器人平台和具体行业应用之间架起桥梁，推动机器人技术真正落地到各类生活与工作场景中。我们可以类比移动互联网初期的产业发展历程——在安卓与 iOS 刚问世时，生态尚未完善，但已经迅速催生了一批专注特定行业需求的 APP 应用公司。这些公司通过深挖具体场景价值，创造商业收入，反过来推动了平台和基础技术走向成熟。

同样的模式预计将在具身智能产业中重演，围绕通用机器人平台衍生出的新型应用生态将形成良性循环，加速推动人形机器人的普及和市场化进程。从产业趋势看，目前行业积极展示

的各种新技术和应用场景，正是一种健康而积极的市场信号。随着具身智能产品功能和技能的不断丰富与完善，未来一到两年内，很可能会出现少数企业凭借自身突出的竞争优势率先实现规模化量产，从而奠定行业标杆地位。然而，即使实现了物理硬件的量产，距离真正让具身智能机器人或人形机器人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仍有 5 到 10 年的发展期。这不仅仅是因为硬件技术的成熟度，更因为大模型、感知技术、芯片架构以及场景化应用软件生态需要整体协同发展。

目前，即使最先进的 Grok、DeepSeek、ChatGPT 等人工智能大模型，仍高度依赖云端强大算力支持，与人类思维模式、泛化能力和交互水平依然存在显著差距。要使机器人真正贴近甚至媲美人类的思维与决策能力，至少还需经历一到两次重大技术革新。因此，在短期内，人形机器人产业更现实、更可持续的路径是针对垂直行业需求深耕细作，以实际应用落地带动技术进步和产业成熟。推动技术与场景协同发展，形成丰富的生态，才是实现机器人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关键。

问：两会期间，新的 AI 智能体 Manus 也迅速火出了圈，还被认为为是更适应具身智能发展的 AI 模型。您如何看待 Manus？Manus 和 DeepSeek 等中国产品连续爆火，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在全全球 AI 竞赛中占据了有利位置？

刘少山：我认为 Manus 和 DeepSeek 等产品接连在市场和舆论中“爆火”，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充分反映出中国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已经逐步成熟。这类创新产品的涌现，意味着我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正从追随者逐渐转变为领跑者之一。DeepSeek 的崛起并非偶然，它背后反映的是国内日益成熟的创新土壤，这种土壤为更多创新型企业 and 产品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养分。Manus 同样是这一趋势的突出代表，它所展现的更加适合具身智能发展需求的技术特点，更是体现出国内企业在前沿应用场景中实现了真正的技术突破。

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吸引了大批海外人才回流，这正是国内科创环境的显著改善和逐渐完善的结果。此外，以往很多顶级高校的毕业生往往优先考虑出国深造，而现在这种趋势已发生明显转变：越来越多优秀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国内顶尖大学继续深造或投身于产业一线，这进一步夯实了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根基。因此，我个人非常乐观地认为，Manus 和 DeepSeek 只是开端，未来一定还会有一大批像它们一样的创新性人工智能企业涌现出来。它们不仅会持续推动我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也将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占据更为主动、更为有利的位置。

问：也有专家警示，国家对人工智能的重视可能会引发各地政府和资本的“一哄而上”，最后导致“一地鸡毛”。您作为业内人士，是否发现有类似的迹象发生？如何防止类似的乱象？

刘少山：任何一个产业在高速成长的初期阶段，都难免伴随资本和资源的迅速涌入，并可能出现局部的盲目投资或过热现象。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确实存在类似的情况，但我们更应该从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的发展中汲取经验——当年智能电动车产业刚刚兴起时，同样面临大量资

本进入和广泛的质疑与争议，甚至一度出现行业过热的担忧。然而，最终的事实证明，大量资本和资源的集中投入，为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培育出了比亚迪、理想、鸿蒙等一批世界级的领先企业，推动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在全球范围占据了领导地位。

因此，虽然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一哄而上”，但个人认为，我们还是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当前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持续投入和积极的产业布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优化这些投入和布局，避免盲目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为此，政府和产业界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人工智能产业的科学规划和统筹管理，明确各地区特色，形成各地产业差异化的发展方向，并制定更明确、更细致的产业指引与政策支持。同时，通过构建更加完善的评估机制，精准引导资本流动到真正有技术含量、有市场需求的企业和项目中。

总而言之，不能因为担心“一地鸡毛”就停下发展的脚步。我们是可以通过优化管理、精准引导，实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有能力让人工智能领域也像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一样，走出一条由繁荣走向成熟的创新道路。

问：“杭州六小龙”的诞生，让很多地方都开始讨论和学习杭州在培育创新生态上的经验。您认为，其他地方最需要向杭州学习的经验是什么？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比如广州、深圳、香港，在发展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上，有哪些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

刘少山：我认为，杭州“六小龙”的崛起，体现了中国各地创新能力的全面爆发，释放出一种非常积极的信号。我们应该看到，创新生态的培育并不是孤立现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和协同发展的。与其过于关注某个地区成功的单一模式，不如更多思考如何实现区域间的优势互补与协作共赢。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该地区具备鲜明的产业化与国际化特色，尤其是在机器人产业方面，众多产品在国际市场已取得规模化的成功，积累了丰富的制造与出海经验。因此，粤港澳地区更应关注如何进一步提升现有机器人企业的技术水平，以合理的投入实现从传统机器人向具身智能方向的升级。为此，地方政府可以采取积极措施，通过公共资金投入开源具身智能系统的研发，打造类似安卓操作系统一样的开放技术平台，以较低成本赋能大量机器人企业，实现快速的产业升级和产品化。

在我看来，现在各地在学习杭州经验时，更应结合自身禀赋与已有优势，形成差异化定位，推动区域间协同发展、优势互补，这才是实现中国整体人工智能产业长期繁荣的关键路径。

问：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和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可能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也会削弱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制造业竞争优势。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美国企业在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领域仍保有的创新优势，对中国来说是更多的机遇，还是更多的“卡脖子”？

刘少山：这种观点本质上还是延续了过去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刻板印象和旧思维，并没有认识到中国经济近年来向高科技驱动、高增长模式的深刻转型。事实上，中国在机器人

和自动化领域的渗透率早已超过了海外市场，机器人密度也位于全球前列。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早已不再依靠廉价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而是以高效能、高科技和创新驱动作为发展核心。

从创新生态的活力和规模来看，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速度和应用场景的丰富程度，实际上已处于全球前沿，甚至在许多领域已经领先。相比于担忧美国制造业通过 AI 与机器人技术回流，对中国而言，当前更重要的是继续专注于科技创新，加快核心技术突破和应用落地，持续夯实自身竞争优势。至于美国在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领域仍然保有的某些创新优势，当然可能会带来技术竞争和一定的“卡脖子”风险。但从另一角度看，这种竞争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一种激励与促进。正是因为有这种全球性的技术竞争，我们才能不断推动中国的科技企业迭代升级，突破创新瓶颈，最终实现全球领先。

因此，我们不必过于担心所谓的“制造业回流”问题。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那些尚未适应技术快速变革步伐的国家和企业。只要中国继续保持技术创新的强劲势头，在以高科技引领高增长的路径上持续前进，真正需要感到担忧的或许是国外的竞争者。

问：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很多人对未来就业的担忧。尤其在如今就业形势愈发严峻的形势下，许多人都在担忧人工智能会导致工作机会减少，同时也担心自己学无所用，无法适应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对青年人有何建议？

刘少山：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确实引发了人们对就业前景的担忧，但我们需要认识到，人工智能不仅仅在取代某些岗位，更在深刻变革我们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偏向于以知识灌输为主，但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模式不仅不再适用，甚至可能会成为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障碍。

面对人工智能的崛起，更关键的是培养年轻人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驾驭和运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我们需要逐步转向一种以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善于思考，并能够有效与人工智能协作的新型教育模式。

事实上，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会创造出很多新的工作类型，这些岗位并不需要年轻人简单地与 AI 竞争，而更需要他们能够高效地与 AI 协同工作。因此，我对青年人的建议是：与其担忧自己的知识技能被淘汰，不如及早掌握与人工智能相处、协作甚至驾驭它的能力。年轻人应更多地关注如何使用人工智能这一工具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发挥人类特有的创造性和同理心，去从事那些机器难以替代的工作。这也要求我们的教育体系积极转型升级，为青年人提供真正适合未来时代的知识结构与技能培养方案。

【后 DeepSeek 时代的中国人工智能】

从一家游戏公司，看 AI 如何替代人

李 婷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导读：

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对中技能岗位发起冲击。近日，微软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减员工，其原因正是人工智能的应用。国际劳工组织于 20 日发布的报告也显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力的持续扩展，媒体、软件开发和金融等工作岗位也将面临被替代的风险。实际上，除了高度数字化的行业，一些此前被视为“仅人工”的创造性行业、生产环节也因 AI 工具的迭代与渗透，出现不同程度的“AI 焦虑”。

IPP 副研究员李婷通过对游戏产业的调研后发现，AI 不断嵌入多个业务环节，将加速 AI 使用能力主导下的竞争和人员筛选。她认为，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垂直领域的需求将不断催生出不同类型的 AI 工具，这些 AI 工具组合会逐渐形成大大小小的分工合作网络，进而实现对个体和组织的替代。

A 公司是一家聚焦海外市场的休闲游戏公司，团队规模在 30 人左右。目前，该公司正在全面运用 AI 技术降本增效。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不少人主动或被动离职。笔者希望通过讲述这家游戏公司的实践，为读者还原一个人类被 AI 替代的微观场景。

一、AI 焦虑，AI 扩散

数字化是 AI 运用的前提。游戏行业数字化程度高，与 AI 的亲 and 性强。在 ChatGPT 出现以前，很多头部公司已经在特定场景开始运用 AI，比如在设计游戏角色时使用 AI 技术，以及在开发人机对战模式中运用类 AI 技术。然而，传统的 AI 依赖规则和专用模型，需针对每个任务单独设计算法，开发周期长、成本高，且泛化能力弱，只有少数头部企业能够实现。

以笔者调研的 A 公司为例。2021 年，该公司曾尝试在游戏关卡项目中运用 AI 对抗技术实现关卡自动生成。然而，仅仅是为了完成这一项工作，就需训练一整套系统并开发专有模型，测试周期至少 3 个月，成本高昂。此外，该技术只能用于单一环节，降本增效的效果十分有限。A 公司经过综合评估后很快便放弃了该方案，转而回归传统的人工关卡编辑。

ChatGPT 出现之后，大模型可以通过“预训练+微调”的模式，将海量数据转化为通用能力，实现“开箱即用”。用户使用 AI 的成本大大降低，而且效率也得到了显著提升。在 A 公司所处的游戏出海行业，ChatGPT 的问世让几乎每一个公司都产生了“AI 焦虑”。A 公司自然也不例外，开始在各种业务场景中使用 AI。该公司的业务架构主要由研发、产品策划、美术、增长运营等岗位组成，部分工作如翻译、剧本等则采取外包的形式。其中，文字类工作最早引入 AI 工具。由于 A 公司是出海企业，最早应用 AI 工具的是翻译业务。此前，A 公司找国内的翻译公司，每年需要花费 15—20 万元人民币；使用 AI 工具后，A 公司每年的翻译成本只需不到 100 美元。

随后是剧本创作。公司原本有两人专职做剧情策划。由于产品面向欧美市场，这两个岗位的员工不仅要有剧本创作的基本能力，还需具备英文叙述能力以及剧情把控能力。因此，公司专门招聘了一位美国人和一位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中国人。两名专职人员每月薪资合计高达数万元。但如今，借助 AI 技术，同等工作的成本可大幅压缩至不到 100 美元。

此后，A 公司逐步拓展 AI 应用至客服与聊天系统、游戏基础策划方案以及信息调研等业务领域，各环节的工作效率均有明显提升。在文字类工具之后，“文生图”或“图生图”的 AI 技术也得到广泛运用。在美术部门，AI 工具主要用于图标、UI 和原画。运用 AI 工具之后，整体成本减少了 40%，员工工作效率提升 2 倍以上。美术部门由 10 人裁减至 6 人，整体效率反而大大提升。尽管这类 AI 工具多采用开源模式，但实际使用门槛其实不低，涉及设备部署、模型训练等环节。不过，从最终带来的效益来看，这笔投入性价比颇高，总体成本也仍在可接受范围内。接下来，在视频制作领域，AI 工具主要用于广告素材及游戏视频的效果与质量优化。过去，这类工作流程复杂、成本高昂。如今借助 AI 技术，可以快速完成相关制作，单个视频的制作成本也从上千元降至 10 元。

在程序方面，因为技术难度大、数据需求高、内容不可控、兼容适配更加复杂，AI 工具的使用目前还存在困难。已有的工具大多只能帮助解决部分技术上的难题，尚无法实现自动编码，带来的效率提升比较有限。但从未来趋势看，程序相关的工作也会因为 AI 的使用而获得效率上的显著提升，部分人也会因此被替代。预计到 2026 年，将有 50% 的开发工作由 AI 完成，程序员主要承担审核和测试等工作。

不同 AI 工具的组合使用，进一步推动了 AI 的扩散。以美文的文生图为例，一开始要实现文生图，需要大量提示词，这对专业知识要求高。专业知识还原为提示词的能力几乎决定了文生图的质量。如果提示词不准确，后期就需要花大量的功夫来调试结果。而调试成本过高，就可能导致 AI 工具被弃用。但随着更多类型的 AI 工具被生产出来，有些工具能根据需求直接生成符合要求的提示词，再将其用于文生图类专业的 AI 工具中，就能够解决上述问题。技术发展过程中，垂直领域的需求不断催生出不同类型 AI 工具，这些 AI 工具的各种组合逐渐形成大大小小的分工合作网络，实现对个体和组织的替代

二、面对 AI 冲击，抗争还是适应？

对于 A 公司而言，AI 的使用已成为生存前提。国内外同行都在充分利用 AI 来实现降本增效，如果不用，就势必会被淘汰。在这一大趋势下，企业员工也只能接受 AI，只是不同人在认知和能力层面存在差异。那些拒绝使用 AI 的人最先被淘汰。之所以有部分人会排斥 AI，一方面是因为担心 AI 会取代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习惯于现有的工作方式，认为学习 AI 太繁琐、难度大，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从表面上看，这体现的是认知问题，但实质上反映的却是能力问题。在缺乏统一技术教育的情况下，信息渠道高度分散，个体对于技术的感知呈现出高度分化的特点，进一步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到 AI 发展的刚性趋势。此外，一些企业也未能完全跟上 AI 应用的浪潮，无形中也给了那些拒绝 AI 的人以“退路”。从技术应用的角度看，没有技术背景的人使用 AI 的难度更高，时间成本也更大，而往往正是这类人最容易对 AI 产生排斥情绪。随着 AI 深度嵌入业务，对员工 AI 使用能力的培育变得愈发刚性，加速了 AI 使用能力主导竞争和人员筛选的进程。

在 A 公司，有人就主动提出离职。主要原因是：其他同事使用 AI 后工作效率大大提升，自己跟不上，手上的活越来越多，很多项目卡在自己这个环节，导致自己压力越来越大，最终难以承受。事实上，即使这类员工不主动辞职，公司也很可能将其辞退。可见，在公司内部，一个环节的 AI 化，会倒逼同一链条上其他环节的 AI 利用进程。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组织内某些人使用 AI，那么其他人也不得不使用 AI。

这一点在美工环节也有所体现。美工包括原画设计、3D 场景制作、特效制作、3D 角色制作等。其中，原画设计最早引入 AI，这一环节运用成熟之后，其他环节也不得不提升 AI 的使用效率，否则整体生产就会在某一个环节阻滞，影响整体进度。

由此看来，技术带来某个环节效率的显著提升，也会推动着业务全链条和全环节的 AI 化。

这将加剧 AI 能力竞争，并加速 AI 对人类的替代。

那些业务能力强且积极使用 AI 的人，也在加速 AI 替代人类的进程。业务能力强的人往往掌握更多的“know-how”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与经验一旦被用于赋能 AI，就可能复制出多个“高效员工”。这也意味着，即使某人积极使用 AI，但只要业务水平不足，也有可能被替代。更不用说那些缺乏持续学习能力、无法及时更新业务知识的人，这类人注定更难保住工作岗位。

三、或许会消失的休闲游戏

AI 技术浪潮正裹挟着每一个从业者，将其卷入技术替代人类的进程中。对 A 公司而言，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与成熟，游戏制作各环节的人力需求会进一步减少。

但颇具吊诡意味的是，从更长远的视角看，游戏行业本身就可能出现大幅萎缩——至少休闲游戏领域是如此。这是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被 AI 替代，许多人不再需要每天忙于工作，或者需要人类从事的工作会越来越少的，这就导致哪些在工作缝隙里用于解压、摸鱼和打发时间的休闲游戏，可能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对于游戏行业从业者而言，他们并不一定愿意看到这一幕。但是在 AI 快速扩散的趋势下，每一个人都别无选择——他们只能作为 AI 扩散的推手，一起奔赴那个未知，且令人有些许惧怕的未来。

【后 DeepSeek 时代的中国人工智能】

“AI 民主化”之后， 不能放弃对人文性的“深度求索”

李明令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导读：

随着深度求索（DeepSeek）开源 AI 模型横空出世，AI 的开发门槛和训练成本大大降低，全球范围内“AI 民主化”的进程大大加速。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是在劳动力市场的渗透度上，还是与个体生活的融合上，AI 与人类社会的接触面将不断扩大。眼下，对人类与 AI “此消彼长”的担忧正在增长——AI 时代人类的特质何在？如何确保技术进步不会削弱人类的价值与福祉？

因此，关于“AI 人本主义”的讨论也正当其时。人工智能顶尖学者、斯坦福大学的李飞飞教授近期在巴黎人工智能峰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 AI”概念。她认为：尊严、能动性与社区性，应当构成人工智能发展伦理的基石。IPP 助理研究员李明令认为，“AI 人本主义”实际上有两层深刻内涵：一是让 AI 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而非取代或控制人类；二是管控 AI 可能引发的次生风险，让 AI 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共生伙伴。他强调，在充满人文性的 AI 时代，技术与社会是亲和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亦是统一的。

国产大语言模型 DeepSeek 的爆火，让许多国人切身体会到了“AI 时代真的到来了”。DeepSeek 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了可以比肩 ChatGPT-4o 等通用大模型的高性能，引发网络舆论对 AI 的又一波讨论热潮——在 DeepSeek 横空出世之前，国内早已经推出了几十种知名大模型，但其中真正“出圈”的大模型屈指可数，似乎仅限于年轻一代或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人士在讨论。从笔者的春节返乡体会来看，这次 DeepSeek 的爆红已经令那些只读到初中学历、五六十岁的长辈也已经开始讨论 AI 大模型，更不论 DeepSeek 所引起的巨大国际声浪。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DeepSeek 已经让“人工智能”的话题，真正进入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认知之中。

近一个月，已有非常多的文章在讨论 AI 发展背后的国际竞争、创新机制、科技环境以及企业组织文化等话题。但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另一个我们在未来几年都要面对的问题需要讨论——我们应该如何适应 AI 时代？这个问题不仅关乎 AI 自身的研究和发展，更涉及 AI 的发展方向、人类在 AI 时代的自处、AI 引发的社会变革等等更加关乎我们自身命运的重大时代议题。

一、新一轮数字平权：“AI 民主化”

在 DeepSeek 诞生之前，人工智能有着鲜明的“数字鸿沟”特征——即不同群体在 AI 的接入、使用和受益上存在结构性差距的“AI 鸿沟”。但 DeepSeek 的诞生，已经大大缩小了这一鸿沟。除了让更多人知道国产大模型之外，DeepSeek 已经能够让更多的开发者参与到人工智能的开发中来，也让更多人可以用得起人工智能。就人类社会而言，AI 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超越阶层、学历和国家的公共产品。如今，DeepSeek 让这一时刻提前到来了。就这一点而言，除了本身的技术创新之外，研发团队对 AI 公共性的认识至关重要。DeepSeek 就主要在开发和使用的两个层面，实现了 AI 的“数字平权”。

其一，DeepSeek 通过开源，实现了 AI 从头部企业垄断到广大开发者参与的开发模式转变。“开源”就是开放源代码，把自己的产品代码通过相关平台全部公开。2024 年 12 月 26 日，DeepSeek 上线 V3 大模型时便同步开源，直接发布了 53 页的技术报告，成为世界上首个全开源的混合专家模型（MoE）。2025 年 1 月 20 日，DeepSeek 上线 R1 大模型，同时在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上发布其模型源代码。在此之前，OpenAI、Google 等巨头企业主导的闭源大模型还在试图营造算法的“黑箱”世界，绝大多数研究人员和开发爱好者均难以获悉大模型内部的奥秘。DeepSeek 的开源，可以称作是 AI 开发领域的一场“民主化”——既允许用户把模型下载到本地运行，使用和融入自身的数据库；又方便相关人员进行特定的修改和二次开发，参与到模型的优化过程中。相较于头部科技企业的“正规军”来说，大多数研发人员可以被称作“草根开发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草根”无法为 AI 的突破性创新做出贡献。正如 Meta AI 首席科学家 Yann LeCun 所言，DeepSeek 的出现并非是“中国战胜了美国，而是开源战胜了闭源”。

其二，DeepSeek 通过低价甚至免费策略，实现了 AI 从“会员独享”到“大众普及”的使用模式转变。DeepSeek-R1 的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服务定价低于 ChatGPT-o1 近 30 倍。而且，“普通用户”不仅可以在 DeepSeek 上获得各种问题的解答，还能看到大模型进行深度

思考或推理的过程。相较而言，如果要在 ChatGPT-o1 上看到这种“高级”效果，就需要首先成为会员——会员费用高达每个月 200 美元。DeepSeek 的这种面向大众的普惠应用，直接冲击了 AI 企业现有的盈利模式，快速推动了新模式在 AI 产品圈的流行：2 月初，受 DeepSeek 推出的影响，OpenAI 发布的 o3-mini 大模型也宣布实施开源和低价策略。从技术普及的角度看，全球 AI 技术的“民主化”大幕正在升起。

算法改进、算力节约以及技术开源已经成为 AI 进入普通人世界的技术基础。“AI 民主化”也将掀开了更有意义的科技竞争新篇章。正如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 Jeffrey Ding (2024) 在《技术与大国崛起：扩散如何塑造经济竞争》一书中指出的：（大国竞争胜出的）决定性因素不是谁先创新，而是谁能更有效地采用并扩散创新。纵观从蒸汽机、电力到信息网络时代的技术革命史，谁能更有效地推进技术普惠，谁就能成为真正的赢家。

二、作为工具的 AI：事本主义的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被认为是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如今，以通用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愈发成熟。那么，在 AI 技术逐渐普及之后，AI 如何为人所用？会对就业结构带来哪些冲击？这两个问题，本质上都是将 AI 工具化，是以“事本主义”的视角看 AI。

当笔者向 DeepSeek 询问它可以帮人类做什么事时，它给出了如下回复（经过笔者简化）：

1. 知识整合和学习辅助：复杂信息简化、个性化学习支持、跨领域知识连接。
2. 效率提升与决策支持：自动化处理重复任务、多维度分析、实时信息整合。
3. 生活场景的智能化支持：日常事务管理、情感陪伴与沟通、文化传播与教育。
4. 创意激发与协作创新：打破思维定式、协作增效、技术普惠。
5. 伦理与责任的平衡支持：风险提示、价值观校准、可持续性建议。

在社交平台上，也有许多网友都展示了 DeepSeek 的超预期回复，比如怎样设计旅游攻略、如何提出司法应对方案、怎样制定酒店价格策略等等。因为 DeepSeek 的回复具有本土化、场景化、个性化等特点，因而受到许多用户的追捧。这体现出，AI 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在具体场景中的真实需求，还可以结合用户个人给出的条件，输出“私人订制”般的回复，而不是陷入一般的套话当中。这些，都充分体现了 AI 的三大特点：工具性、人机互动性、情境性。

在事本主义的框架下，AI 就是人类处理具体事务的辅助工具，甚至是替代工具。一方面，AI 以实际效用为导向，帮助人类实现特定目标，实现“工具—目的”的适配关系。另一方面，AI 依托于大数据，通过深度学习实现智能化与自动化，其能力已超出普通人。进而，这就引发了一个诘问：工具应该服务于人，还是要把人力替代掉？“事本主义”视角，既在期待技术效能，也在制造就业焦虑。

我们也必须看到，AI 的“工具性”，有两重先天性的不足：其一，AI 数据来源局限于过去已经产生的数据，但无法探究未经数据化的事物，也难以生成更高阶的认知内容。其二，AI 与人身感知的疏离，令其无法取代人类身体、情感与行动的实际体验。这两重不足，将进

一步突显出人类创新和实践的重要性。这提示着人类在未来要更关注不可数据化的“隐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例如地方性的非正式规范、亲力亲为的实证调研等等。

三、从“网络社会化”到“AI 社会化”

“社会化”指的是个体通过学习和内化社会规范、价值观念、角色期待、行为模式和文化知识，逐步适应社会生活并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自互联网普及以来，网络空间已成为继家庭、学校、工作场所之后的又一个社会化场景，且持久性地伴随人们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

自从人类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互联网也进一步重构了人们的生活和交往方式——互联网形成了一个区别于现实社会的虚拟空间，不仅青少年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受到网络社会文化的影响，中老年人也可以在短视频等网络应用中实现“再社会化”；与此同时，人们在网络空间也同样要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遵守道德法律等社会文化规范；现实社会中的许多交往，被同步转移到了网络平台之中。因此，“网络社会化”已经成为今天人们无法绕过的一个成长门槛。

在 AI 时代，人类会像进入互联网时代一样，展开全新的社会化进程吗？这可以细分为两个问题进行廓清：第一，人们该怎么跟上 AI 时代？第二，人们如何借助 AI 完成更好的社会化？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要适应 AI 社会，就要和当初面对互联网一般，积极地拥抱和使用 AI，学习理解 AI 社会新的规则，增强个体的主动性。对于第二个问题，以通用大模型为例，不仅我们要学会如何向 AI 提问，相关机构也可以协助制定各个年龄段的“提问清单”，比如可以让年轻人结合自己的经历询问 AI 怎么面对失败、怎么和父母相处、怎么防范陷入自卑情绪等等，从而引导青少年进行自我探寻。

在移动互联时代，人类社会已经出现这样的趋势：人们愈发忽视人际之间的社会交往，越来越自我，仿佛越来越不需要他人。那么，在 AI 时代，伴随着 AI 教师、AI 玩伴、AI 恋人等新技术的出现，人类会更加个体化、原子化吗？郑永年教授（2024）在接受访谈时指出：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讲集权主义下的原子化，是因为统治者为了统治而把老百姓隔离开来。人类渴望“communication”，希望交往。但是，现在变成人类厌恶交往了，都是通过人工智能这种社交媒体在交往。

或许有人会质疑：在 AI 时代，讨论“社会化”是否过时？在 AI 时代讨论“社会化”的意义是什么？笔者认为，技术不是让人不需要人，而是让人面向更本质的东西，面向更加积极的社会化。AI 时代的社会化，不应只是发生在 AI 平台，更应该发生于现实世界中 AI 所生成不了的部分。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强调实践、强调经验世界，更强调人与人相处的微观体验。

另外，除了人在 AI 时代的社会化——AI 协助人的社会化（AI for socialization）——之外，AI 自身还要实现自身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for AI）。只有 AI 的进步更具有社会性，才能让 AI 更周到地服务人类。一方面，开发者要考虑人工智能的社会维度，积极地将社会文化融入人工智能系统，为 AI 接入社会世界的知识，而不仅仅是片面的数理知识或科学知识。另一方面，营利性企业不能片面考虑利润、工程科学家也不能片面考虑执行任务，还要汲取人文社会

科学家的智慧，反思社会伦理、权力控制、社会不平等、社会偏见等现实问题。

四、对人文性的深度求索

人工智能科学家李飞飞 (2023) 在其回忆录《我所看到的世界》中指出：人工智能技术虽然能带来巨大的变革，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类福祉和生活质量。她始终强调人类在科技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要始终保持对人类价值的关注。2019 年，李飞飞教授在斯坦福大学领衔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所”。这一研究所的英文全称是 Stanford Institute for 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 HAI)，直接突显了“以人为中心”的基本旨趣。HAI 在简介中说出了该研究所的成立理由：

1. 人类面临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为了让这些变化有益于人类，我们需要让人工智能能够理解人类。

2. 为此，人工智能的创造者必须代表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各种学科。

3. 人工智能创造者的共同责任是引导人工智能对星球、国家、社区、家庭和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在技术与社会、AI 与人类的复杂关系上，HAI 代表了人工智能科学家的警惕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敬畏，体现出一定的伦理自觉和社会责任。他们已经较早地意识到，技术发明的目标是帮助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社会。对此，学界将 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 简称为 HCAI。

关于 HCAI 的研究在这两年也越来越多。其中，日本立教大学教授 Rezaev (2025) 提醒：不能只是把“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当成新的流行语。也就是说，HCAI 不能沦为一句口号，要切实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对人类有益”。

这也引出了 AI “人本主义”的第一层内涵：让 AI 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而非取代或控制人类。健康、安全、和平、幸福……这些都属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正是基于此，科学家尝试将 AI 应用于医疗诊断、环境气候监测、老年照料、数字治理、学生教育等等，并让这些技术向基层、贫困地区、低收入群体推广，以克服这些公共服务背后的社会结构藩篱。

那么，在 AI 的发展及应用已经势不可挡的背景下，带着技术变革的诉求，我们应该如何减少新技术产生的负面影响呢？

这进一步引出了 AI “人本主义”的第二层内涵：管控 AI 可能引发的次生风险，让 AI 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共生伙伴。当然，这背后涉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只有全球间的持续对话、协商议事、共同治理，人类才能一起应对 AI 带来的挑战。

总之，在充满人文性的 AI 时代，技术与社会是亲和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亦是统一的。笔者相信，这也会更加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定义的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和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

(参考资料略)

在 AI 时代，反思技术与人才的关系

杨庭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导读：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拓展，机器正在更多领域逐步超越人类智能。如何在技术逻辑之外重申人类价值，如何让“类人”的 AI 赋能而非取代人，将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长期课题。

IPP 研究助理杨庭轩指出，未来的技术发展路径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技术决定论”的影响，但通过人才培养和教育创新，我们可以保持人类的独立性和多样性，将技术应用引导至对人类有益的方向，从而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中保有人类的核心价值。

近年来，在全球技术发展加速的背景下，人工智能（AI）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过去几十年中，技术进步塑造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迅速发展，给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社会结构带来了深远的变革。这些技术进步让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提升空间，但同时也带来了人类社会对失业、伦理失范和人类核心价值遭到冲击的担忧。

本文将从“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角度切入，探讨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陷阱”，并提出在智能社会中体现人类价值的创新人才培养策略，为未来智能社会的技术与人文融合提供思考。

一、“人工智能”的担忧与潜在逻辑

2024 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巴黎的 VivaTech 大会上再次强调了他对 AI 的警示观点。¹他认为，AI 的进步将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结构，甚至带来根本性的存在威胁。2017 年世界政府峰会上，马斯克讨论了 UBI 在缓解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挑战方面的必要性。而在 2024 年的巴黎 VivaTech 大会上，他推测人工智能取代所有人类工作的可能性为 80%。马斯克预测，随着 AI 的广泛应用，“工作将变得可选”，多数劳动将被 AI 和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基本需求将更多依赖技术来满足。在这样的未来情境中，人类的工作或许仅作为“爱好”而存在。他提出“通用高收入”的概念，旨在应对大规模失业对社会的冲击。这种观点显示出技术进步对社会再分配带来的挑战，反映出技术在重塑经济政策和资源分配上的主导地位。马斯克进一步表达了对 AI “意义危机”的担忧。他援引科幻作家伊恩·班克斯的《文明》系列小说，描述了一个由先进技术主导的乌托邦社会，但也提出疑问：在如此高度自动化的未来社会中，人类是否还能找到情感满足？他指出，未来的问题可能在于“生活的意义”。

伊恩·班克斯在《文明》系列中描绘了一种理想化的 AI 形象，这些 AI 被赋予超越人类的智能和道德能力，代替人类成为文化社会中和平、繁荣和自由的维护者。当 AI 能够在工作、创造、服务等方面超过人类时，人类是否还能保持生活的价值感？马斯克甚至提出，人类或许会为 AI 赋予意义，这表明他对未来的技术掌控力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期待技术带来福利的同时，也警惕其对人类存在价值的潜在侵蚀。

社会学家 Tom Arcaro 对此深表认同，并将马斯克的警告与“技术决定论”联系起来。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变化，而非人类自主决定技术的发展方向。马斯克的警示反映了“技术决定论”中的一个关键观点：即技术的创新往往会带来不可预测的长期影响。例如，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最初无法预见该平台会对全球 20 亿用户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²

¹ Samantha Murphy Kelly. Elon Musk says AI could take your job — but not in the way you think [EB/OL]. CNN. (2024-05-23) [2024-10-29]. <https://edition.cnn.com/2024/05/23/tech/elon-musk-ai-your-job/index.html>

² Tom Arcaro. The unstoppable for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vs. the immovable object of capitalism [EB/OL]. Elon University. (2017-09-12) [2024-10-29]. <https://www.elon.edu/u/news/2017/09/12/in-my-words-the-unstoppable-for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vs-the-immova>

同样，AI 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广泛社会与经济后果，很可能也超出人类的预期和控制。马斯克的观点与“技术决定论”的核心思想高度一致，二者均对 AI 的不可控性及其可能引发的意义危机保持警惕，揭示了技术发展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AI 作为一种强大且迅速发展的技术，既可能推动巨大进步，也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社会文化变革。正是这种不可逆、超出人类控制且具有决定性的技术力量，使得 AI 的发展成为技术决定论的典型例子。

二、“技术决定论”及其带来的“技术陷阱”影响

技术的迅速发展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其决定性影响的多方面思考。简单来说，“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对我们的生活有着重要影响。这一观点在大众想象和政治言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例如认为互联网正在革新经济和社会。然而，反对者则主张，技术本身是由社会决定的，或者认为技术与社会结构在一个非决定论、不断涌现的过程中共同演化，抑或是认为任何特定技术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其如何被实施，而这种实施方式本身也是由社会所决定的。从“技术决定论”的角度来看，技术跃进往往塑造着社会的结构和文化，许多学者认为其影响甚至是不可逆的。然而，技术决定论者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带来了隐性的社会风险，包括失业、社会不平等和技术伦理等问题，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技术的主导地位。

此外，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并非单向，社会需求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对其产生反馈，强调了在技术进步中保持社会主体性的必要性。“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发展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认为技术会不可避免地塑造我们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甚至文化习惯。Daniel Chandler 和 Rod Munday 指出，³新技术是社会结构和过程的宏观层面发生重大社会和历史变革的主要原因，同时在微观层面，通过特定工具的日常使用，对社会和心理产生微妙但深远的影响。不论具体的技术“革命”是什么，技术决定论者（无论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都将其描述为一种戏剧性且不可避免的推动力量，其“影响”将导致深刻且“广泛”的效果或后果。这样的过程中，技术的影响显得“不可逆转”，是因为社会往往难以在技术发展的潮流中保持独立。批评者则强调，技术发展并非独立于社会需求，而是受制于社会的推动，强调社会对技术发展方向的反作用。“技术决定论”相信，技术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力量，能够自发解决社会问题。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并未迅速发展的过去，学者 Frey 和 Osborne 在 2013 年的研究中指出，到 2030 年，美国 47% 的岗位可能被自动化技术取代，这一预估引发了人们对技术至上主义带来失业危机的担忧。⁴

短期来看，这种“技术决定论”推动了生产力的提升，但长期则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和就业困境。因此，技术决定论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效率提升上，也给我们提出了有关技术伦理和人类核心价值的思考。

ble-object-of-capitalism/

³ Chandler, D., & Munday, R. (2011). *A dictiona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⁴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未来经济格局[EB/OL]. (2023-09-15). [2024-10-29].

<https://www.mittrchina.com/news/detail/3584>

实际上，技术与社会并非简单的单向关系。技术发展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也被社会需求所影响。例如，互联网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沟通和协作需求的推动。学者 Jonas Hallström 提出，当技术成为不可控制的力量时，会产生社会失控的风险。因此，需要一种更平衡的技术观，以避免技术完全主导社会发展方向，削弱人类的主动权。⁵技术进步的益处并非均衡分布，部分群体因技术替代而面临失业等困境，形成了所谓的“技术陷阱”。“技术陷阱”指的是，当技术进步的收益未能均衡分布，反而加剧了部分群体的失业或生活困境。技术的进步一般分为劳动力替代型和赋能型。劳动力替代型技术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工人的就业风险，而赋能型技术则鼓励工人提升技能，从而获得更高的劳动回报。以制造业为例，自动化设备的广泛应用导致了大量工人失去工作，而只有少部分掌握技能的工人能够受益于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的“技术陷阱”反映了技术进步带来的短期经济收益与长期社会风险的不平衡。学者袁冉东认为，扩大“科技人口”规模是科技突破的关键。⁶技术决定论容易导致对人力资本培养的忽视。突破“中等技术陷阱”需要大量具备基础研究和动手能力的人才。然而，过度依赖技术自主性，忽视对“科学人口”和“技术人口”的培养，导致缺乏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储备，从而难以实现原创性突破，使得技术进步长期停留在中等水平。这种对人力资本的忽视，使技术进步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撑，进一步加剧了技术陷阱的形成。劳动力替代型技术尤其使部分岗位消失，而只有少数掌握高阶技能的工人受益于技术进步。为跨越这一陷阱，扩大科技人口、推动创新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此外，“技术决定论”忽视了隐性技术知识的重要性。隐性技术知识需要通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和技能传承，而不是单靠技术自主发展所能获得的。缺乏对隐性知识的重视，意味着技术难以从中等水平向更高水平迈进，限制了技术在“从 4 到 7”向“8 到 10”的提升，导致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从而陷入技术停滞的状态。因此，技术决定论虽然强调了技术进步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但过度依赖技术自主性容易忽略社会和人力资本的关键影响，进而导致“技术陷阱”的形成。规避这种陷阱，需要修正人才政策，重视对科学人口和技术人口的培养，拓展人力资本的价值，使其成为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只有通过拓展人的价值，才能更好地实现技术与社会的协同发展，确保技术真正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

三、如何在技术决定论背景下拓展人类价值？

在“技术决定论”的视角下，人工智能（AI）作为一种强大且迅速发展的技术，逐渐展示出类人智能的特质，其感知、学习、思维、决策等能力甚至使其被比喻为“类人才”。然而，AI 尽管展现出强大性能，在本质上依旧是由人类创造并为人类服务的工具。面对“技术至上主义”和“技术决定论”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在 AI 逐渐渗透各行各业的

⁵ Hallström, J. (2022). Embodying the past, designing the future: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reconsidered in technology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Education*, 32(1), 17–31.

⁶ 袁冉东. 科技人口、隐性技术知识与应用技术创新[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3, 38(11): 1645–1654.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 20230813003.

背景下，如何有效保持人类的核心价值，并在未来社会中保持人类的主动性？

首先，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导致低技能劳动岗位的消失，迫使社会重新评估人的价值。传统上，人的价值被定义为经济产出，但随着这些任务被 AI 接手，人的价值应更多地基于创造性、人际交往和经验等非物质因素。因此，未来的人才培养应注重提高决策与创新能力，使人类与人工智能紧密协作，共同推动社会进步。教育系统应关注培养学生的洞察力和创造性，而不仅仅是技术技能，确保人在决策和创新中的核心地位。

其次，人类在情感上的独特性是其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尽管 AI 在计算和数据分析方面展现出卓越的效率和准确性，但人类的情感、意识和自我认知依旧是 AI 无法替代的核心领域。AI 虽然可以通过模式识别模拟出某种“情感”反应，但其本质上依旧是数据和算法的产物，缺乏人类情感的真实性和多维性。人类的情感源于生物、文化和生活经验的交互，具备深度和复杂性，是人类关系中不可或缺的纽带。这种深刻的情感交流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核心联结，也赋予了人类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价值。因此，未来的人才政策应关注对情感和人文价值的培养，确保人在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得以保持。

最后，人工智能虽然在效率和精确性方面优于人类，但其决策往往基于历史数据，可能存在偏见。相比之下，人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基于深厚的文化和生活经验，这些是人工智能无法复制的。因此，人才政策应注重培养多元化的理解与包容，特别是在涉及种族、性别和文化差异时，确保人在社会中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得以尊重和发扬。教育系统可以通过跨学科课程、跨文化合作项目等方式，帮助学生发展多元视角，使其在未来能够有效地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这种多元性不仅将成为未来人才的重要特质，也有助于避免技术发展对社会多样性和文化包容性的侵蚀。

通过修正人才政策，发挥技术决定论的长处，规避其短处，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技术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充分发挥人的决策力、情感和多元价值，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类的整体福祉。未来的技术发展路径不可避免地受到“技术决定论”的影响，但通过人才培养和教育创新，我们可以保持人类的独立性和多样性，将技术应用引导至对人类有益的方向，从而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中保有人类的核心价值。

【后 DeepSeek 时代的中国人工智能】

低成本 AI 与生产率变革： 数字化转型的机遇

张心旂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导读：

近期，OpenAI 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 DeepSeek 发起指控，延续了此前围绕数字威权等议题的争论，本质上是对 AI 竞争格局的进一步博弈。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西莫格鲁称，DeepSeek 目前只是满足了用户好奇心的工具，尚未展现出在企业应用中提高生产力的潜力。但事实上，统计数据显示，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兴起的信息通信技术（ICT），早已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状况。然而，即便如此，各国围绕 AI 技术主导权的竞争却不断加剧，这一矛盾反映了人们对新技术突破传统创新瓶颈的高度期待。

本文首先探讨了由于 ICT 在推动生产率增长方面的局限，及其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格局的影响与塑造作用。随后，文章分析了低成本新兴数字技术的出现如何“唤醒” ICT 突破传统创新的边界，并通过数字化转型重塑低生产率行业的增长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数据安全风险，并提出应对这一风险需要技术、政策与治理体系的协同推进。此外，针对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就业的挑战，本文强调应积极推进数字技能培训，并加强就业市场与教育培训的有效对接，以确保 AI 时代的经济增长能够实现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一、ICT 的边际效益递减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

在过去几十年间，发达国家将中低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一个依赖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与进步来驱动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内部良性循环。上述的这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内在局限性导致的。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角，ICT 主要提高了办公和服务业的效率，但在工业制造和农业等实体经济领域的影响相对有限。

经济学家 Robert J. Gordon 认为，ICT 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已经大幅减弱，单靠其推动生产率提升已难以为继。1920-1970 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2.82%，但在 2006-2016 年下降至 0.97%。¹相反，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等核心领域，才可能带来新一轮生产率的跃升。因此，全球资本会自然地选择支持更具突破潜力的新兴产业，尤其是在掌握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期望借此形成新的增长动能，从而持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资本追求最大效益的本能行为，即资本会流向能够带来更高生产率提升、更高回报的新兴领域。

二、数字化转型与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机遇

然而，低成本 AI 技术的出现颠覆了这一传统逻辑。它带来的最核心变革在于，让 ICT 在推动生产率提升方面重新焕发生机。ICT 的局限性在于，它的增长效应往往集中在特定领域，且具有较强的边际递减特征。例如，办公自动化、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在短期内带来了效率提升，但对传统制造业、农业等实体经济的渗透能力有限，因而未能像前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通用技术（如电力、蒸汽机）那样带来持续的生产率跃升。而 AI 的潜力在于，它不仅提升信息处理能力，还能够与自动化、机器人、物联网（IoT）等深度融合，直接改变物理世界中的生产过程。如果这一转变得以实现，那么 AI 可能真正成为类似电力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 GPT），其影响力将远超 ICT 革命所能达到的范围。

我们的调研显示，在中低端制造业和农业领域，数字化转型往往是信息化和智能化同步推进的过程。这是因为，这些行业的企业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其转型往往无法跳过单纯的信息化阶段，直接进行数字化转型。于是，原本利用“ICT+”难以提高生产率的农业、工业生产，由于 AI 的赋能而被彻底改变，实现了降本增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例如：

1. 农业领域：小农经济曾限制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的发展，但农业无人机结合 AI 程序可以在小范围精准喷洒农药，大幅提高效率，并减少农药对喷洒人员的健康损害。

2. 制造业领域：过去，传统制造业的质检环节依赖人工，一条生产线可能需要十名工人以缓慢的履带速度检查产品瑕疵。而现在，基于视觉神经网络的 AI 质检系统可以更高速度、更精准地检测缺陷，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加快了产品出货速度。

原本，ICT 技术在这些行业无法直接提升生产率，因为这些生产或者作业环节涉及复杂决

¹ Gordon R J. Why Has Economic Growth Slowed When Innovation Appears to be Accelerating?.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8.

策，而不仅仅是信息集成。另一方面，AI 赋能的实现也离不开 ICT 作为基础设施（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因此，让 AI 具备辅助决策能力，反向推动了 ICT 技术在农业和制造业的深度渗透。

如果新兴技术的突破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而是更多地出现在发展中国家，那么全球生产率增长的传统叙事可能会被改写。毕竟，分布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中低端制造业在 AI 和 ICT 技术的双重赋能下，依然具备贡献新增长率的潜力。简单而言，这一机遇的本质就是依托新兴技术，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创造新的生产率增长空间。

三、来自数据安全和劳动就业的挑战和应对思路

数字化转型发展推动生产率增长的另一面，也伴随着诸多挑战，其中数据安全和劳动就业问题尤为突出。

首先，在数据安全层面，隐私泄露、商业机密外泄、国家安全风险等问题早已引发广泛讨论。Shoshana Zuboff 在其著作《监视资本主义》（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²中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个人隐私的侵蚀，强调大型科技公司如何利用数据监控用户行为，将其转化为商业利益，进而引发更深层次的社会控制问题。Yanis Varoufakis 在《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³中则进一步提出，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再是传统资本主义的延续，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数据封建体系”，其中企业掌握着庞大的数据权力，个人和国家则愈发丧失数据主权。这些观点反映了数据治理危机所带来的广泛悲观情绪，也促使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对数据安全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在这一背景下，OpenAI 对于 DeepSeek 的指控重点突出其潜在的各种安全隐患，但值得注意的是，OpenAI 本身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否则，很难解释其负责人在被问及模型训练数据来源时为何含糊其辞。这也恰恰说明，数据安全问题不仅仅是某家企业的责任，还是整个 AI 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全球挑战。

然而，陷入无休止的安全与发展、乐观与悲观意识的讨论对于实践的帮助非常有限。这并不是说讨论安全问题毫无意义，相反，因为数字技术与核武器相比后果更加致命和隐蔽，同时又更少地依赖国家动员规模的力量。但是，对于安全议题最值得讨论的方面应该是如何最大程度减低风险，而不是消灭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数据安全风险？笔者认为，数据安全治理不仅仅要依赖技术防护，更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技术很难应对数据安全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技术+治理”并行，以构建一个更加稳健的数字安全体系。在思考解决方案时，笔者联想到中国基层治理中的“三防工程”，即人防、物防、技防。

在数字化领域，“技防”涉及强化 AI 及 ICT 领域的数据安全技术，如隐私计算、数据加密、联邦学习等技术手段，以减少数据泄露的可能性；“物防”则包括建立可信的数据基础设施

²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³ Varoufakis, Y., 2023.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 London: Bodley Head.

施，确保数据存储、跨境传输的安全性，强化行业标准；“人防”实际上最不起眼但却至关重要的，需要完善治理体系，加强企业自律和用户数据保护意识。

其次，劳动就业挑战不仅影响社会稳定，也直接关系到数字化转型的可持续性。如何在推动安全且低成本的数字技术发展的同时，确保劳动市场的稳定和就业机会的创造，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必须应对的问题。

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创新本身，更取决于其对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渗透。正如《创新的起源》一书中作者引述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话：“对于那些有钱买足够多的蜡烛并雇佣仆人照顾他们的人来说，电灯并无太大好处。……伊丽莎白女王拥有很多长筒丝袜。但是，工业化生产的成就不在于让女王拥有更多长筒丝袜，而在于让工厂女工凭借日渐降低的劳动量也能拥有长筒丝袜。”⁴技术创新的真正价值在于普惠性，即技术是否能够推动更大范围的生产力提升，并惠及更广泛的劳动群体。

乐观地看，如果 AI 能够像电力（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成果）一样，深度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就有望突破 ICT 创新的“一次性”局限，成为长期推动生产力提升的核心动力，从而塑造 AI 时代独有的增长模式和就业格局。这或许也正是 AI 乐观派坚持将其比喻为电力的原因，即不仅因为 AI 本身是一种强大的技术，更因为它具备与其他技术结合、推动整体经济体系变革的潜力。

但是，AI 时代能否真正创造可持续的就业增长，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更取决于社会如何适应和引导这场变革。因此，技术变革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仍不容忽视。在 AI 预期乐观的前景下，社会需要采取现实可行的应对措施，以减少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比如，一方面，政府可以依托高校、职业院校和在线教育平台，建立面向普通市民和企业员工的“数字技能终身学习平台”，通过在线培训、社区教学中心和企业定制化课程等多种渠道，提供涵盖 AI 基础技能和行业应用技能的培训项目，实现从入门到专业技能提升的持续教育。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就业市场与教育培训的有效对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广泛参与的“数字就业服务平台”，实时发布岗位所需数字技能标准，并引导教育机构根据就业市场需求灵活调整培训内容和课程设置，从而改善技能供给与就业需求错位问题，降低结构性失业的风险。

⁴（英）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 创新的起源：一部科学技术进步史[M]. 王大鹏，张智慧，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关税战 2.0 来袭，中国如何应对？】

媒体专访

《南华早报》专访郑永年： 如何抵御“特朗普冲击波”

受访者：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译者：周宇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 IIA 学术编译组成员

导语：

当下国际局势波谲云诡，美俄会谈引发各界关注。郑永年教授在今年 3 月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指出，美俄若达成以牺牲乌克兰为代价的和平协议，将对国际秩序产生巨大冲击。同时，虽有对美“联俄抗中”的猜测，但美俄间的历史积怨使其难以形成真正联盟。面对复杂形势，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以太极之道应对“特朗普冲击波”，在台湾等问题上坚守原则，展现出强大的战略耐心。

郑永年指出，“大国竞争不是一个大国打败另一个大国，而是一个国家自己打败自己，这种自我打败本质上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特朗普经济政策存在破坏全球贸易体系的潜在风险，而中国应把握开放机遇，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放宽监管，释放创新活力，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同时，中国要重视外资与民企信心的恢复，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应对“卡脖子”困境。此外，在社会层面，需要进一步加强“软基建”，从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南华早报：美国和俄罗斯正在就结束俄乌冲突进行协商。美俄关系突然解冻将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增加美国“联俄抗中”的可能性？

郑永年：每个人都想结束战争，但如何结束是个问题。人们主要担心的是，潜在的和平协议可能会以乌克兰为代价，因为乌克兰和欧洲方面都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这样的协议可能会对世界造成损害，因为签署如此协议等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最后一击”，也代表着18世纪和19世纪“强权政治”或“丛林法则”的回归。

有媒体报道称，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建议美国与俄罗斯结盟以对抗中国。美国国内认为“中国是主要竞争对手”的共识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但现在不同于整个西方世界都反对苏联的冷战时期。现在，如果华盛顿和莫斯科达成协议，欧洲的反应可能会成为地缘政治变化的新因素。而且，美国右翼势力的崛起有可能拉动欧洲右翼势力，从而使世界陷入新的混乱。这是最坏的情况。

美国也有可能不会在和平协议中完全把欧盟或乌克兰排除。即使北约不参与，欧洲也可以继续支持乌克兰。也有讨论称，如果北约不部署军队，欧洲可能以自己的名义在乌克兰驻军。

中国不应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而应在战后重建中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符合俄罗斯的利益。然而，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根植于百年的竞争和历史积怨，这不是特朗普个人所能改变的。虽然特朗普可能会寻求缓和美俄关系以对抗中国，但这种策略的可信度仍存疑。即使美俄关系有所缓和，也很难形成一种联盟关系。作为霸权国家，美国不会允许自己的体系内出现一个强大的对手。中国也不是苏联。简单地将中国与苏联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中国没有自己的“华约”。

南华早报：特朗普内阁对中国表现出强烈的敌意。中美该如何控制风险并保持交流？马斯克作为特朗普的亲密顾问和在中国拥有利益的亿万富翁，他能否在接触中发挥作用？秘密联络渠道将如何发挥作用？

郑永年：我们绝不能幻想会出现另一个“基辛格”。我认为，即使基辛格今天还健在，他的角色也会大打折扣。马斯克也不会成为另一个“基辛格”，因为权力结构与过去不同。对中国来说，更现实的做法是实行“单边开放”，向美国公众和资本开放。如果美国公司能在中国获利，就会有更多的“马斯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最重要。对等开放是几乎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能更加开放，资本自然会流入。就像免签政策一样，只要提供了便利，就一定会有人来。

南华早报：有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裁撤将造成空白，而中国恰巧可以填补空缺。您怎么看？

郑永年：这完全是误解。美国国际开发署是冷战时期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成立的。它以前主要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干预其他国家。美国从全球舞台上的“退群”并不意味着是中国的机会。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拥有庞大的财政资源，说服其他国家，

而且最重要的是可持续性。

自从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1992 年发布《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之后，美国就一直在走下坡路。现在的形势多严峻啊。如果中国想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就必须考虑清楚：我们想成为世界警察吗？我们有能力成为世界警察吗？能将这个角色维持多久？

我多次说过，中国一定要吸取美国的教训，避免卷入外国内政。我一直很欣赏“朝贡体系” (tributary system)。与美国霸权主义不同的是，美国霸权主义对世界许多地区进行深度干预，以至于它不能轻易退出，否则就会造成这些地区的不稳定。而“朝贡体系”则不会如此深陷其中。“朝贡体系”是灵活的，以不破坏当地现有秩序为原则，注重贸易和商业，就像丝绸之路一样，不干涉他国内政。

南华早报：如何更好地应对“特朗普冲击波”？在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上，紧张局势是否会加剧？

郑永年：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如果特朗普对中国产品征收 60% 的关税，美国就会面临高通胀，因为许多中国产品不容易找到替代品。美国资本还没有准备好重新工业化在国内生产中低端产品；而美国消费者也没有准备好接受新一轮的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可以用中国的方式来应对，就像打太极拳一样——当对方出拳时，我们不应该立即做出反应，而是应该先观察。同时，应该思考如何与特朗普达成交易，因为他把“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 放在首位。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将供应链和产业链延伸覆盖到美国、欧盟和东南亚市场，在当地设厂，而不仅仅是卖产品。

在台湾问题上，应该保持战略耐心。我们寻求和平统一，也不会放弃使用军事手段。虽然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去中国化”。我们还需要战略思维。各方都在反思乌克兰战争。但台湾不是乌克兰，问题的本质也不同。我们不想成为另一个“俄罗斯”，台湾地区也不想成为另一个“乌克兰”。中国今天有“一国两制”，历史也能提供丰富的启示和反思。清朝在西藏和新疆有不同的管理制度，云南和广西也有不同版本的土司或“头人”制度。中国有句古话：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异而不争。

以英国为例，从国内治理来看，英国采用“一国一邦” (one nation, one state) 的制度，但同时也面临苏格兰寻求独立等问题。当大英帝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它所实行的是对他国的“分而治之”，对印度和南非等殖民地采取了这种做法，其遗留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

更重要的一点是：“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人为创造出来，那将非常危险。当今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台湾地区是不可能从中国分离出去的。

战略定力同样可以用在应对中菲在南海问题上的关系上。我们（中国）有能力接管在仁爱礁“坐滩”的菲律宾船只，但我们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这一问题。美国不会为了菲律宾对抗中国。

我认为特朗普不会与中国开战。美国社会在战略思维上存在误判，即从中东和欧洲撤退转向印太地区。美国的利益深深植根于欧洲和中东地区，一旦减少在其中一个地方的存在，都会带来混乱，进而适得其反，影响美国在那里的利益。中国有足够的国防力量来保护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们的国防预算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美国是全球霸主，但中国没有这样的野心，也不会在全球进行多样化的军事部署。

南华早报：如何评估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郑永年：在经济方面，有三个“不要低估”不容小觑。第一，不要低估特朗普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潜在破坏。第二，不要低估资本“再全球化”的潜力。资本是全球化的核心。正是资本及其生产要素、技术和人口流动推动了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

但特朗普的政策思维内部存在冲突。他希望放松对美国产业，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管制，希望资本遵循他的保护主义政策。但资本不能局限于美国，仍然需要到海外去获利。这对于欧洲的资本投资也是如此。只要美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就仍然会流向全球。

第三，不要低估中国的开放能力，中国的开放可以与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动完美结合。资本没有意识形态，但政治家有。对于拜登来说，中美关系是意识形态的博弈，是无法交易的。对特朗普来说，中美关系可以比作美元对人民币。打个比方，就像国际交易需要汇率一样。对特朗普来说，一切都是手段。他本人可能对意识形态没有强烈的信仰，但如果意识形态有用，他就会用。这一点可能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不同。

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内，金融将得到更多的重视。他对加密货币和比特币的政策不仅会影响中美关系，还会影响全球货币体系。欧洲可能也会感到担忧。

中国一直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针对中国的金融战也将波及全球。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已经开始为本国货币结算做准备。任何威胁都会加速“非美元化”进程。

南华早报：您曾警告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并将亚洲称为“火药桶”。我们离亚洲的一场大规模战争还有多远？

郑永年：这种风险确实存在。人类的记性非常差。对许多国家来说，战争似乎非常遥远，但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已经感受到了战争的影响。现代战争与过去的战争截然不同。历史上，任何地区只要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就会成为地缘政治斗争的中心。过去四十年来，亚洲一直是最繁荣、最和平的地区之一。尽管该地区贸易往来频繁，但我们也看到了政治信任的缺失、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抬头。政治家们应更加谨慎，降低战争风险。

南华早报：您还提到了“东升西降”命题的一些变化，其中的“东方”指的是印度。那么，中国的立场是什么？

郑永年：印度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野心勃勃”的。它的目标是取代俄罗斯，在全球舞台上形成中美印三极，同时在七十七国集团（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中凸显“中印俄三

足鼎立”的核心地位。一旦印度赶上中国，它就会和西方发生冲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美之间的冲突一样。未来几年，由于特朗普的影响，国际力量将发生重大调整和分裂。而欧洲能否实现自治仍是一个大问题。不久之后，特朗普就会对经济和地缘政治带来冲击，我们需要密切关注。鉴于中国的市场潜力，我们需要加强重塑全球贸易体系的能力。

南华早报：2月17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引发了广泛讨论。这是否预示着民营企业的政策环境可能发生实质性变化？这次会议对民营企业会产生哪些影响？

郑永年：我始终认为，大国竞争不是一个大国打败另一个大国，而是一个国家自己打败自己，这种自我打败本质上是一个发展的问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美国，而在于苏联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失败。美国只是苏联解体外部环境的一部分。实际上，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理念是有道理的，它主要解决的是国内问题。

中国也面临着国内发展问题。民营企业的贡献非常大，不容忽视。各部门已经出台了很多支持措施，这次会议就是要重申对民营的背书与支持。

南华早报：您还提到，迫切需要为民营企业创造一个更加宽松和放松管制的环境。为什么这很重要？

郑永年：中国也应该向美国学习，放松对企业的监管，下放权力，因为这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复兴。中国在高科技、生物制药、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等领域监管过度，发展不足，相比之下美国正在放松对这些领域的监管。我们的确需要设定红线，如环境保护、劳工权利和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但不要阻碍技术向经济活动的转化。

如果我们不放松对地方官员的约束，而是继续加重束缚，那么就很难培养一个负责任的地方政府。正因如此，我支持马斯克所倡导的改革，虽然目前美国精英们因既得利益受到威胁而无法接受其中的许多改革。

特朗普采取了行动削减官僚主义，他将其称为“深层国家”，而“深层国家”确实相当腐败，还披着民主和自由的外衣。中美竞争的关键在于哪种制度更有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斯克是正确的。我们不应低估马斯克推动的改革。

冷战时期，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任命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改革国防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开始，麦克纳马拉的效能系统备受争议。然而这种系统一直沿用至今。

技术进步不是由 DNA 或文化决定的。儒家文化也有无穷的创造力。国与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其核心是人的竞争。人的潜能能否充分发挥，取决于体制和机制。

南华早报：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崛起对中美竞争意味着什么？中国该如何创造更多“DeepSeek 式”的科技惊喜？

郑永年：DeepSeek 的出现，让曾经垄断、高度集中的发展可能变得“去中心化”。这也说明了放松管制的重要性。“杭州六小龙”初创企业的成功正是因为没有政府干预，民营企业

得以茁壮成长。中国的企业家们有充沛的创业精神，民营企业具有无限的自生能力。因此，最关键的是地方政府要为他们营造相应的发展空间。

南华早报：您的一本书讨论了“中等技术陷阱”。美国正在推动高科技与中国脱钩，收紧“小院高墙”的科技限制。中国该如何率先推动高科技发展？

郑永年：关键在于技术进步。任何经济体，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如果没有科技推动产业升级，就很难成为发达经济体。“中等技术陷阱”是指我们在向高科技产业链上游移动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美国一方面在高科技领域对我们施加最大压力，另一方面又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进行再工业化。以芯片为例，中国可以大规模生产7纳米的芯片。而美国可以生产更先进制程的芯片，但产量很低，尽管它们非常重要。在应用技术范畴中，我们处于低端。但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在应用技术方面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能力。

此外，我们正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的技术与日本和韩国的模式基本相似。在工业化初期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在模仿和应用西方技术。例如，起初日本产品质量较差，但后来日本的品牌发展得很好，甚至超过了美国。韩国也走了类似的道路，在汽车和技术等领域向日本学习了很多，然后才进行自主创新。

中国的技术发展道路与这一模式尤为相似。中国的生物医药从仿制药起步，现在正逐渐生产出更多的原创药品。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也是如此。但中国的问题在于监管过度。硅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独角兽公司都是由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创办的，他们得益于宽松管制的经济。一到美国，他们不仅能获得资金，还能立即将自己的创新成果产业化。这就是美国的吸引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美国制造”不是美国人制造的，而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在美国制造的。

中国的深圳、广州和长三角拥有庞大的游戏产业。但由于监管过严，许多公司难以立足，一些公司不得不迁往国外，如印度尼西亚。同日本和韩国发展的早期阶段类似，中国的技术发展已经上升到了创新的起点，但我们的体制尚未改革，或者说改革还不够。这些改革势在必行。否则，资源和人才将流向美国。

南华早报：如何留住外资？

郑永年：如果中国的民营企业不能茁壮成长，外国资本也不会茁壮成长。

我认为，保障企业家的财富和人身安全至关重要。否则，外国投资者就不会对我们有信心。对外资的影响与几年前在房地产、互联网和教育培训行业采取的监管行动有关。这些行业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大本营。要恢复外资的信心，首先要恢复中国民营企业的信心。

南华早报：体制和机制改革也是应对美国控制中国的“卡脖子”战略的一种方式吗？

郑永年：是的，这正是释放生产要素的希望所在。过度的管制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可以通过放松管制来刺激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从而发展私人船只和生物医药等许多新行业。

我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波士顿生活过，那里的家庭不仅有房、有车，还有私人船只。以

中国的造船实力，民营船业将比低空经济更令人瞩目。但目前对成为“海洋经济强国”的理解似乎仅限于近海养殖，这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的经济学也受西方影响很大，没有充分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了解中国消费者的心态。政府必须通过确保就业和工资增长来刺激经济，这将有助于我们迈向消费社会。中国的中产阶级也相对较少。我们有 4 亿中产阶级人口，从绝对数字上看，这个数字很大，但从比例上看只占总人口的 30%。只有当这个比例上升到 50%至 60%时，中国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消费社会。

南华早报：中国出现了多起对普通群众的恶意袭击事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放缓和社会福利制度的缺陷有关。您对此有何看法？

郑永年：需要加强我讲到的“软基建”，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健、教育和公共住房。这些基本方面必须管理好。我对我的家乡浙江提出过三项建议：设立保护社会基层的“安全网”；扩大中产阶级群体；对富人群体不设定上限，鼓励富人赚更多的钱，然后通过慈善事业回馈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社会。

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没有发展，再严格的治安管理也难以有效解决问题。

【关税战 2.0 来袭，中国如何应对？】

IPP 专访

王江雨：如何理解美国的“对等关税”？

受访人：王江雨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终身教职）

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

采访人：刘佳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导语：

当地时间 4 月 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悍然宣布实施“对等关税”，利用国内法律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关税。这一行径不仅公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最惠国待遇原则，更直接冲击了世贸组织多边运行机制。自宣布“对等关税”以来，特朗普政府一边持续提升关税水平，一边又保留与各国单独谈判的空间，企图通过“交易艺术”，最大化胁迫各国对美让步，将自身发展代价转移至别国，以缓解美国国内的财政赤字困境及制造业空心化等棘手问题。

美国不断挥舞的关税大棒，将给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带来怎样的冲击？中美关税战与贸易战将走向何方？作为全球重要贸易大国，在世界贸易规则岌岌可危之际，中国应发挥怎样的角色与作用？

4 月 12 日，IPP 就上述问题采访了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终身教职）王江雨。在访谈中，王江雨教授深入分析了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对全球经济秩序、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见解。

IPP：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以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巨大为由，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实施前所未有的“对等关税”政策，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国际经济法的角度，您如何理解对等关税？

王江雨：从国际经济法的角度来看，“对等关税”这一概念在以往的国际经济体系以及国际贸易法体系的认知中是不存在的，就是说现有国际经济法规则体系，本身既不认可也不鼓励所谓“对等关税”，不仅没有给这个概念提供法理基础，更是毫不含糊地禁止这种做法。特朗普口中的“对等关税”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此我们只能先望文生义。

假设存在两个国家A国和B国，按照“对等关税”的字面意思，如果A国对B国征收多少关税，那么B国就应对A国征收相同数额的关税。然而，特朗普以“对等关税”的名义对其他国家征收的关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对等”的关税。实际上，特朗普的关税是根据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计算出来的，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报复性。因此，他所谓的“对等关税”也并非真正的“对等”关税。

以越南为例，特朗普对越南施加46%的所谓对等关税。再看韩国和日本，特朗普也对这两个国家施加了百分之二十几的名义上的对等关税。但实际上，韩国和日本与美国之间都存在自由贸易协定，其平均关税几乎没多少，接近零关税。如果按照真正的对等关税来计算，特朗普对韩国和日本征收的关税本应接近于零。

但特朗普是基于贸易逆差的算法来确定对等关税的，而并非我们所说的算术平均意义上的对等关税。越南虽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重要商品出口国，但越南自己也并没有对美国的产品施加高达46%以上的关税。由此可见，特朗普所施加的对等关税在国际经济法的框架下显得十分奇特，是一种与传统国际贸易规则相悖的行为。

IPP：在您看来，应该如何理解此次美国特朗普政府施加“对等关税”对全球经济体系所带来的影响？

王江雨：特朗普政府此次以“对等贸易”、“对等关税”为名发起的这场针对全球，尤其是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可以说是国际经济发展史上，尤其是二战之后国际经济发展史上一个极具颠覆性的事件。尽管以往也出现过各种“贸易战”，但与如今这场规模巨大甚至到了荒谬程度的贸易战相比，之前的那些都只能算是“游击战”。具体而言，特朗普发起的这场贸易战，其颠覆性和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危害是自由贸易理念遭到冲击。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几乎完全颠覆了二战之后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并奉行的自由贸易理念。自由贸易理念是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尽管各国可能对这一理念的接受和认可程度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二战之后，尤其是冷战之后，大多数国家都生活在以自由贸易为内核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体系之中，中国更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

中国改革开放后融入这一体系，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及中国人民的辛勤努力，迅速崛起

为出口大国、生产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很显然，中国的发展成就离不开参与世界性的分工体系——只有通过分工合作，中国的比较优势才能得以发挥，产品才能走向国际市场，也能从世界市场获取所需的物质、人力和科技资源，从而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中国的经验恰恰体现了该体系的重要性。而该体系的基本框架、原则以及法律规则都是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美国在其中发挥了奠基者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制度创造。1944年，二战接近尾声，美国罗斯福总统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与以往的秩序截然不同。这个秩序的建立为人类带来了长达近七八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虽然期间有冷战存在，但冷战并非世界性的大战，它只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对峙。双方都试图通过削弱对方的意识形态和物质实力来赢得竞争，而没有引发全球性的战争，区域性的冲突也未对世界和平造成根本性破坏。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政治上与联合国体系相互呼应，在经济领域确立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强调非歧视原则，这是其核心所在。非歧视原则又分为“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简单来说，一个国家可以有自己的关税税率，比如30%或5%，但必须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不能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关税标准。同时，本国的企业、货物和服务与外国的相应主体也应受到同等对待。基于此，各国发挥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

第二个危害是违背和削弱了自由贸易原则。二战之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从未要求对等关税，它的基本精神是“协定关税，一视同仁”，强调协商和非歧视待遇。协定关税意味着各国可以通过协商确定关税水平和贸易壁垒，只要其他国家同意，就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限制。而非歧视待遇则要求一旦协商确定，就必须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给予相同的待遇。这种制度安排充分考虑了各国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经济体制的差异，给予各国一定的弹性空间。

然而，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从根本上挑战和颠覆了传统的自由贸易理念。他以贸易逆差为由，单方面施加高额关税，完全不顾及国际规则及其中的协商机制。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还破坏了国际经贸秩序的法治基础。国际法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国的信仰和遵守，一旦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公然破坏规则，其他国家也会纷纷效仿，国际经济秩序将必然陷入混乱无序。

第三个危害是对全球经济体系构成严重破坏。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全球经济体系的破坏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改变了二战之后保障人类和平与经济自由发展的自由贸易理念。其次，这种大规模、高烈度的破坏行为使得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受到严重冲击。美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公然违反规则，采取单方面行动，这种行为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合法性构成了严重挑战。

从经济角度来看，高关税的实施必然导致国际贸易活动大幅减少，消费品价格上升，通货膨胀成为必然。虽然短期内施加高关税的国家可能会获得一定的财政收益，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高关税会缩小贸易规模，减少税基，最终导致财政收入下降。此外，试图通过高关税恢复制造业的做法也难以奏效。美国制造业的流失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特朗普试图通过简单粗暴的高关税政策来振兴制造业，不仅违背了

自由贸易原则，也忽视了制造业发展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第四个危害是忽视了美国制造业问题的本质与“制造业回流”策略上的失误。美国制造业的流失并非仅仅是全球化导致的，而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选择的结果。美国历任政府并未将制造业流失视为严重问题，因为他们认为通过服务业和金融创新可以获取更高的利润。然而，特朗普及其团队却将制造业的流失视为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威胁，试图通过高关税政策来恢复制造业。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自由贸易原则，也忽视了制造业发展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从策略上讲，特朗普突然而至的高关税政策是一种短视行为。制造业的发展需要长期的规划和投入，不可能一蹴而就。通过高关税试图在短时间内恢复制造业，只会导致贸易关系恶化，经济秩序混乱。相比之下，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针对特定行业给予刺激措施，或许会更有效。当然，单方面施加关税仍会违反国际经济规则。

IPP：美国特朗普政府施加对等关税，会对中国造成何种影响？

王江雨：显然，特朗普的主要矛头已经对准了中国。这不再是一个猜想，而是现实。他发动的关税战原本是针对全球的，对所有国家都征收基准税率 10%，在此基础上，有的国家多一点，有的国家少一点，但基本都在百分之十几、几十的水平。然而，他针对中国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一开始是先征收了两个 10% 的关税。关于芬太尼问题，他在竞选时就说要对中国征收 10%，竞选后又单独对中国加征了 10%，变成了 20%。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特别猛烈的报复措施，只是对特定的美国产品加征了一定关税，并在出口上做了一些管制。所以，对第一轮美国的加税，中国的反应还是相当温和和克制的。

中国当时显然是想留下足够的回旋余地，给特朗普足够的面子，对与他进行对等会谈还是有一定期望的。从国际关系上“人情世故”的常理来讲，我们也希望留下一定的回旋空间。但事实证明，当时这种期望可以说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我们可能把特朗普想得太好了，他或许把这种一时的温和克制理解为中国软弱的表现——这也是观察中美博弈中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这几天我密集阅读了美国的主要媒体报纸，也关注了主要新闻媒体的讨论，发现很多美国人，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抱有一个很偏执且根深蒂固的理念，那就是认为中国经济岌岌可危。他们认为中国就业成问题，经济增长速度也提不上来，整个经济不景气，处于“一碰就碎”的局面。所以他们认为只要稍微施压，中国就会马上低声下气去求饶。他们有这种执念，这个执念多多少少影响着整个团队的决策。

我想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的决策是不理性、不科学、不明智、不合理的。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他们又对中国加征了 34% 的关税。当特朗普开始加征 34% 的关税时，我想从中国方面来讲，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34% 的关税之后，中国进行了报复，特朗普又加征了 50% 的关税，加到了 84%，综合税率达到 104%。中国政府也毫不含糊，在几个小时之内果断进行了报复，也加征了 50% 的关税。前面的 34% 加上 50%，达到了 84%。

这一举动在很大程度上触痛了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他们没想到中国敢进行如此毅然决然的报复，可以说是暴跳如雷。特朗普在推特上歇斯底里地宣称中国已经慌了，不知所措。但中国已经坚定地加了两轮关税，分别跟了 34% 和 50%，怎么会不知所措呢？然后特朗普最新一轮加征关税达到了 125%，中国政府在一天之后也把关税加到了 125%。

我想，中国政府的这种强硬姿态也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某种程度上也超出了我的预料。我的看法当然和中方回应的基本原则和认知是一致的，然而我当时认为加到 84% 以后，加上特朗普第一任时候我们给他加的平均 20% 关税，就是对美关税已经加到 100% 之后，再加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经济和市场意义了。

再解释一下，中国现在加的 84% 和后来的 125%，实际上指的是针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措施所加征的关税。比如我们对美国加征的 84%，最后再加到 125%，这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双方已经互加关税到了平均 20%——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第一轮贸易战的结果是中国对美国的平均关税是 20% 多，美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是 19% 多，差不多是 20%。所以，中国最新一轮的回击就意味着，我给你加到 125%，再加上第一任的 20% 左右，总共也是 145%。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的通知里把道理也说得非常清楚：鉴于这么高的关税，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没有了可接受度，没有所谓的市场竞争能力。基本上不会再有人买了，除非你是有刚需的垄断性供应商，否则在中国市场不会再销售你的产品。如果再往上加，加到 150%、200%、300%，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已经卖不出去了。所以中国政府说，我给你加到 125%，就是说第二轮你加到 125%，我也给你加到 125%，然后我们基本上实现对等关税。但我不会再跟你玩这种毫无意义的游戏了，就是我在关税的赛道上就“不跟你再玩了”。我可以另开赛道，比如可以在服务贸易方面进行报复，可以通过国债进行报复。这就是对目前双方这一轮关税战主要过程的基本梳理。

IPP：请您谈谈，我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施加的关税？

王江雨：从这一轮关税战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美国不能再抱有任何善意的幻想。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独特的，是不能和其他国家比拟的。美国认为中国是唯一的竞争对手，唯一需要“灭之而后快”的对手（当然这里的“灭”是指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使其相对于美国“贫弱化”），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要服务于这个目标。

你看这次，特朗普对中国施加了 125% 的关税，却将其他国家的全球性关税取消，单独针对中国。事实证明，无论中国怎么做，美国都会针对中国。对其他国家，美国可以选择性地针对或不针对。只要针对其他国家会损害其自身利益，美国就会暂时放过其他国家。但中美关系是独特的，中国无论怎么做都换不来特朗普政府的仁慈。因此，我们不能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抱有任何幻想，特朗普政府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的决心是明确的，这一点不能装作看不见。

所以对美国的打压大棒，中国必须采取报复措施，这在策略上不仅是基于博弈论告诉我们

的基本斗争策略和技巧，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不存在别的选择。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应该服软，向美国交“投名状”，但这种观点的假设是不成立的。2008年以后，美国决策层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全国性、不分阶层、不分地域、不分党派地遏制中国成为了共识。

就中国而言肯定不想与美国交恶，也不想与美国对抗，但中国的应对措施不能建立在“只要服软，美国就会放过中国”的假设上。这种假设站不住脚，因为美国已经决心针对中国，无论中国如何示弱，美国都不会放过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就是：“投降吧，而我将毫不宽恕”。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博弈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长期的、重复的博弈。博弈论已经证明，在重复博弈中，最好的应对策略是“以牙还牙”。“以牙还牙”不仅可以展示自身的实力和决心，还能让对方有所忌惮。

“以牙还牙”还是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通过有来有往的、以牙还牙的博弈，中国首先可以争取平等谈判的机会。最终，双方都会认识到彼此的实力，包括合作带来的好处和对抗可能造成的伤害，并在动态博弈中计算成本和利益，最终形成一个新的平衡。通过几轮博弈，双方会开出自己的要价。在此基础上谈判，可以形成一个新的稳定平衡。

在这一轮的博弈中，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手段是完全正确的。至于中美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对整个国际经贸局势和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我的看法是最后还是要谈判的。虽然“沟通比不沟通好，谈判比不谈判好”听起来像是泛泛而谈但永远政治正确的无用话语，但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很多情况下，你连一个平等谈判的机会都是争不来的，比如对方不想谈判，只想占便宜的时候。

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就是抬高要价，然后一顿“乱棒猛打”，最后还是给你一个条件稍微好一点但仍然很高的要价。把你乱棒一顿猛打之后，一般对手就会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他再提出一个比原来的要价稍微低一点的，你就痛哭流涕、感恩戴德地接受了。但这种手段只能对付那些弱者，强大的博弈对手很可能不认这一套。

通过这种有来有往的、以牙还牙的博弈，中国首先要争取到一个平等谈判的机会。如果最后要形成稳定的局面，还是要经过谈判，让大家都认识到彼此的实力。

这个实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你能给我带来的好处，与你合作、共存、谈判达成协议你能给我的好处；二是没有协议的话，互相对打可能给我造成的伤害。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是考虑怎么谈判、给你开出什么条件的因素。经过几轮博弈、“互相伤害”之后，大家都知道了对方的实力，知道了对方的能力，然后会开出自己的要价，最后形成一个新的稳定平衡。这是对双方博弈走向的一个最基本的分析框架。

至于具体会怎么做，我有一些最基本的猜想。比如大家把关税互相降低一点，因为现在的关税水平是匪夷所思的。中国对美国的关税实际上也高达145%了，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实际上还是要高出20%的。所以，谈判的第一个具体目标是大家互相把关税都降一点。比如大家都愿意降到平均20%或30%，甚至更低一些。在这方面，也许中国可以允许美国有高一点的关税，

但不能高得太离谱。

而且，在这方面做出让步，是要换来别的东西的。比如中国可以加大对美国产品的采购，中国也可以同意去除一部分在世界贸易组织法里所谓的“非关税壁垒”，比如美国指责中国的国有企业补贴、政府参与等，这些都可以有所调整。但是，如果换不来美国对中国的很多出口管制方面的缓解，换不来美国对中国很多企业制裁的解除，那也是不行的。因为毕竟美国还是世界上头号科技发达国家，我们还是能从美国买到一些好东西的。

反过来，这对美国也有好处，因为中美贸易赤字，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这么大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想买美国很多好东西却买不到，美国不卖。能买的都买了，你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我应买尽买，但还有很多高科技产品，有一些技术美国是不卖给中国的。所以，这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出口的高科技限制等等，是必须拿掉相当一部分的。否则换不来什么。如果美国只是说你把你的关税拿掉，我也拿掉一部分，然后你也要买我的东西，然后我就不会再给你加太高的关税了，这个也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

另外，大家可以共同制定一些规则，比如知识产权、人工智能、国有企业的补贴、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等等。最理想的状态是中美互相同意零关税，从全球的福祉角度来讲，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美国是不会答应的，因为特朗普的最主要的目标是靠关税来收钱，然后通过高关税来带动制造业的回流。

如果中美在互相全免关税的情况下，美国会感到自己是没有比较优势的。其实，在第一轮贸易战开始之前，中国对美国的平均关税大概就是 7%或 8%左右，美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是 3%或 4%左右。所以，即使是在那个时候，美国也觉得自己是没有什么比较优势的。但如果关税都降为 0 的话，特朗普设定的初始目标就很难实现了。

IPP：中美关系在“关税战”下将如何发展？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是什么？

王江雨：关于中美未来经贸关系的走向，就目前而言，中美间的关税水平显然是不合理的。当前，中美对对方的关税都接近 200%，这是一个极高的水平。后续通过谈判，双方可能会互相降低关税，例如降到 20%或 30%。中国可能会允许美国保留一定的关税优势，但这种优势不能过度。作为交换，中国可能会加大对美国产品的采购，同时要求美国放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中国也可能会同意减少一些被指责为非关税壁垒的措施，例如国有企业补贴和政府参与等问题。但这些让步必须换来美国在其他方面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和出口控制的缓解。中美可以在知识产权、人工智能、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上共同制定规则。

我认为，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所谓的“夫妻关系”或“老大和老二共同治理全球”的“G2 模式”，或者是像以前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说的“中美国”(Chinamerica)。这种关系已经不可能实现。中国不承认谁是世界上的老大，自己也不摆出老大的姿态。

但中美之间也不会像美苏冷战时期那样完全脱钩。冷战时期的美苏是两个平行市场的关系，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贸易关系，也没有太多的人员往来，可能只是特定的人物之间的交流，比如

官方的互相派出使节，而非民间往来。

中美两国尽管未来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脱钩，但中美之间在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方面仍会保持联系。这种联系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无法轻易割断，所以不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冷战式关系。

中美未来的关系大概率是一种“不近不远”的关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联系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甚至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是基于双方必不可少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形成的，也是不可能彻底切断的。双方领导人也不想让两个国家彻底分开，也没有能力彻底隔绝中美之间民间的这种普遍和强大的联系。

IPP：中美关系的变化，对未来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走向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江雨：中美会形成两个中心，但这两个中心不是界限分明的阵营。我想它会形成这样一种格局，即中美成为两个中心，然后基于利益、基于大家的互相认可程度、政治关系、经济利益，甚至基于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分别与第三国发展关系。

大多数第三国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各自加入泾渭分明的阵营，而是会选择同时与中美发生关系，并且在具体问题、具体事项上根据自己的利益具体判断。所以，这两个中心的势力范围会重叠——大多数国家可能不会基于阵营、通过“站队”成为某一个阵营的固定成员，而是会根据事项来站队。比如，这个事情上我认同美国，那个事情上我认同中国，然后再分别与中美进行交往。

当然，这也不排除双方各自有一些“铁杆”——“铁杆”就是跟“对方老大”无论如何都不对付的国家。但我想，大多数国家是不会完全选边站的，而是会基于事项来跟中国或者美国分别建立联系——比如新加坡就是这样，跟中美同时保持一定的友好关系，在关税的问题上它可能反对甲，在另外一个事情上它可能反对乙，可能又跟甲站在一起。所以，我想这可能是未来一个非常有可能的，也是国际关系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个新的格局。

IPP：美国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王江雨：我在美国读过书，也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主要是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那时的美国是一个相对强大、自信和开明的国家，展现出了较大的包容性。然而，如今的美国已经与当初截然不同，变得异常敏感、易怒，既自大又自卑。

比如，过去我在美国法学院学习美国宪法和诉讼法时，教科书上明确指出，美国警察不可随便拦截民众要求出示身份证，而在某些地方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出门时随身携带身份证是必须的；美国的法律也强调，警察在进行拦截搜查时需要合理的理由（probable cause），但如今这种保护似乎已经消失，警察甚至可以随意入户入店搜查；有些人的签证亦可以随便被撤销，甚至有人因为政治立场而被驱逐出境。这些在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美国显然已经不再是很多人理想中“自由与民主”的国家。美国宪法中保护人权和自由的基本理念如今正在受到侵蚀。

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许多美国政治体制内的丑陋现象快速显露出来，比如腐败、寡头操控和“金钱政治”的不透明，乃至利益冲突的普遍存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前就抢先发售虚拟货币，为自己“空手套白狼”谋取数百亿美元利益的行为，就清晰显示出美国政治道德的彻底崩塌——亿万富翁竟然可以肆意操控美国的政治。而特朗普作为国家首脑，他的诸多行为不仅没有道德约束，反而赢得了超过一半美国民众的支持，合法地当选为国家最高领导人。

在美国现在的这个体制里，特朗普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追究，反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宽容和赞赏，这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在克林顿时期，因为他与莱温斯基的事件引人非议，导致他面临国会弹劾，显示出那时美国社会对总统的道德要求远比今天严苛。相比之下，特朗普的罪行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更为严重，但他却赢得了许多人的拥护。显然，美国的民主制度存在着严重问题。

特朗普的独断任性、无道德底线的风格，他得到的民粹主义支持，他所建立的人事官僚体系，以及以最高法院为代表的美国司法系统对他的纵容和畏惧，都表明美国正在逐渐朝向寡头政治，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法西斯主义”。

这里的“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指“希特勒式”的大屠杀，而是指通过种种没有底线的方式来控制社会——你看特朗普内阁的会议，不停息的鼓掌、内阁部长们排队长篇发言赞美领袖特朗普，简直可以说是丧尽廉耻。这显示出美国政治伦理的严重扭曲。美国并非天生就具备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基因，现在看起来更是极易走向反面。特朗普所推动的政治腐化非常明显。

同时，美国的制造业复苏困难，种族问题和政党间的恶性斗争也在加剧。如今，两党之间已经不再是英美传统政治伦理所要求的那种“在台上为国执政、下台就成为‘忠诚的反对党’”。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无论是政策主张还是人事博弈，都是党派利益至上的“恶斗”，现状堪忧。反过来讲，在美国两党内部，政党的运作机制和利益分配完全被个别大佬所操控。长期以来，民主党的年轻精英未能崭露头角，部分原因是因为民主党被克林顿、希拉里、佩洛西和奥巴马这些政治家族等长期掌控，新人必须服从和追捧他们、被他们赏识才有出头机会。像桑德斯这样持有公心与扶助弱小理念的政治人物，也因为与这些大佬不合而被拒之门外，不得不从资深民主党政客到退党成为独立参议员。

另外一个例子是现在因为支持特朗普而被任命为国家情报总监的贾巴德——她本来是民主党的明日之星，无论是个人经历、能力和形象都特别优秀，但就是因为和大佬们意见不一致而被打压和边缘化，最后退党加入特朗普阵营。共和党也是一样，党内老成持重的建制派政客不管觉得多么不合理，也不敢挑战甚至批评特朗普，因为他们担心会因此被边缘化。

这是不是暂时现象呢？是不是真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特朗普“最多干四年”，任期结束后一切荒谬都会过去，那个“伟光正”的民主自由大国又会回来？不是的。特朗普不是孤立的个体，他是美国体制内部的政治社会机理长期演化而生长出来的巨大毒瘤，说明的是美国政治体制本身出现了问题，不是割掉它就可以一了百了的。

此外，我们重视制度，但也不能忽视制度运作中“人”的巨大因素。任何政治体制都离不开个体的道德操守，即使制度再完善，依然需要个体来执行。如今，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政治行为都被个人利益所侵蚀。我们曾经相信“制度自带道德约束”，但这种信念正在被逐渐削弱。美国的民主正以相当快的速度走向衰退、堕落与腐化。

IPP：对于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能否给中国当下的国内发展提几点建议？

王江雨：我个人认为，从2018年贸易战以来，中国的应对措施总体上是相当出色的，既遵循了国际规则，又不乏灵活应变的策略。这种“以正合，以奇胜”的方式，既稳重又富有创造性，为应对未来的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面对特朗普这样一位极具不确定性的政治人物，传统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理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预测能力。这是因为，这些理论主要研究制度的运行，而制度的运行具有惯性和可预测性。但特朗普的决策风格却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情绪化特征，这就使得预测变得极为困难。

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认为保持定力至关重要。中国需要站稳脚跟，充分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在头脑冷静的情况下做出判断。正如古语所言：“主不可一怒而兴师”。在国际博弈中，情绪化的决策往往会导致不利的后果。因此，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这不仅是应对国际挑战的需要，也是实现国内发展的基础。

第二个建议是，中国应继续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尽管多边主义目前面临严峻挑战，但中国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的。中国通过自身的勤劳和智慧，在多边主义体系中建立了强大的制造业比较优势并从中受益。此外，多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道义上的共识，尽管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多边主义，但在国际场合中，美国的代表也从未公开否定多边主义的价值。因此，中国应抓住这一契机，通过维护多边主义来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有效的“统战”工作。

第三个建议是，中国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时，不能幻想通过软弱或退让换来对方的让步。英美国家的行为逻辑本质上是“基于实力的政治”，他们的文化中存在着强烈的斗争性，本质上具有“狼性”特征。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会表现出彬彬有礼的外表，但这只是他们“天鹅绒包裹铁拳”的策略。因此，中国必须认识到，软弱退让是无效的，同时也要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

第四个建议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国内的“善治”和“良治”。前几天我听到一个说法：中国拥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在大多数时间里，即使没有美国的存在，中国也能够独立发展。未来，中国同样可以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生存和发展。中华民族能做到这样，基础在于自身实力和稳定性，关键在于国内要有良好的治理，包括一个清廉且能干的政府，一个具有高度自信、奋斗和创新精神的社会，以及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政府应鼓励社会成员平等地表达思想，充分激发社会的创新潜力。正如郑永年老师所言，“保卫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因

为社会的活力，人民的勤劳、勇敢、聪明和正直，以及高度的创新性，是中国应对一切挑战的底气所在。

最后，我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应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这一国策并非仅仅是为了追求财富，而是为整个国家提供一个符合人性的稳定内核。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可以确保社会的生机与活力，同时社会走向不被政治热情或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带偏，后者经常导致过度的暴力和极端主义。中国宪法把“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确定为国家当下阶段的主要任务，不仅是一种经济策略，更是一种社会伦理性的选择。

只要中国能够实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保持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那么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将能够稳健前行，不会偏离正确的轨道。

【关税战 2.0 来袭，中国如何应对？】

“交易的艺术”：特朗普对华关税战的限度

郭海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副研究员

导语：

当地时间 5 月 12 日，《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双方大幅降低双边关税水平，美方取消了 91% 的加征关税，中方相应取消了 91% 的反制关税；此外，美方暂停实施 24% 的“对等关税”，中方也相应暂停了 24% 的反制关税。

事实证明，特朗普式关税政策的“极限施压”和“交易艺术”并未让中国屈服，也未能实现特朗普声称的“制造业回流”的预期，反而揭示了美国产业的依赖性和金融的脆弱性。美国消费者、生产商和企业无端承受冲击。在接下来的中美协商谈判中，美国还有哪些筹码？中美结构性矛盾并未消解，在贸易“持久战”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可能出现哪些调整？

IPP 研究员郭海指出，特朗普放弃对华“极限施压”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低估了中国的经济韧性；二是此前的高关税政策动摇了美元地位；三是高关税本身或许就是特朗普贸易谈判策略的一部分。他指出，特朗普或许意识到，其所设想的通过贸易战使“制造业回流”的目标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其未来的对华政策很可能将回到其第一任期的轨道上，即在妥善处理欧洲事务之后，继续围绕“印太战略”主轴，通过地缘政治手段对中国施压。

2025年5月12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发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双方将暂停对彼此加征的关税。美国对中国的关税税率将从原来的145%降至30%，中国对美国的关税则将从125%降至10%。

此次会谈，中方代表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美方代表则为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何立峰表示，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对两国意义重大，也对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贝森特则称此次会谈“富有成效”。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地时间11日晚在出席中方代表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取得实质性进展。

特朗普暂时解决了一个多月前由他本人制造的危机。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实施备受关注的“解放日关税”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高达145%的关税。作为对等回应，中国对美国产品也加征了125%的关税。虽然这一关税举措堪称史无前例，但从多项迹象来看，特朗普为谈判预留了回旋空间。

首先，他选用了立场相对稳健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作为谈判代表，而将长期鼓吹高关税政策的彼得·纳瓦罗排除在外。贝森特在会谈中也明确表示，中美之间的高关税政策不可持续。其次，在加征关税之后，特朗普多次表示“正在等待中国领导人的电话”，并暗示“中国方面已与美方取得联系”。尽管他在言辞上仍保持强硬姿态，但实际行动已显示出妥协的意愿。

中方在实施对等反制的同时，始终保持谈判的大门敞开。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并非本轮关税战的始作俑者。高关税政策显然违背了中美双方的根本经济利益，也对全球产业链构成冲击。正是这一系列现实因素，促使双方最终重回谈判桌。

总体来看，特朗普放弃继续对中国施加“极限施压”，可能出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他低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中国对美国产品的依赖程度，远低于美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如稀土等关键原材料）。虽然中国进口大量美国农产品，但这些可以通过转向巴西等其他国家进行替代。美国商品的减少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节奏，但并不会对民生经济造成致命冲击。相比之下，高关税政策在中短期内对美国的冲击更为显著，尤其是在民生和通胀层面。美国大多数生活消费品产自中国，持续的高关税不仅抬高物价，还可能引发物资短缺。在加州等地，已有大量商铺出现缺货现象。物资短缺往往是社会动荡的前兆。高企的生活成本已引发美国中部省份农民的不满，开始侵蚀特朗普政治支持的基本盘。截至5月12日，包括加州在内的12个州已就关税问题向联邦政府提起诉讼。

第二，高关税政策动摇了全球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稳定的美元是美国最核心的“出口产品”。然而，自特朗普推出“解放日关税”计划以来，国际资本市场开始抛售美债，美元持续走弱。日本财长加藤胜信虽声称“不会抛售美债作为报复”，但这一表态并未真正安抚市场，反而提醒了美国人：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确实掌握着抛售美债这一“金融核武器”。

2025年4月21日，美元指数跌破100，标志着国际投资者开始做空美元，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正遭遇挑战。一旦这一趋势持续，美国借债成本将上升，偿债能力将下降。当前

美国联邦债务规模为 36 万亿美元。如果国会不能在 2025 年 8 月前上调债务上限，联邦政府将再次面临财政停摆的风险。弱美元环境使得美国通过“借新还旧”维持经济运行、政府运作乃至全球军事投射的做法日益困难。

第三，高关税本身或许就是特朗普贸易谈判策略的一部分。将关税调得足够高，才能为美国谈判制造足够的空间，推动中美贸易关系的结构性重塑。否则，关税带来的收益很容易被汇率贬值等其他变量所抵消。145%的关税已接近禁运，继续上调的边际效应几乎为零。“高高举起”之后必然是“轻轻放下”。

从谈判结果看，特朗普已实现对对中国商品征收 30%关税的既定目标。这一“成果”足以被 MAGA 等特朗普的“基本盘”包装为一次“重大胜利”。《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当日，特朗普在其创办的社交平台“真实媒体”（Truth Media）上宣称，中美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并称这是一次“中美贸易关系的彻底重置”。

中美贸易关系真的会如特朗普所说的那样“彻底重置”吗？如果“重置”指的是中美关系回到他第一任期时的战略竞争格局，那么他的说法或许并不夸张。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将中国明确定位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提出“印太战略”，并发起对华贸易战，掀起了两国间长期的经贸博弈。拜登执政后，几乎全面继承了这一战略思路，并对其进行了技术化和制度化的升级。

如今，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伊始，试图对中国发动更强硬的攻势，特别是在贸易领域。然而事实表明，中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韧性，已经有效抵御了这一轮压力。特朗普力图推动的“制造业回流”战略也在现实面前逐步破产。

如果特朗普以“制造业回流”为目标而对中国发动贸易战，那他实际上是在打一场注定难以取胜的战争。这不仅因为中国经济韧性十足，更在于特朗普的经济战略本身存在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美国既要推动制造业回流，又要维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方面，特朗普主张推行弱美元政策，以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强调要“维护美元霸权”。然而，一个国家难以同时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和制造业强国。发达的金融体系天然会推高资产价格和生活成本，从而抬高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将制造业挤出本土市场。特朗普很可能已经意识到，他所设想的“制造业回流”难以在其任内实现。尤其在美国本就缺乏足够工业产能的背景下，若中国商品停止出口美国，将对美国经济造成一场不亚于上世纪石油危机的供给冲击。鉴于中美之间高度的经济依赖，近似禁运式的高关税政策本身就不可持续。

此次中美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可能会从以下几个层面产生后续影响：

从中美层面来看，双方的博弈恐怕将长期持续。一方面，目前美方仍保留的 30%关税中，有 20%是以所谓芬太尼问题为借口加征的。有消息称，中方已经派出了高级别安全官员就这一问题与美方进行磋商。换言之，这 20%的关税未来可以成为特朗普进一步与中国进行交易的筹码。另一方面，中国方面也在 5 月 12 日组织了一场名为“加强战略矿产出口全链条管控工作

部署会”的多部门会议。这显示出，双方仍然都“留有后手”。至于美国未来是否仍会对中国进一步降关税，一方面要看双方谈判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则要看观点始终不断变化的特朗普，未来如何具体看待对华关系和对华政策。

从国际层面来看，这一次中美迅速达成协议，也等于向外界释放了美国“不希望高关税持续下去”的信号。因此，未来日本、欧盟等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与美国的谈判中，也会获得更好的谈判地位。在中美谈判迅速“打样”之后，预计他们也会很快会在短时间内达成妥协。

从美国国内层面来看，特朗普的“改革进程”眼下确实面临着“中道崩殂”的尴尬——曾经声势浩大的政府效率部（DOGE）的改革，如今马斯克已经辞职退出，而美国政府 300 余万的联邦雇员中仅裁撤了 2 万多人，力度远远不及预期，甚至在很多被裁撤的岗位由临时工顶替之后，反而导致成本更高。这表明该项改革基本宣告失败。与此同时，特朗普希望推动的“弱美元”和制造业回流政策，同样遭受了重大挫折。尽管特朗普不会参加下一届总统选举，但为了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胜利，他很可能仍会制造很多的“政治景观”，在诸如台湾问题、芬太尼等议题上做大大小小的文章，以保住他自己基本的政治支持。

特朗普未来的对华政策，很可能将回到他第一任期的轨道上：在妥善处理欧洲事务之后，继续围绕“印太战略”主轴，通过地缘政治手段对中国施压。

只不过，这一次，特朗普已经透支了太多信任。

【关税战 2.0 来袭，中国如何应对？】

媒体专访

徐伟钧：我们有能力来对抗美国的单边霸凌

受访人：徐伟钧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采访人：李鹤鸣

南方都市报记者

导语：

自 4 月 2 日宣布实施所谓“对等关税”，挑起全球贸易争端以来，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加码“关税战”，不断施压全球各国和地区接受美国的贸易安排。面对美国单边主义霸凌，中方“11 箭齐发”，出台一系列反制措施，有力回击特朗普政府。4 月 10 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华关税提高至 125%，并以“暂停 90 天‘对等关税’”为诱饵，似要拉拢全球 75 个国家，形成对中国的精准围堵。

面对特朗普“对等关税”冲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其逻辑和本质？面对单边主义霸凌，中国应如何积蓄力量破局？中国企业又应如何调整自身“出海”战略？

4 月 8 日，IPP 助理研究员徐伟钧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李鹤鸣的采访，围绕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的实质、影响以及中国的反制措施展开分析。

南方都市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签署两项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其中宣布美国将对贸易伙伴设置 10% 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的关税。所谓“对等关税”的“对等”体现在哪里？是否真的“对等”？他提到的 10% 的基准关税，是基于什么标准得出的？

徐伟钧：特朗普的“对等关税”会给人一种“针锋相对”的印象，他对所有进入美国的产品都加征 10% 的基准关税，而对于包括欧盟和中国在内的 60 个被他描述为所谓“严重违规国”的贸易伙伴，征收更高的对等关税。

根据美国政府的表述，这种“对等”的标准是根据贸易伙伴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综合税率来进行计算的，但实际上似乎是将与特定国家的双边贸易逆差，也就是进口超过出口的金额，减去该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然后将得出的百分比除以二来进行计算。

从白宫方面发布的信息来看，“对等”包含双重含义。第一，特朗普认为其他国家对美国征收关税，所以美国也要对其他国家征收关税。第二，特朗普不满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认为应该通过征收关税的方式来消除贸易逆差，从而使双边贸易的进口和出口对等。显然，特朗普政府所宣称的“对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等。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要求绝对意义上的关税税率相同，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其产业发展而适当提高进口关税是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做法。美国在自己已经越过需要保护的发展阶段之后，强行实施对等关税，相当于剥夺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

另一方面，大多数贸易逆差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而不是蓄意的不公平关税做法。特朗普政府以贸易逆差为借口征收额外关税，是一种武断且带有政治色彩的计算，而不是真正的对等关税交换。

对于 10% 的最低基准关税，特朗普方面并没有明确其经济学依据，但可能三个作用：第一是设置一个普遍的下限。这可以确保对每种进口商品征收一定的关税，从而打击通过将生产转移到第三国来规避关税的行为。第二是为美国提供一种谈判杠杆。10% 的普遍税率明显高于特朗普上台前的平均水平，但又不算太高，可以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第三是一种政治象征意义。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这种普遍的关税，可以强调特朗普政府为了恢复所谓“公平”所作出的主张。

南方都市报：近期美国媒体曝出，美国财长贝森特因无法忍受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而想要辞职，显示在特朗普团队内部似乎也有意见相左的情况。另外，4 月 7 日美股大跌之后，4 月 8 日早上一度有传言说特朗普要撤销关税，导致美股短暂上升，结果在特朗普的辟谣之后又马上下跌。结合这些情况来看，特朗普这一次的关税政策是否会存在情绪化的特征？

徐伟钧：我认为此次的关税政策确实具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公布关税政策当天的演说中看出。在演说中，特朗普运用了很多情绪化的语言，比如说，他宣称“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遭遇了远近敌友国家的掠夺、抢劫和强奸”；他还多次在社交媒体上以攻击

性的语言威胁贸易伙伴，比如说他要求中国在 24 小时之内撤回反制措施，否则他还要额外加征 50% 的关税。

此外，他还拒绝了欧盟豁免关税的提议。显然，他的语言已经超越了常规的贸易政策讨论范畴，是为了迎合和煽动国内民众的情绪——当然也有他自身的情绪在里面。

另外刚才也提到，特朗普的团队内部其实一直存在着贸易政策的分歧。在贸易政策上，特朗普的经济团队内部有一些所谓的“里根经济学”拥护者，包括贝森特在内，他们并不认同加征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另外，由于关税政策对企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企业家们其实也并不认同特朗普加征关税的政策。

但总体而言，现在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产生了更大影响的，其实是以他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为代表的一帮主张加征关税的高官。因此，虽然特朗普政府内部存在分歧，但这种分歧对最终政策的实施能产生多大影响，是需要继续观察的。

南方都市报：我们也关注到，在加征关税的同时，特朗普也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事实上，在第一任期的时候，特朗普也有过多次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徐伟钧：特朗普这次援引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其核心目的是绕过国会的限制，快速实施关税政策。这个法律机制允许美国总统在他认为所谓的“不寻常和非常规”的情况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或经济稳定的时候，单方面迅速实施关税或经济制裁等措施。

需要强调的是，此次特朗普加征关税是通过签署行政令的形式来进行的，并没有经过国会的立法批准。也就是说，通过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特朗普就能够绕开传统的立法程序，并且赋予其行政命令在法律上的合法性。这既可以避免加征关税的法案在国会内部遭到阻碍甚至否决，也可以让其关税政策被更加快速地实施。同时，通过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也是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贸易伙伴发出一个信号，表明美国在采取一种不妥协的立场，其目的也是为了迫使外国改变经济政策。

南方都市报：就现在的形势或者局势而言，您认为“对等关税”政策在国会两党的不满和谴责下，是否会按下暂停键？或者说，是否有一些磋商或谈判的余地？

徐伟钧：美国国会两党确实有很多议员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不满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也有一些议员表达了支持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出台加征“对等关税”的政策之后不久，白宫网站上的一个网页列举了美国各行各业、包括国会内部多位议员对他的支持。这说明，美国国会内部也有一定的支持关税的声音。

当然，如果关税的负面经济影响持续恶化或者公众的不满加剧，国会确实有可能考虑采取措施暂停或者取消关税政策。但是因为特朗普这次加征关税是根据总统的“紧急权力”来征收

的，因此要取消关税的话，就需要新的行政令或者国会能成功地推翻政策。

鉴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现状，除非有令人信服的经济证据或者不断增加的公众压力促使国会采取果断行动，否则即便两党内部都存在反对的声音，也可能不足以迫使特朗普暂停加征关税。

南方都市报：在您看来，特朗普实施“对等关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解决所谓的国内顽疾，比如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还是增加谈判筹码？

徐伟钧：从他公开的表述来看，特朗普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短期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缓解联邦债务压力；而从长期来看，是为了促进制造业的回流，从而推动美国的“再工业化”。他宣称这些“对等关税”将使美国的工业“重生”，并且将公布这些关税的日子称为“解放日”。这种关税政策既是特朗普对于国内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也是他对外谈判的一种筹码。

从国内的角度来说，他宣称关税是对几十年来美国制造业衰退以及贸易赤字的一种补救，能够起到重新平衡贸易、保护美国制造业和恢复就业的作用；从对外的角度来看，关税也是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谈判的筹码。他试图借此来迫使其他贸易伙伴降低所谓的壁垒，并且调整其他被特朗普视为“不公平”的政策。

在特朗普关税的压力之下，确实有可能出现美元走强的趋势。这是因为，其他国家可能会通过贬值本国货币来保持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从而对冲关税带来的风险。

但是，特朗普可能更希望的是美元贬值。从他长期以来的表态来看，他认为应当扭转强势美元的政策，因为美元的贬值会促使美国出口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加便宜，进而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甚至有报道称，特朗普希望以类似《广场协议》的方式来迫使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从而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他此前也公开表达过对人民币和日元贬值趋势的不满，声称这种趋势对美国不公平。所以我认为，他个人更希望看到的可能是美元贬值的局面。

南方都市报：这几天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关报道，有美国民众正在疯狂采购物资，以预防可能产生的物价上涨。那么，这一次“对等关税”对于我们刚才讲到的美国制造业、农业或其他产业有没有影响？对于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徐伟钧：对于美国的制造业而言，关税确实会使进口商品更加昂贵，进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在美国国内生产，从而为美国的制造商提供一种临时的保护。如果从外国进口变得更加昂贵的话，一些企业可能确实会选择将业务转移到美国。

是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之下，很多制造业其实已经融入了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即便是美国企业在本土生产，也会有从其他国家进口原材料或者零部件的需求。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也必然会导致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如果企业自行承担这种成本增长，就会降低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如果企业选择将这种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话，那也会导致消费者生活成本的增加。

对于美国的农业而言，特朗普的关税将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制，从而对农业造成影响。中

国和欧盟这些主要的贸易伙伴都已经表示或者实施了针对部分美国农产品的报复措施，这显然会导致美国农产品出口量的下降和农业的受挫。同时，农业供应链也可能会受到关税政策的影响，从而导致美国国内食品价格上涨。

所以，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各行各业成本的增加会导致美国物价的普遍上涨，进而削弱他们的购买力，并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同时，投入成本的增加、供应链的中断以及商业环境不确定性相互叠加的累积效应，还可能会导致市场动荡，有部分企业可能因此裁员，从而对普通民众的工作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南方都市报：对于美国普通民众来讲，可能“对等关税”政策之下会影响到就业、消费。那么，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会不会对一些人群或团体产生利好？

徐伟钧：利好的对象其实不会特别多。本质上来讲，关税是一种贸易保护的举措，它会增强某些美国本土生产企业的竞争力。就像刚刚说到的，美国国内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可能会因为“对等关税”导致从中国或欧盟出口到美国的制造业产品成本上升，从而使美国本土制造的产品具有更强的价格优势。

但是，即使它增强了美国部分企业的竞争力，也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能够从“对等关税”当中获利，因为大部分制造业企业依赖于全球的供应链。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美国的这些制造业企业仍然需要从国外进口一些原材料或者零部件来满足其生产需求。而“对等关税”也会影响到这些原材料的成本，从而增加美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也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我认为，至少从短期的层面来说，因美国的“对等关税”而完全利好的群体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南方都市报：特朗普宣布实施关税政策后，可以看到美国股市出现大跌，比特币、黄金和白银等资产价格也出现暴跌。此外，美国各界的反对声音也是比较明显的。在您看来，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实施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难度？美国会不会在未来某个阶段出现经济危机？

徐伟钧：如果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可能会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关税的经济连锁反应是特朗普政府难以控制的。他在宣布了关税政策之后，市场和投资者对不确定性的加剧和报复性措施的担忧，都导致了美国 and 全球主要股市的大幅下跌。这种恐慌不仅源于关税的直接冲击，也是因为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第二，美国社会会出现反弹。随着企业开始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普通美国人对于日常用品价格上涨的不满情绪也会日益高涨。一些美国民众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近几日有一些美国民众已经开始了“囤货”行为，美国国内也爆发了覆盖全美的抗议活动。如果任由民众的不满情绪不断累积，特朗普以及共和党可能会在202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遭到重挫，失去对国会两院的控制。

第三，美国毕竟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对于总统存在一些法律和制度上的约束。比

如说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加征关税，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存在争议的。已经有报道称，有一些人或者企业已经向美国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来对特朗普的加征关税和他宣布紧急状态的合法性进行挑战。同时，特朗普团队内部以及国会中的一些共和党议员，确实也对这项关税政策存在担忧，甚至不满情绪，这可能会在一定情况下转化为对关税政策的反对力量。

南方都市报：近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喊话美国民众“挺住”，除此之外，特朗普还在“黑色星期一”股市大跌的时候在社交媒体上点赞了他的粉丝所写的一篇文章，暗示股市大跌是他们所期望看到和意料之中的。那么，会否有可能像他所说的，目前物价上涨、股市大跌的状况只是短期的？是否只要“挺住”，美国民众就能迎来好日子？

徐伟钧：我觉得特朗普说“挺住”，主要的意图是向美国公众宣称，这种以物价上涨和市场波动为代价的短期性的经济痛苦，最终会让位于美国国内制造业和就业的复苏。他喊话“挺住”，是为了唤起美国国民的坚韧意识。

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他所说的“挺住”或是他对股市下跌“早有预期”这些话，更多的是他在“嘴硬”。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可能符合他的预期，那就是所有的贸易伙伴都屈服于他的单边霸凌，而且制造业也重新都回流美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民众确实有一定可能性在未来迎来所谓的“好日子”。

但是，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必然会有一些贸易伙伴会采取反制措施。而且，就算各国都不反制的话，特朗普所希望的供应链重构也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

另外，从经济逻辑来看，物价上涨恐怕不是短期的现象。从过去贸易战的情况来看，只要特朗普不“改弦易辙”，他的保护主义措施将会持续很长时间，并导致消费者长期承受更高的成本。至少在他未来的4年任期之内，这种物价上涨的所谓“阵痛”很可能会一直存在，成为一种“长痛”。

当然，如果特朗普“改弦易辙”的话，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昨天（4月7日）有消息称，特朗普可能会考虑将关税征收延缓90天。消息传出后，美国股市出现了短暂的上涨趋势。但是白宫方面又很快出来辟谣，结果辟谣之后，美国股指就急剧下跌。这说明，市场对于特朗普取消他所谓的“对等关税”政策，其实还是抱有非常高的期待的。但是，只要特朗普仍然坚持保护主义式的对等关税政策，我认为它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将会是长期性的。

南方都市报：2018年，中国曾针对美国的贸易战采取关税清单以及WTO诉讼的“组合拳”来进行反制。这一次，中国是全球第一个对美国关税进行反制的，反制措施也是“十一箭齐发”，力度很强。在您看来，这次反制和以往的反制措施相比，有什么不同？又有哪些特点？

徐伟钧：对于特朗普第一任期采取的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举措，中国方面的反制措施通常是基于对等原则，对美国的商品采取同等力度和同等规模的反制措施。

比如说，2018年4月，针对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

税，中国政府也对从中国自美国进口的金额约 50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 25% 的关税作为反制。但是，此次特朗普是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都加征高额关税。由于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情况的存在，中国很难对美国对华出口产品征收同等数额的关税。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就需要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来进行有效的反制，这也就是我们这次看到的“十一箭齐发”。

相比于 2018 年的情况，此次中国的反制措施范围更广，内容更加多样化，不仅包括了报复性关税，也包括一些监管措施、出口管制以及有针对性的调查等等。我认为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精准打击”与“多元化工具”相结合。除了报复性关税之外，我们的反制措施还涵盖了一些非关税手段，直接对美国的半导体、农业等关键行业进行了“精确打击”。

第二个是国内与国际手段相结合。除了采取行政措施之外，中国也通过世贸组织的诉讼机制对美国进行了反击。

第三个是积极性与明确性。我们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发布了 11 项反制措施，更具协调性、战略性和时效性，展现了中国在中美贸易争端上的坚定立场。

南方都市报：这次反制和之前的措施有非常大的不同，同时我们是全球第一个推出这样的一系列反制举措的国家，这又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徐伟钧：我觉得中国之所以在全球第一个作出反制，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于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做法是早有预期的。

其实，早在 2024 年美国大选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到特朗普及其团队成员多次表达过加征关税的想法。特朗普本人也宣称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50%、60% 或高于 60% 的关税。我相信，我们已经早就已经做好了特朗普大幅增加关税的预案，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他正式宣布之后的第一时间就出台精准有效的反制措施。

另一方面，这其实也表明，中国有条件也有决心对特朗普的“单边霸凌”进行反制。

“关税战”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实力较量。有些国家确实没有实力进行反制，那么它就会屈服于美国的单边霸凌，选择向特朗普妥协甚至单方面的让步。但中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韧性，我们有条件与美国进行较量，并通过反制措施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我们第一个对美国的“对等关税”进行反制，其实是向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坚决不屈服于特朗普的单边霸凌，将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

南方都市报：我们看到，中方的官方立场是“不惹事也不怕事”。您怎么看待声明当中我们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和立场？我们也看到，包括欧盟和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还在寻求跟美国的谈判。您认为，中美现在还有谈判的余地吗？

徐伟钧：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的立场，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无意挑起冲突，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受到挑衅，中国也做好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充分准备。

我们强调“不惹事”，其实也是在展示我们的立场并非是倾向于对抗，只是在受到单边霸凌的情况下会做出强硬的回应。而“不怕事”，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有能力来对抗美国的单边霸凌。

我们的经济是有韧性的。我们有自己的产业链，也有应对特朗普第一任期“贸易战”的经验，所以我们是做了一定的准备的。

虽然我们做了这样的表态，但我还是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谈判空间。其实，中方也一直对谈判持开放的态度。但是，谈判能不能进行下去以及能不能达成结果，本质上取决于美国方面是否愿意调整现在的策略。

当前中美之间的谈判面临着—个结构性的障碍，那就是特朗普要求中国进行单方面的让步，而中国坚持的是平等、相向而行的立场。简而言之，只要我们的主权和经济利益得到尊重，我们是愿意进行谈判的。但是，如果特朗普继续坚持这种单边霸凌的做法，比如他在最新的回应当中所宣称的，如果中方不撤回 11 条反制措施，他将会进一步向中国加征 50% 的额外关税，并且终止现在已经在进行的中美之间的任何谈判。如果他一直坚持这样的单边主义立场的话，中美之间的谈判确实难以进行下去。

南方都市报：欧盟会不会在这次对等关税政策下，在某些程度上加深与中国的经贸来往？

徐伟钧：只看经济体量的话，欧盟其实是有实力来对美国进行反制的。眼下，欧盟已经宣布了第一轮的反制措施。

当然，欧盟内部确实存在一定的分歧，因为各国的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各国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分歧，美国持续的单边主义关税政策所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仍然可能会推动欧盟采取更加协调的应对措施。

虽然鉴于不同的经济依赖性和政治优先事项，欧盟完全统一的应对措施可能比较难以实现。但是，来自主要行业领导者的压力不断增加，以及市场不确定性的风险不断增强，最终还是会使欧盟的决策者以某种形式达成—致的综合应对措施。比如说它出台的反制措施。

另外，中国和欧盟在经贸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也肯定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的深化。比如说，双方在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寻求美国市场替代等领域肯定存在合作空间的。这也是未来我们进一步深化中欧合作的主要方向。

南方都市报：此前中国的许多企业会到越南或者其他东南亚国家开发第二个生产基地。这一次我们会发现，美国的“对等关税”对于东南亚国家的税率非常之高，最高甚至达到 40%。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美国的关税打击有多大？哪个国家的损失最大？

徐伟钧：长期以来，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一直是亚洲国家走向经济繁荣的重要途径。尤其对于越南、柬埔寨这些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东南亚国家来说，他们严重依赖对美出口的产业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关税战”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中国产业向这些国家转移的趋势。特朗普及其团队也是发现了这一点的，所以他们这一次特别在“对等关税”政策中修补了所谓的“漏洞”，向这些国家加征了高额关税。在这种关税的影响之下，这些国家严重依赖对美出口的产业肯定会遭遇重大打击，这些国家的经济也将面临严重的下行风险。

根据我现在的梳理情况来看，受打击最大的国家应该是柬埔寨。因为柬埔寨面临的是49%的“对等关税”，是亚洲经济体中被征收最多关税的国家。美国现在是柬埔寨服装和鞋类最大的出口市场，这种超高额度的关税将会严重打击柬埔寨相关产业，并且降低它对外资的吸引力。

而且还有一点是，柬埔寨不像越南。越南在安全领域和美国有一定的合作。柬埔寨基本上不具有与美国谈判的筹码。特朗普的这种关税政策将会对其经济造成严重打击，这种打击比起对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打击可能会更大。

尽管柬埔寨目前也已经表达了谈判的意愿，但是他们的官员其实也持比较悲观的态度。因为现在各国都想跟美国进行谈判，而柬埔寨因为自身缺乏谈判筹码，在与美国谈判的队列当中可能位置是比较靠后的，也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让特朗普政府改弦易辙，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单方面的妥协。所以，柬埔寨政府的一些举措可能效果不会非常明显。

南方都市报：如果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谈判以“疏远中国”来作为条件的话，会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徐伟钧：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政府，他们其实一直都在试图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网络。拜登政府时期，是搞了一个所谓的“小院高墙”；到了特朗普政府，学界其实有一种说法是：他把“小院高墙”扩展到了“大院高墙”——其核心目的是想把中国挤出全球供应链，然后建立起一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全球经济体系。他通过关税来迫使其他国家远离中国，或者远离中国的一些产品、一些产业，这确实是他们的意图之一。

南方都市报：除了“十一只箭”的反制措施外，从4月7号到8号凌晨，中国的汇金、诚通、国新以及电科等企业都分别宣布了股票增持计划。在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威胁下，中国企业或者制造业、外贸进出口企业有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又应该如何破局？

徐伟钧：挑战肯定是非常多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比如关税肯定会增加中国企业在美国销售商品的价格，降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导致中国企业的订单量减少、利润空间受到挤压等等。

另外，因为全球供应链的高度关联，美国所谓“对等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可能会扰乱合同和长期的投资决策，导致中国企业成本增加、运营效率降低等等。

那么中国企业如何破局？

一方面，我认为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企业面临了这么多的困难，我相信中国政府肯定会出台一些措施来引导中国企业更好地发展，来应对美国关税所带来的风险。

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可以找到特朗普关税政策中的一些漏洞。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说得非常复杂，但在实施过程中，它要求美国能够精确识别商品的原产国，精确地对不同国家加征不同的关税。像刚才提到的，中国产的一些商品通过去关税较低的国家中转再出口到美国，或者以中国的零部件在其他国家组装再出口到美国，这些方式其实仍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此外，虽然特朗普表面上宣称会进行精确识别，比如对在墨西哥生产、向美国出口的中国汽车征收高额关税，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商品的原产地、原材料的构成都能够非常精准、非常有效地被识别的。因为这是需要非常多的人力物力的，美国海关能不能有效做到？这一点是存疑的。

如果我们关注美国的内政，可能会留意到特朗普政府也正在推行精简美国政府部门的举措，比如他通过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来大量裁员。另外，美国海关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控制移民以及芬太尼等问题上。它能够在关税或者进口商品识别上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这其实是值得怀疑的。尤其是在人员精简的情况下，我认为必然会有存在很多漏洞。我相信，有效利用这些漏洞，也是帮助中国企业降低“对等关税”负面影响的方式。

【关税战 2.0 来袭，中国如何应对？】

应对关税战，中国有两大底气来源

林辉煌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广东省“百县千真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专家智库专家委员

导语：

经过几轮博弈，美国对华畸形关税已沦为“数字游戏”。结合特朗普政府近日的行动来看，其意图仍是通过外交孤立、经济胁迫、贸易管制等多重手段围堵中国。关税、贸易拉锯战背后，实质上也是两大经济体在产业体系韧性、社会稳定性、技术创新能力等关键领域的深层较量。就目前而言，中国应着眼于哪些领域，为可能的一系列外部风险提供长期稳定的“护城河”？

IPP 研究员林辉煌认为，中国应对关税战有两大底气来源，一是总体工业生产能力这一“发动机”；二是乡村体制这一“稳定器”。其中，中国的总体工业生产能力作为基础性优势，能够降低成本并保持全球供应链依赖；而乡村体制作为一种弹性机制，能够帮助消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风险，保障社会稳定。他强调，中国要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这样一来，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自可岿然不动。

一、中国的总体工业生产能力

这次特朗普挑起的关税战，实际上跟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比如广东作为贸易大省，外贸依存度 60%多，受到关税战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不管做哪个领域的研究，对关税这个重要的问题都得有一些把握，否则很多研究判断也很难做好。我们说要做战略研究，战略研究就需要迅速掌握那些重要事实，这样才能做出准确的战略判断。包括关税在内的经济体制对于所有研究都是基础性的，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跟它有相关性或者会受它影响。

我认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总体工业生产能力。总体工业生产能力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底盘，特别是大宗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是不可替代的。这种能力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以把工业生产的成本降到极低，所以一些开始很贵的东西，只要中国一生产，就可以变得很便宜。

总体工业生产能力是应对外部世界风险最重要的稳定器，外部世界再怎么变，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在这里摆着，其他国家很难完全离开我们。尤其是中高端制造业，它们对我们供应链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换句话说，在全球范围，很少有几个国家拥有中国这样的总体工业生产能力，这就是苹果很难完全将供应链从中国撤出的原因。

总体工业生产能力不仅具有基础性，还有民生性。什么是“民生性”？我们可以不用高端产品，但是日常生活中需要用到各种普通工业产品，像塑料、电器、服装、家具，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工业还具有跨周期性，在其他行业的市场遭受剧烈波动的情况下，传统工业（尤其是食品工业）反而能够保持稳态，这也是经济安全的一种体现。

我们经常有一种“创新焦虑”，老是觉得我们没有创新能力，尤其是没有原始创新能力。当然，对原始创新也要有紧迫感，但是更重要的是维护好创新的底盘，也就是总体工业生产能力。我们能够把大部分工业产品做到成本更低，质量更高，这实际上也是重要的创新——应用层面的创新，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创新能力。

中国强大的总体工业生产能力，建立在整个产业链的完整性和成熟度基础之上，也由此培育了大规模的技能型人才。这些技能型人才，不是三两天就可以培育出来的，也不是一两家企业花多少钱就可以买来的。它是一整个人才池子，长期浸泡在整个产业链之中，产业技能就是这样不断训练出来的，大量的创新就是在这里萌生的。这些人才大量聚集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也因此很多制造业企业都会选择留在这些地方。原始创新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它的成本极大、风险极大，我们要投入资源，但是更要注重应用层面的资源投入。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关键的发展爬坡阶段，要更重视在应用层面提升总体工业生产能力，也就是我们反复说的“发展极在政策上要优先于创新极”。在规划整个经济体的发展重心及经济政策时，要对创新有清醒的判断，要更多回应应用级别的创新，把这个做到极致，也可以“所向披靡”了。这样的话，我们跟美国竞争的时候，是有比较优势的。中央说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把自己的优势打磨的足够好，人家就离不开你。

二战以来，我们迅速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国际贸易的增长是整个全球化最重要的推

动力之一。经济全球化是什么意思？就是让各国专注于做自己最擅长的产业分工，分工以后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低整个经济体系的成本。术业有专攻，每个人把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到最极致之后，就有可能同时实现成本最低和质量最好。

霍华德·马克思说，全球化经历了 25 年的黄金期，美国耐用品的实际价格下降了 40%，所以它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全球化不仅压低了通胀，也让所有美国家庭都能够以低价获得高质量产品。低价和高质量产品，评价产品竞争力的核心就是这两个指标。大家都说中国在价格上太卷了，我认为这完全不是问题，价格低本身是优势，关键是能否同时做到高质量。如果我的质量跟你一样，我的价格比你低，我还能活下去，那说明我更有竞争力。现在流行说质价比，就是同时强调质量和价格。

美国的关税战想要什么？想要通过关税抬升，建立经济壁垒，然后回到所有事情都我自己做的“小国寡民时代”，这是典型的孤立主义和地方主义。实际上，要回到这种孤岛是不经济的，也不科学。美国能够在高端领域去创新，实际上也是因为其参与全球的经济分工；中国可以在应用级别做到最好，这也是一种经济分工。不是说美国不能搞制造业，其实美国也有很多很强的制造业，只是说它没有必要什么都做。美国想活成中国的样子，不现实。

我们还是要拥抱全球化，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地方主义和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这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秩序依然有问题，大家对现有的经济分工和利益分配秩序是不满意的，认为自己如果继续这种分工，分到的利益是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经常抱怨自己老是停留在做低端的东西，在整个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大头都被那些发达国家拿走了，而自己始终停留在低度发展阶段。现在美国也不满意，它分配到高端经济利益，觉得还不够，还想要制造业回流，消除贸易逆差。

美国这样做当然是违背规律的，但是这也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各地孤立主义的情绪，所以我们要去反思的是：从全球治理角度看，中国如果有一天成为全球化的引领者，该如何去构建一个更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我们的研究，是可以去回应这个问题的，为中国的崛起做理论储备。

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中国拥有强大的总体工业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它是应该站出来抵制不正义的流氓经济秩序。这样做当然会有代价，但是不这样做的代价恐怕会更大。我们不是与全世界为敌，仍然向全世界开放，只要彼此能讲道理。我相信正义的秩序最终总是能够赢得人心的。我们明确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拥有强大的总体工业生产能力，而且始终对这个世界保持开放，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理有力地抵制不正义的经济流氓行为。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并且努力做到极致。

二、关税战的深层动因与深远影响

刚才讨论的是第一个大问题，就是直接讲关税对各方的影响和中国的应对。

第二个大的问题是关税战的深层动因与深远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里我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达利欧的观点，他说大家现在关注的都是些具体的问题，具体问题当然也要关注，但

是他认为真正值得深思的不是这些政策表面的震荡，而是导致它们出台的深层动因，以及未来可能酝酿的更大级别的系统性的动乱。

达利欧列举了几个深层的动因，第一个是货币与经济秩序的坍塌，他认为关税战反映的是整个以美元为主的货币经济秩序正在坍塌。美国的政府债务正在迅速增长，已经到达了难以掩盖的一个临界点，这预示着旧的货币秩序将被颠覆式重塑，而我们才刚刚走到这场变革的起点。这是他的一个大判断，也就是现在美国想努力挣扎自救，但是它这么一做，大家对于美元的信心就更弱了。所以说整个经济体系要坍塌，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

美元秩序实际上面临着“特里芬难题”，这个概念是由经济学家特里芬在1960年提出的。他认为，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美元替代了黄金成为一个虚拟的资产，它必须保持足够的国际流通量，以满足全球贸易的需求。但是这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贸易的持续逆差。也就是说，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它的货币决定。因为美国的货币要输出，也就是它要找别人买东西，肯定就会造成贸易逆差。

美国没有考虑到美国卖出去的货币是很多的，它看到的只是实物贸易，美国实物卖出去的少，但是他的货币卖出去很多，全球都在买它的货币。因此，美国和美国人可以大量负债。美元不够，再多印一些钱就是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削弱人们对美元的信心。这里有一个矛盾点：美国的优势是美元，然后美元大量输出以后导致逆差，美元越印越多之后，大家对美元的信心也会削弱。达利欧就认为美元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临界点。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中国该如何应对，是不是要建立替代美元的人民币国际秩序，还是说应该重新回到黄金主导的秩序？这些都是战略性的问题，是一个大国崛起的时候必须解决的大国问题。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就认为，中国要趁这个机会，联合全世界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全球化。他认为美元潜在的竞争者里面，人民币是少数真正拥有主权的货币，而且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生产能力来看，人民币都是世界货币有力的竞争者，一旦中国抓住机会完成货币国际化，就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

赵燕菁主张让人民币去取代美国的国际地位，而且他认为中国跟美国不一样，因为中国现在整个生产能力是非常强的。但问题是中国一旦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原来的生产优势会不会受到影响？毕竟美国原来的生产能力也很强，但是金融起来之后，制造业很自然地就会受到抑制。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

我们跟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一样，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金融和制造业的关系，要时刻保持清醒。现在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是相对封闭的，它也是一个安全阀，谨防别人跟我们打金融战。

金融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大国崛起之后，必然会重塑全球的经济秩序，而全球的经济秩序里面，金融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要继续保持那种吸血属性吗？我认为，现在我们的金融要解决的首先还是国内的问题，主要还是产业金融的问题，或者叫供应链金融的问题。换言

之，我们的金融体系要更好地去回应、服务产业发展。正如之前所言，我们的比较优势是总体工业生产能力，需要把它做得更强，金融体系应当服务而不是伤害这种能力。

达利欧的第二个判断是美国国内政治秩序的分裂。因为教育机会、生产力、财富和价值观的分裂，美国分裂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右翼的民粹主义，一个是左翼的民粹主义。双方都在争夺话语权和主导的地位，不惜破坏制度根基。

达利欧还认为，在各种混乱的情况之下，在一个分裂的社会里面，很容易产生特朗普这种强势领导人，从而取代民主体制。民粹主义本来就分散，情绪化，谁也搞不定谁，那就需要一个强权的人物出来尝试搞定一切，特朗普就是这么应运而生的。

对中国来说，这确实是非常生动的一课。那么，这对中国的启发在哪里？中国需要注意避免这种社会分裂，不管是扶贫也好，教育也好，医疗也好，整个财富分配也好，还有价值观，要谨防出现这种分裂。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重新去理解我们的发展体制，要格外重视公共服务供给和机会的公平，避免走上美国这样的道路。一旦一个社会分裂以后，所有政策都会失效。

达利欧的第三个判断是国际地缘政治正在重构。美国一国主导的全球合作体系正在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单边主义模式。或许可以认为这将是一个更多元的世界秩序，没有谁能够一家独大，所有国家和区域都需要合作对话。大国和小国共同领导的世界，而不再是由一个国家来主导世界秩序，后者被证明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达利欧讲的第四个深层动因是自然风险与科技突变。现在全球面临的自然风险、自然灾害越来越多，大家对这种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感越来越强。还有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对整个社会的重新塑造，比如对就业、军事以及人的生活本身等的影响也非常大。

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大的问题：关税战与我们的研究有什么关系？我总结了三点：**第一个就是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健全的经济体制，而经济体制离不开对内外贸的研究。**

通过这个研究，通过观察整个关税战，我们是要去研究中国应该如何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该如何跟这个世界相处。我们要把自己的优势真正做到最强，这样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立足，不管外面世界有多困难，我们一样可以岿然不动。同时，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要输出什么？你要怎么跟这个世界去打交道？如何建立一个互利互惠的全球经济秩序？

第二个就是要重新评估中国的乡村体制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的作用。

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内部的危机，也有外部的危机，这个时候乡村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要把它叫做“乡村体制”。这样一个乡村体制，它不是要维持贫穷，而是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的空间分化，作为一种弹性机制，它能够为我们保留一个回旋空间，帮助我们去消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风险。

在乡村体制中，集体土地制度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制度，广大农民能够有一个生存的最底线的保障，而且这种保障不是货币能够替代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能把一切资源全部

都货币化、金融化。

把所有资源全部货币化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养老，如果都靠养老金，都靠社会保险，这就是养老的货币化。实际上这是扛不住的，欧洲国家扛不住，我们这种发展中的大国更是扛不住。所以才需要保留小农经济，它就是在起着这样一个叫做“货币时代的非货币功能”，特别重要。我认为，越是货币化的时代，我们就越需要有这种非货币化的功能，以此来抵消货币化的风险。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关税战。中国拥有强大的总体工业生产能力，这是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之一。中国另外一个大的优势，就是它的乡村体制。这种乡村体制实际上已经消化，正在消化，也将继续消化中国城市化、全球化所产生的经济社会风险。关税战直接影响到很多企业，影响到很多人的就业，农民工在城市因此失去工作的时候，至少他有农村可以回，而不至于在城市流离失所。

在这个时候我们回到乡村体制这个问题上，虽然说表面看起来它跟关税战没有直接相关，但是它其实在默默地起着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给理清清楚，从而也确立起乡村研究的重大时代价值。从乡村看中国，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在很长的一个时间段里面都需要有乡村体制，我们要基于此来建立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

总体工业生产能力，这是我们的“发动机”，庞大的乡村体制，这是我们的“稳定器”，这是中国应对关税战的两大底气来源。这两大优势构成我们理解中国、理解中国核心竞争力、理解中国发展体制的关键所在。我们把这两者分别叫做“发展极”和“稳定极”。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创新极”，创新极也要去推进，但是我们一定要清醒，做创新极不能影响到发展极和稳定极的功能。

乡村体制本身是可以有很多理论的，我们庞大的远郊村、城中村，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乡村体制，它在支撑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这是我们有抵抗关税壁垒的信心来源。

我们在潮州调研的时候，关注到当地的玩具产业，为什么那里玩具产业在全球那么有竞争力呢？就是因为它整个产业根系延伸到乡村里面去了，非正规属性特别强。农村里那些婆婆，那些刚生下小孩没地方去的妇女，还有小孩，都参与到这些玩具的手工拼接之中。玩具产业延伸到乡村，我们叫没有围墙的工厂，它出现了什么结果？结果就是它的成本极低，低到令人发指。农村那些劳动力本来就是不计成本的，闲着也是闲着，接点手工活基本上就是赚点零花钱，同时也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而不至于天天去打牌，不会精神空虚去信邪教，小孩的劳动教育也有了，老人的身体也得到了锻炼，乡村因此就保持了活力。

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我们很多出海的企业、产业，你看它很传统，而且都是扎根乡村的，乡村还在滋养着它，这导致什么后果？不管你关税再提高多少，我都没关系，因为成本低到令人发指。这个也是乡村体制实际发挥的一个作用。

我们回到自己的研究里面，回到我们的乡村体制研究里面，关税战就变得特别有趣了。通过乡村体制去理解全球，理解我们的全球竞争，理解中国乡村体制在全球竞争中的作用，研究

的意义一下子就变得高大上了。我们始终认为，乡村研究本身就是高大上的一个工作，不是一个低等的研究，更不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研究，它是真正的战略研究，是真正的前沿研究。这就是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权。

乡村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的形象，很被动地在那里躺着。我们需要一个积极主动的乡村体制，它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城市化，积极参与到中国的全球化，积极参与到中国应对整个世界的风险之中。

要深刻意识到，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发展，它的现代化远未完成。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环境上是越来越恶劣的，整个经济也在放缓，关税战就是全球混乱的一种典型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重新评估中国乡村体制的功能，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意识。

第三个议题是，全球中国时代是否即将到来，以及如何进行理论与政策储备。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新现代化理论，也可以叫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基于中国经验所产生的现代化理论。西方主导的现代化理论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崛起经验，对解释他们的现代化那是没问题的。但是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它所处的时代不一样，整个国家体制、人口基数都不一样，我们需要有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新现代化理论，用来解释它的发展，指导它的发展，指导它的现代化，同时对全球也输出新的现代化方案。我们要去做新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同时也要做政策科学的研究。

全球中国时代是不是已经到来了，假如到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提供理论方案，能不能提供一整套的政策储备？比如说我们的乡村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区域不平衡应该怎么办？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要不要大跨步地往原始创新去走？有了战略方向，就决定了国家整体资源的配置结构。

从经验研究开始，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事实，知道它的逻辑。从经验研究进入到政策研究，然后进入到战略研究，最后是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绝对是最高级的，因为掌握了理论，实际上就掌握了话语，掌握了解释体系。有了理论，就可以有战略思维，就可以指导战略，有了战略以后就可以转化成具体的政策。这四者不是说先完成一个再完成一个，它是同时进行的，几个层面反复交叉，不断提炼，不断试错。有些判断错了就错了，错了我们改就是了。我们从来不说掌握了真理。

我们围绕关税战梳理了一些信息，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研究上来，我们关心的还是我们的研究。我们对这个世界很关心，也要意识到我们可能很难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可以输出我们的判断和理论，至于这个世界是否因此改变，那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关税战 2.0 来袭，中国如何应对？】

如何理解“贝森特经济学”

刘 深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新媒体主管、政策分析师

广东新质生产力研究中心研究员

导语：

劝服特朗普推迟激进的全球关税、阻止特朗普解雇时任美联储主席、促使特朗普豁免对华电子产品关税、主导中美关税谈判、上演“19分钟救市”，向全球投资者兜售美国经济增长潜力……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这位从华尔街跻身白宫权力核心的美国财长，近来多次扮演了美国经济的“救市主”和“操盘手”，也正有赖于其处处斡旋，美国经济才逐步从“解放日”关税引发的混乱泥潭中走出。同时，贝森特本人也在白宫权力斗争、重组的过程中，获得了贸易、关税等事务的更大话语权。他会否成为集诸多大权于一身的白宫“财政沙皇”？如何看待其主导下的贸易谈判？怎样理解“贝森特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

IPP 政策分析师刘深指出，贝森特的政策主张融合了共和党传统的小政府理念与特朗普时代的实用主义策略，核心是通过财政紧缩、自由市场改革和关税保护实现国内经济扩张。他认为，贝森特未来一段时间的施政重心仍是美国“刀刃向内”的内向整合，而非“外部出击”。

5月14日，正在卡塔尔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卡塔尔王室的国宴讲话上，以一种略显突兀的方式公开点名赞扬财政部长贝森特，称其已经成为一名“大明星”，并称赞他“每次他上电视，一切都会上涨”。他还以特朗普特有的排比句式称赞贝森特是一位“伟大的大师，一位市场大师，一位理解市场的天才，顺便还给自己在一个月前搞崩了金融市场的行为找了一个“背锅侠”——“因为他明白我们承受着前任政府留下的糟糕局面”。

值得玩味的是，从现场照片和视频上看，在这场国事晚宴上，贝森特隔着卡塔尔埃米尔与特朗普两位主宾相邻而坐，而同在现场、近期麻烦不断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马斯克等人则略显沉默地坐在旁边，“显示度”明显不高。在这场本应以外交、商务和安全等事项为主题的活动中，国务卿、商务部长、国防部长的“星光”都被这位财政部长所掩盖，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特朗普对贝森特的肯定与褒扬之意。

一、改变贝森特命运的一个月

而在仅仅一个多月之前，贝森特还似乎是特朗普内阁之中的“非核心成员”和“少数异类”。

一方面，贝森特并非特朗普核心“MAGA”团队中的一员。虽然贝森特与特朗普家族相识已有数十年，但直到2024年初，贝森特才与特朗普本人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并在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担任其团队的经济顾问。相比卢特尼克、纳瓦罗、莱特希泽等与特朗普相识多年年的经济智囊们，贝森特显然只是特朗普团队中的“新兵”。对于重视亲疏和忠诚度的特朗普来说，贝森特的话语权原本不及其他人。

另一方面，在特朗普团队内部，贝森特被外界普遍视为温和派，与纳瓦罗、卢特尼克、莱特希泽等强硬派一直存在或明或暗的分歧，在许多核心政策的制定上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在与卢特尼克竞争财政部长位置的过程中，埃隆·马斯克就公开支持卢特尼克，称贝森特只是“惯例选择”，而卢特尼克能带来“真正的改变”。据报道，在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酝酿过程中，贝森特自始至终都被视为“局外人”而未能参与决策，这甚至令贝森特一度考虑离职。

然而，正是在“解放日”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贝森特几乎以其一己之力，通过一系列“力挽狂澜”式的发言和举措，令美国资本市场从混乱和震荡中恢复，也让他取得了特朗普的高度信任和肯定。令市场和外界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次：

——劝说特朗普暂缓对等关税。在4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加征高额关税引发市场暴跌后，贝森特迅速行动，在纳瓦罗缺席的情况下，联合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服特朗普暂停对多数国家的关税，尤其是豁免了电子产品等关键领域的关税。这一举措直接扭转了美股的熔断趋势，标普500指数单日反弹超8%。他还提出90天关税暂停期后仅达成“原则性协议”，为后续谈判留出空间，避免因急于求成引发市场二次波动。

——稳定美债市场。面对关税出台后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的急速飙升，贝森特4月15日通过彭博电视台的19分钟采访，否认主权国家抛售美债，将市场波动归因于对冲基金平仓，并强调财政部拥有应对市场失调的工具。此举令美债收益率从4.5%高位回落，作为避险工具

的黄金价格也从 3245 美元高位回落。

——维护美联储权威。面对特朗普“炒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威胁，贝森特以罢免鲍威尔可能引发更大的市场动荡以及混乱的法律纠纷为由，联合卢特尼克对特朗普进行了劝阻，令特朗普缓和了解雇鲍威尔的言论。贝森特还通过与鲍威尔的定期会面，向市场传递“美联储独立性受尊重”的信号，缓解了对政策干预的担忧。他还公开表示，鲍威尔的继任者遴选将于秋季启动，暗示当前政策连贯性将维持，避免市场因不确定性进一步下跌。

——主导美中贸易谈判。贝森特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主导了 5 月在日内瓦与中国官员进行的贸易谈判。贝森特在谈判中表现出务实的态度，推动了中美双方此后达成超出市场预期共识。在双方关于缓和贸易战的联合声明发布后，市场紧张情绪得到明显缓解，全球股市迅速上涨，美国标准普尔 500 指数更是大涨 5.3%。

——化解“降级”负面消息。5 月 16 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以政府债务不断上升为由，把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最高的 Aaa 下调一级至 Aa1，令早盘市场一度出现股债汇“三杀”的局面。对此，贝森特在媒体采访中淡化了相关新闻的严重性，并坚称“穆迪是一个‘滞后指标’”。在贝森特发声之后，当日的美股市场走出先低后高走势，并以微升收盘，显示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贝森特的安抚。

二、贝森特如何赢得特朗普的信任？

从以上的行动中，可以看出贝森特的行事风格有以下一些特色：

第一，决策果断，有自身主见和目标。在 4 月初关税危机中，他与卢特尼克联手“调虎离山”，抓住纳瓦罗缺席的机会劝说特朗普，促成暂停关税的决定，凸显了他果断的一面；在中美贸易谈判前，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放风”称，愿将对中国关税降至 80%，而贝森特则利用特朗普的充分授权，以务实和灵活的态度与中方展开谈判，最终实现了“超预期”的互降关税。

第二，了解资本市场，善于化解资本市场的负面情绪。贝森特对冲基金出身的背景，令他对市场心理的理解极为深入，也让他可以精准地化解市场的担忧。在 4 月初关税政策引发股债汇“三杀”时，他迅速识别市场恐慌的根源，通过暂停关税、安抚投资者等举措扭转资本市场颓势。他还不断通过公开声明和媒体沟通管理市场预期，减少了市场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担忧。

第三，政治敏锐度高，注重维护特朗普的面子和权威。在公开场合，贝森特将自己的救市举措包装为特朗普“交易的艺术”的一部分，突出特朗普的战略远见，而非自己的个人主张；在中美日内瓦谈判后，贝森特强调降税是为了“给市场喘息空间”，并重申最终目标是实现特朗普的“公平贸易”理念。上述措辞让特朗普的政策显得具有连续性和权威性，维护了特朗普作为决策核心的形象，同时也淡化了特朗普内阁团队中“温和派”与“强硬派”的矛盾，有利于实现内部各派的团结。

第四，善于劝说和谈判，有高超的沟通技巧。在吹捧特朗普已经“蔚然成风”的内阁中，贝森特能够屡次劝说“强人”特朗普改弦更张、软化立场，本身就足以说明他的沟通技巧之高

超。在中美谈判中，贝森特以“一把糖”的方式与中方就芬太尼问题展开沟通的细节，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善于议程设置，为自身赢得谈判筹码的技巧。

可以看出，与美国政府前任的历任财政部长相比，贝森特在具备专业能力的同时，还具备一定程度的政治家素养。

平心而论，作为成功的华尔街投资家出身，贝森特本可以在年届退休的年纪以“富家翁”的姿态安然退休，远离外界纷扰。然而，他却以主动姿态孤身投入特朗普阵营，显然不单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是带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和政策目的。与此同时，贝森特作为华尔街出身的华盛顿圈外人，没有自己的团队和政治势力，个人政治魅力和影响力有限，因此他也需要特朗普和 MAGA 势力的加持，以推动其个人的政治抱负和改革议程。

经此一役，已经充分获得总统信任、并与其团队深深绑定的贝森特，与特朗普的政治合作极有可能进一步深化。以目前他获得特朗普重视和授权的程度来看，贝森特极有可能在未来3年进一步集中财政、贸易、税收、对外经济乃至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权，成为特朗普政府的“财政沙皇”，进而推动其自身的“贝森特经济学”政策主张。

三、贝森特有何主张？

那么，“贝森特经济学”的核心政策主张有哪些？

5月4日，贝森特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特朗普的经济增长三部曲》的文章，为我们勾勒出了他的施政路线图。文中提出，特朗普政府经济议程的三大支柱是：全球贸易再谈判、永久性减税和经济去监管化——减税和去监管化可以提高家庭和企业的实际收入，而关税则可以减免所得税并激励再工业化。贝森特认为，这些政策将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制造业增长、更高的工资、更低的税收、更少的监管负担、更便宜的能源、更少的国债以及对中国的依赖减少，同时保持美元的强势”。透过美妙的“许愿式”政客措辞，我们可以梳理出贝森特施政的几个核心目标：

1. 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贝森特始终强调美元地位是美国经济实力的根基。无论是维护财政平衡还是维护市场稳定，保证强势的美元地位是他始终关注的一大核心。

上台前，他就多次公开发言批评拜登政府的财政政策，认为美国当前的赤字水平不可持续，上台后也将工作重点放在削减债务上。他的“3-3-3”经济政策框架，本质上也是通过一种财政上的“开源节流”——降低预算赤字至GDP的3%，即削减政府支出；实现3%的GDP年增长率，即通过较快的经济增长以税收增加；每日增产300万桶石油或等量能源，即通过稳定能源价格控制通胀并增加能源收入。在贝森特看来，唯有如此，方能阻止不断膨胀的债务损害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功能。在此背景下，也就可以理解为何贝森特只是将关税工具化地视作一种补充财政收入的手段；建立国家数字货币储备等新举措，也可以被简单理解为支撑美元的一种创新举措。

2. 以“小政府”理念增加国内就业。在国内的经济方针上，贝森特主张回归里根经济学，

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他多次指责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为“中央计划式”的政策，认为过度监管和税收扭曲抑制了私营部门的创新与投资意愿，还造成了私营部门的就业衰退，对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族裔的实际工资增长不利。因此，他认为经济重心应从政府投资驱动转向私营部门驱动，减税可以刺激企业投资和消费，进而增加底层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而这一部分群体正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

3. 以行政手段维护美国的经济安全。与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不同，贝森特在国际经济关系上并非一味支持自由贸易，而是认为全球化和贸易也造成了国家分裂。他多次强调“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主张利用经济工具如制裁、关税和供应链安全来应对外部威胁。他认为制造业和供应链的空心化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肯定关税作为战略工具，在保护美国产业、引导制造业回流、增加政府收入方面的作用。他强调平衡使用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的能源政策，也是基于保持美国能源独立性的考虑。

总体而言，贝森特的政策主张融合了共和党传统的小政府理念与特朗普时代的实用主义策略，核心是通过财政紧缩、自由市场改革和关税保护实现国内经济扩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特朗普及其他内阁成员频频将国内问题“甩锅”中国不同，贝森特对中国的批评主要针对具体的经济政策（如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落脚点也会回到美国自身的经济竞争力上来（“我们也需要再平衡”）。

由此也可以推测，贝森特未来一段时间的施政重心仍是美国“刀刃向内”的“内向整合”而非“外部出击”。

一方面，尽快推动美国国内的减税议程对贝森特而言显然更加迫切。随着 10%基础关税的普遍加征以及一季度经济的意外萎缩，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们将立即感受到物价上升和就业市场萎靡的压力。一旦减税政策无法如预期在 7 月落地，今年下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恐怕将面对逐渐失速的状态，资本市场也很有可能面临一轮更为剧烈的恐慌性下跌。

另一方面，在近期市场趋于稳定的情况下，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税谈判迫切性已经大大降低。事实上，不同程度的协议进展和市场解读，反倒有可能对金融和外汇市场造成意想不到的扰动。在已经手握 10%基础关税的强势地位之下，贝森特主导下贸易谈判，很可能不会快速取得进展。相信对贝森特来说，美国国内经济的烂摊子，才是他必须要咬下来的“硬骨头”。

当然，不得不考虑的是，作为本届美国政府最大的不确定性来源，特朗普本人是否会令“贝森特经济学”得以顺利执行？这很可能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是贝森特谨慎的“小脚女人”式的改革，能否跟得上特朗普“大干快上”的 MAGA 进度？第二，是贝森特稳定市场的能力，能否跟得上特朗普摧毁传统秩序的进程？第三，是否存在贝森特的替代者？这些都会最终决定特朗普对贝森特的信任程度。

往事可鉴，“强人”特朗普的信任，来得快，去得也快。

【关税战 2.0 来袭，中国如何应对？】

时间线

从 340 亿到 125%： 全面复盘中美关税战大博弈

资料整理：刘昕冉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行政助理

2017 年，特朗普上台，关税战正式打响。从最初的 340 亿美元商品清单，到 2000 亿美元的全面加税，再到高科技封锁、供应链脱钩以及稀土资源的博弈，这场持续八年多的博弈不仅改变了两国经济，也深刻影响了全球产业链的走向。今天，让我们一起回顾这场关税争端的关键节点，探讨其背后的逻辑与未来走向。

2017 年：箭在弦上

1 月 20 日，特朗普就任美国第 45 任总统。

8 月 14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备忘录，指示美国商务部部长根据 1962 年贸易扩张法第 232 条，就进口钢铁及铝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调查（232 调查）。

8 月 18 日，美国贸易代表署根据《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正式对中国启动调查（301 调查）。

2018 年：全面升级

3 月 22 日，美国宣布，为回应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将依据《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指示美国贸易代表（USTR）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 60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关税。

3 月 23 日，中国商务部发布消息，拟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其中计划对价值 30 亿美元的美国产水果、猪肉、葡萄酒、无缝钢管和另外 100 多种商品征收关税。

4 月 2 日，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 7 类 128 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

4 月 4 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中国输美的 1333 项 500 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同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

等 14 类 106 项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 实施日期将视乎美国政府对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情况, 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另行公布。

4 月 16 日, 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宣布, 因违反美国政府制裁禁令向伊朗等国出口, 中国电信装置商中兴通讯将被禁止从美国市场上购买零部件产品, 期限为 7 年

4 月 20 日, 中兴通讯在深圳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称, 美国的禁令可能导致中兴通讯进入“休克状态”, 对公司全体员工、遍布全球的运营商客户、终端消费者和股东的利益造成直接损害。中兴随后承认违规并向美国支付罚款。

5 月 3 日至 4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鹤与美国总统特使、财政部长姆努钦率领的美方代表团举行会谈。会后中方新闻稿指, “双方就共同关心的美中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美方新闻稿指双方展开了“坦率的对话”。

5 月 17 日至 18 日, 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和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成员的美方代表团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磋商。5 月 17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见了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团。

5 月 19 日, 美中两国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美中贸易磋商联合声明》。中方通稿指, 双方达成共识, 不打贸易战, 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

5 月 21 日, 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借道越南输美的中国钢铁产品征收反倾销反补贴关税。

5 月 29 日, 美国白宫宣布仍将对 500 亿中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

6 月 2 日至 3 日, 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美中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带领中方团队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带领的美方团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了磋商。会后中方声明指, 双方就落实两国在华盛顿的共识, 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好沟通, 取得了积极的、具体的进展, 相关细节有待双方最终确认。

6 月 5 日, 中兴通讯公司与美国政府签署原则性协定, 美国商务部取消针对中兴通讯向美国供应商采购零部件的禁令。

7 月 6 日, 美国对 34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正式加征 25% 关税, 涉及电子元件等品类, 关税税率由 3.1% 上升至 28.1%。

7 月 6 日, 中国推出对等反制措施, 对价值 340 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 25% 关税, 主要涉及农产品和汽车等领域, 关税税率由 3% 上升至 28%, 汽车类约从 25% 上升至 50%。

7 月 13 日, 在中兴通讯缴交 14 亿美元罚款及保证金并宣布将展开检讨后, 美国商务部正式解除了对中兴通讯的禁令。

8 月 23 日, 美国宣布对价值 16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 关税。

8 月 23 日, 中国宣布对价值 160 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 25% 关税。

9 月 20 日, 美国国务院宣布, 因中方向俄罗斯购买苏-35 战斗机及 S-400 防空导弹等军事装备,

将对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该部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

9月24日，美国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

9月24日，中国则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5%-10%关税。

9月25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在记者会上确认，中方已经拒绝美方磋商要求的讯息，并表示谈判应当以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遵守诺言为前提。

10月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北京，先后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举行会谈。

11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11月9日，美中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詹姆士·马蒂斯共同举行对话。

12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二十国集团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上举行会谈，两国元首讨论了美中经贸问题并达成了共识。双方宣布暂停采取新的贸易措施，并设定了3个月的谈判期限。

同日，发生“孟晚舟事件”：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转机时被捕，美国指控其“涉嫌违反伊朗制裁令”。此事发生在中美贸易战白热化阶段，被视为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政治化操作”。

12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美中贸易争端和朝鲜半岛形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019年：打打谈谈，波折不断

1月29日，刘鹤率领中方代表团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美中第五轮经贸磋商。会后中方声明指，“双方进行了坦诚、具体、建设性的讨论，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

2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日的第六轮美中经贸进阶别磋商。

2月21日至22日，美中双方在华盛顿举行第七轮经贸进阶别磋商。

3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对2018年9月起加征关税的自华进口商品，不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继续保持10%直至另行通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其后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欢迎。

3月28日至29日，美中双方在北京举行第八轮经贸进阶别磋商。

4月3日至5日，美中双方在华盛顿举行第九轮经贸进阶别磋商。

4月30日至5月1日，美中双方在北京举行第十轮经贸进阶别磋商。

5月9日至10日，美中双方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一轮经贸进阶别磋商。

5月10日，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税率提升至25%。

5月16日，美国将华为等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其获取美国技术和产品。

6月1日，中国对价值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提升加征税率至5%-25%。

6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同意重新启动经贸磋商，美方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

7月30-31日，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鹤在上海举行第十二轮美中贸易进阶别磋商。

9月1日，美国对价值12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5%关税。

10月10日至1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团访问华盛顿，同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史蒂芬·梅努钦举行第十三轮美中经贸进阶别磋商。

12月13日，美中两国就第一阶段经贸协定文字达成一致。

2020年：阶段性缓和

1月15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团赴美，与特朗普政府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协议签署后，美方对价值1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暂停加征关税，并将12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税率从15%下调至7.5%。

5月，美国进一步限制全球芯片制造商使用美国技术为华为生产芯片，技术战继续升级。

9月19日，中国商务部正式公布《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将那些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实体实施封锁、断供或其他歧视性措施，对中国企业或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外国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列入其中。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

1月20日，拜登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关税政策，还在高科技领域实施了更为严苛的进口限制，尤其是在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等关键行业。

6月10日，中国通过《反外国制裁法》，授权对等制裁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实体及个人。

9月25日，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返回祖国。

2022年：芯片争夺战

8月9日，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要求接收补贴的企业10年内不得在中国扩建先进芯片产能。

9月，拜登政府决定延长对华加征关税。

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发布新规，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和相关技术，禁止使用美国技术的第三方企业为中国公司生产先进芯片。

2023年：高技术领域摩擦继续

1月5日，戴尔宣布供应链脱钩，计划2024年全面停用中国生产芯片。

2月16日，中国首次启用“不可靠实体清单”，制裁对台军售的企业。

8月1日，中国对镓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

2024年：摩擦升级

5月14日，拜登政府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税率，具体为对进口的中国电动汽车关税从25%提高到100%，对中国太阳能电池进口税从25%提高到50%，对部

分中国进口钢铁和铝征收的关税从 7.5%提高到 25%。

8 月，中国对锑及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

2025 年：关税战重燃

1 月 20 日，再次当选的特朗普就任美国第 47 任总统。

2 月 1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 10%关税，并取消 T86 清关政策（即 800 美元以下包裹免税）。

2 月 4 日，中国宣布自 2025 年 2 月 10 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其中，对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 15%关税；对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汽车、皮卡加征 10%关税。

3 月 3 日，美国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至 20%关税。

3 月 4 日，中国宣布，自 2025 年 3 月 10 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其中，对鸡肉、小麦、玉米、棉花加征 15%关税；对高粱、大豆、猪肉、牛肉、水产品、水果、蔬菜、乳制品加征 10%关税。

4 月 2 日，美国宣布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设立 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数十个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其中，美国对中国实施 34%的对等关税，对欧盟实施的对等关税为 20%，对印度实施 26%的对等关税，对韩国实施 25%的对等关税，对日本实施 24%的对等关税，对越南实施 46%的对等关税。

4 月 7 日，特朗普称中国若不撤回 34%的对等关税，将加征 50%额外关税。

4 月 8 日，美国将此前宣布的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34%的所谓“对等关税”，进一步提高 50%至 84%。叠加此前税率，部分商品综合税率飙升至 104%。

4 月 9 日，中国宣布将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从 34%提高至 84%。

4 月 9 日，特朗普再次加码，继续对中国产品加税到 125%。对已授权对不采取报复行动的国家实施 90 天的关税暂缓，但 10%的“基础关税”不能少，涉及 75 个国家。

4 月 10 日，美国将对中国的关税税率提升至 145%。

4 月 10 日，中国同步将对美国的关税调整至 125%，并宣布后续不再理会美国可能的继续加征。

4 月 13 日，美国宣布对 16 类关键商品免征“对等关税”，涉及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半导体制造设备等核心品类。这一政策调整距离特朗普政府 4 月 2 日启动对华加征关税仅过去 11 天，被外界视为“贸易战史上最戏剧性的 180 度大转弯”。

5 月 6 日，美中两国宣布将在瑞士举行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何立峰出席此次谈判。

5 月 12 日，美中两国公布瑞士会谈联合声明，美中两国宣布互降关税。

6 月 9 日至 10 日，美中两国在伦敦经贸磋商达成共识，中方允许稀土磁铁出口至美国公司，而美方允许中国留学生获取签证。美国对华 55%的关税保持不变。

IPP 动态

(2025 年 3—5 月)

【重要动态】

● 郑永年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5 年年会

3 月 23 日至 24 日, 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作为中方学术界代表, 受邀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5 年年会, 并参加“改革激发增长新动能”专题研讨会, 与国内外政策专家、企业领袖共同探讨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议题。本次年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本次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 郑永年受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25 年年会

3 月 25 日至 28 日, 郑永年应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025 年年会, 并先后参与三场主题分论坛, 就“全球南方”包容性现代化发展路径、重塑国际互信机制以及中国科技创新前景等议题发表观点。

● “人类决策与人工智能: 选择与治理”国际研讨会成功举办

3 月 28 日至 29 日, 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IPP 及社会科学处联合主办的“人类决策与人工智能: 选择与治理”国际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隆重召开。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麦均洪, 国际法语社会学家协会管理社会学分会主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里昂第三大学荣誉教授何让飞(Jean Ruffier)及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基础研究处处长沈文浩出席本次会议并致辞。

● IPP 重大课题成果出版

由 IPP 团队完成的, 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的《决策咨询制度与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建设研究》一书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郑永年教授担任本书课题组的首席专家、组长, 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担任课题组副组长。

● IPP 多篇政策报告得到上级采纳

4 月以来, IPP 陆续收到反馈, IPP 研究人员围绕特朗普当选、中美关税战、人才回流以及科技治理等主题撰写的多篇报告被有关部委分别采用。

● 郑永年著作再度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荐书目”

4 月 10 日,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2025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公告, 郑永年教授专著《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入选该项目推荐书目。此前, 由 IPP 刘佳副研究员翻译的郑永年教授著作《中国的文明复兴》(英文版)曾成功入选 2022-202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名单。

● IPP 研究员参与华南理工大学专题调研

5 月 14 至 15 日, 由全国人大代表、华南理工大学校长唐洪武院士牵头的调研团先后前往北京大学深圳先进研究院、粤科集团、粤芯集团、平安保险、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拓斯达、欣旺达等数十家机构和企业调研。IPP 蒋余浩、林辉煌等多位人员参加调研并参与有关研究工作。

● 郑永年出席 2025 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并作主旨演讲

5 月 27 日, 2025 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之“构建中

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分论坛在深圳举行。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在会上以“数智时代的知识变革与知识创新”为主题作主旨演讲。本次分论坛是 2025 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重要分论坛之一，由中宣部主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 郑永年教授获聘香港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

5 月 28 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再度委任 59 名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任期由 5 月 30 日起生效，为期一年。其中，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获任研究策

略专家组成员。香港特首政策组专家组由来自商业和金融界别、专业人士、智库及学术界等不同背景的人士组成，向特首政策组提供专业意见和崭新构思。

● 郑永年专著《论单边开放》出版

近期，郑永年教授最新专著《论单边开放》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中国内外部环境的结构变化及人工智能革命的背景出发，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单边开放”战略的内涵要义、理论逻辑、对中国自身发展以及全球治理的巨大意义。

【院务·交流】

● 广东省南沙办、广州市府办一行到访 IPP 调研

4 月 1 日，广东省南沙办第五联络组组长、广州市委金融办政策法规与研究处处长欧峻青，市政府办公厅政务信息处处长石黎荔等一行到访 IPP，就“跨境双总部”政策构想、南沙规划发展等议题与 IPP 研究人员展开座谈。双方还就开展政策报告报送合作等事宜进行沟通洽谈。

● IPP 举办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开题报告会

4 月 14 日，IPP 举办 2025 年国家高端智库重点课题开题报告会。各位课题负责人介绍了相关课题的研究背景、目标及实施计划。郑永年教授从课题的创新性、可行性及政策影响力等维度对课题进行了深入评议和学术指导。

● 广东省商务厅一行到访 IPP 调研

4 月 19 日，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双德会一行到访 IPP，并举行专题调研座谈会，聚焦大湾区合作与规则衔接机制创新等议题。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IPP 执行院长郭海、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李明波及多位专家学者出席，共同探讨大湾区高质量

发展路径。

● 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一行到访 IPP

4 月 27 日，广州市标准研究院冯智辉副院长一行 6 人到访 IPP，就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产业政策和产业标准互动结合等问题与 IPP 相关主题研究人员进行交流。

● 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康天慕博士到访 IPP

4 月 29 日下午，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馆总领事康天慕(Timothy Kendall)博士、副总领事 Sophie Smith 女士一行到访 IPP，围绕中美贸易战、新形势下中澳合作机遇、人工智能监管等话题与徐伟钧博士等多位 IPP 相关领域研究员展开深度交流。

● IPP 研究团队进行“跨境双总部”专题研讨

近期，由林辉煌研究员领衔的研究团队就南沙“跨境双总部”政策建议与广东省南沙办、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等举行专题研讨会议，探讨如何在外汇管理、税收政策、监管模式等方面推动“跨境双总部”机制的实施，并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

【学术活动】

● IPP 成果在《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

今年第4期《中国科学院院刊》刊发了由郑永年教授牵头组稿的“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专题论文。IPP 研究员蒋余浩、张心旂、戴明洁撰写的《开放治理与创新方向规制：推进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制度机制研究》一文在该专题中发表。

● IPP 与意大利国家应用经济研究中心 (CiMET) 学者展开学术座谈交流

4月14日上午，意大利国家应用经济研究中心的学者到访IPP，双方展开学术座谈交流。IPP 研究人员与意大利学者围绕产业政策、技术创新等主题展开学术研讨，重点交流了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以及中欧在产业模式、市场策略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前景。

● “结构转型与产业政策”学术沙龙成功举办

4月16日，由意大利国家应用经济研究中心 (CiMET)、IPP 及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结构转型与产业政策”学术沙龙成功举行。多位IPP 研究人员在研讨会期间发表主题演讲，并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就全球经济变革背景下产业政策对全球经济秩序的重塑作用展开深入探讨。

● IPP 举行“精康融合行动下的社区康复服务实践”主题研讨会

4月23日，“精康融合行动下的社区康复服务实践——十城探索主题研讨会”举行。来自香港、澳门、长沙、武汉等十个城市的社会组织代表以及医疗机构专家参会，围绕“精康融合行动”在各地的实施成效、经验与挑战展开深入交流。广州市荔湾区民政局副局长严本新出席会议并致辞。

● IPP 国际会议成果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

近日，2024年IPP 国际会议嘉宾英加·乌尔尼坎(Inga Ulnicane)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Asian Research Policy》发表文章。该文以她为第11届IPP 国际学术会议所准备的主旨演讲为基础，结合她从该次会议获得的最新启发融合而成。

● 郑永年、蒋余浩获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5月13日，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全体会议在广州珠海宾馆举行。IPP 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研究员蒋余浩获聘特约研究员。

● 赵巍研究员当选华南理工大学汽车行业校友会产业链出海专委会主任

5月18日，华工汽车行业校友会于五山校区举办“华南理工大学汽车行业发展研讨会暨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新设立六个专业服务委员会，IPP 研究员赵巍参会并当选产业链出海专委会主任。

● 余荔研究员参加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

5月23-25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协会主办的“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长春举行。IPP 研究员余荔受邀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围绕中国当前智库研究面临的困境、挑战以及转型思路作分享。

● 葡语国家智库学一行到 IPP

5月27日下午，来自葡萄牙、巴西、安哥拉、佛得角等十余位葡语国家智库学者在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的组织下到访IPP，与华南理工大学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探讨。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李卫青出席并致欢迎辞。

【媒体发声】

● 徐伟钧接受《南方都市报》深度访谈

4月8日, IPP助理研究员徐伟钧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李鹤鸣的采访, 围绕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的实质、影响以及中国的反制措施展开分析。

● 《南华早报》报道引述徐伟钧研究员的观点

《南华早报》刊发报道引述徐伟钧研究员关于中国反制美国关税霸凌的分析。徐伟钧博士认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是自2018年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第三次发布白皮书, 深刻阐述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营商环境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以及中国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坚守。

● 《经济学人》的报道引述郑永年教授观点

近日,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杂志的报道引述了郑永年教授关于中美贸易谈判阶段性成果的看法。郑永年教授指出, 面对美国的关税霸凌, 需要有人站出来对霸权说不, 中国有力的回应赢得了许多国家的支持。

● 蒋余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

IPP研究员蒋余浩近期接受《南华早报》的访问, 就中国的科技创新及人才制度改革政策作出解读。相关内容刊载于2025年5月14日《Prestige vs progress: what stops China's researchers from chasing big new ideas?》一文中。

● 林辉煌就镇街改革话题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

近期, 林辉煌研究员就南沙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 通过创新财政管理体制激发镇街发展活力话题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他表示, 这一改革打通了区县和镇街的关系, 属于集成式改革中的重要经验。

研究院简介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所为中央提供独立决策咨询的国家高端智库,成立于2012年,由华南理工大学知名校友及企业家莫道明先生与华南理工大学共同创办,由国际顶尖政治学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2015年,IPP被中宣部认定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2017年,IPP成功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核心智库”榜单;2022年,IPP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认定为“重点政策研究合作单位”;2025年,IPP被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认定为“中央网信办舆情合作培育单位”。

IPP以决策咨询为“安身之本”,以学术研究为“立命之道”。在郑永年教授的带领下,IPP专注于三大领域的政策研究:大国外交、产业经济及社会治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IPP每年撰写并向相关部门提交高端政策报告百余篇,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成果得到高层重视。

与此同时,IPP大力推动学术出版、国际交流与舆论沟通,与公众和学界保持积极对话,努力向世界讲好公共政策领域的“中国故事”。2021年,IPP与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合作,出版英文系列丛书《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前沿》;2022年,IPP又与商务印书馆(香港)合作,出版中文公共政策系列丛书。作为研究院的品牌活动,“IPP国际会议”已成功举办十一届,为海内外学者搭建了优质的学术交流平台。

秉承“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开放理念,IPP经过十余年的辛勤耕耘,今天已成长为我国最具政策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的综合型智库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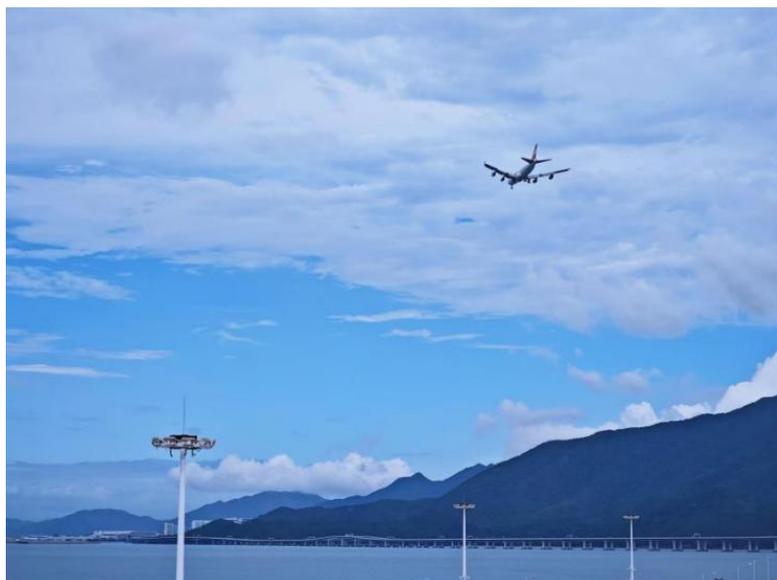


电话: 020-87112324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81 号华南理工大学

官网: <https://ipp.scut.edu.cn/en/>

微信公众号: IPP 评论



摄影：徐伟钧



摄影：李明令



摄影：余荔



联系我们

政策咨询：(8620) 87111850 E-mail: liujincheng@ipp.org.cn

公共关系：(8620) 87112340 E-mail: media@ipp.org.cn

出版物订阅：(8620) 87111856

地址：中国广州天河区五山路381号汽车科技大楼15楼

邮编：510640

官方网站：www.ipp.org.cn

官方微信：IPP-REVIEW

今日头条：IPP评论